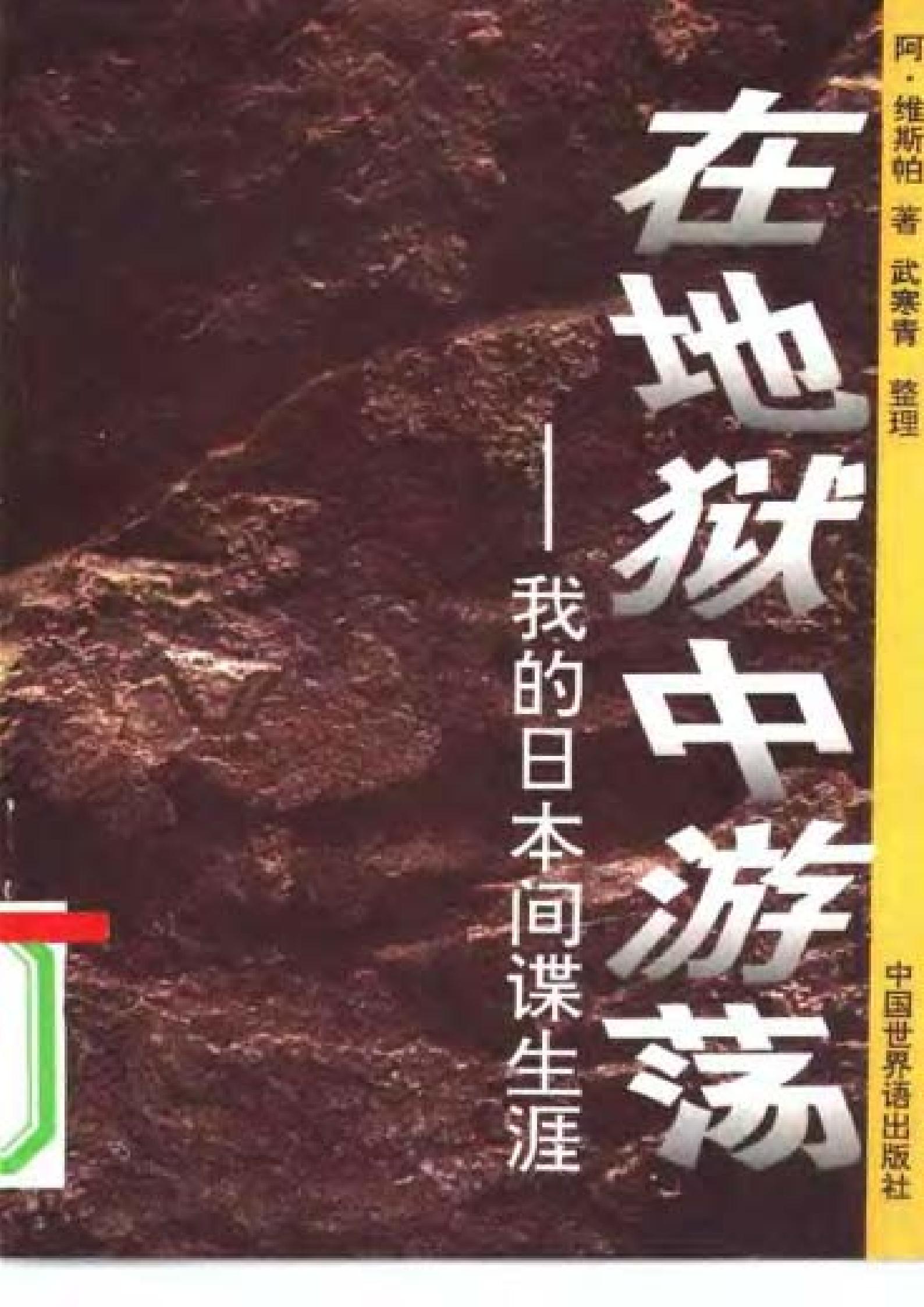


阿·维斯帕 著 武寒青 整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在 地 獄 中 游 蕩

——我的日本间谍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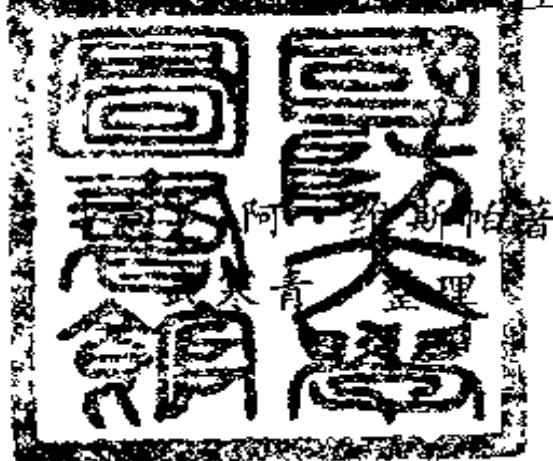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1 8509 1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

在 地 狱 中 游 荡

——我的日本间谍生涯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北京·一九九五年七月

(京)新登字 13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地狱中游荡：我的日本间谍生涯/(意)维斯帕著；
武寒青整理。—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6

ISBN 7-5052-0241-3

I. 在… II. ①维… ②武… III. 自传体小说—意大利—
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0212 号

在地狱中游荡

——我的日本间谍生涯

整 理/武寒青
出 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地 址/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 政 编 码/100037
电 话/(010)8326040
联 系 人/工君校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兰空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5.375
字 数/113 千字
印 数/1~20,000
定 价/6.80 元

1995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2-0241-3/1·77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或装订错误，
敬请寄回本社更换。

这本书是为了履行我的诺言而写的，要表明真实，要道出真相，要把魔鬼的标记烙在日本军阀的前额上；要在全世界的良心之前暴露贪婪、残暴的日本军官；要指出这些穿制服的畜生的行径是怎样的无耻之极；而且以人道、文化和正义的名义，说出满洲人民在他们的压榨之下所遭受的劫难。

我在这里叙述的只不过是我曾经亲眼看见的事实，我几乎是这些故事的一个角色。对于许多人，我所记述的事实仿佛是可怕的、难以置信的噩梦。然而，对于和日本军国主义有过接触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意大利] 阿·维斯帕

序　　言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一堆残破的资料中看到了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阿马利多·维斯帕。我们由此得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部的那些岁月里，曾有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精明强干的多重间谍——幽灵般地在日本人制造的地狱中游荡，做着需要用生命作赌注的可怕的游戏。他是那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曾是张作霖的密友和幕僚，“九·一八”事变后又成为驻满日军情报局的高级间谍。他和他的俄国助手一起做着典型的特务工作，同时又暗中和中国抗日游击队保持着联系。他目睹了种种杀戮、劫难和毁灭，卷入了一次次谋杀、搏斗和争战，他生活在阳光通常无法照到的那些角落中，他以他的特殊身份，同时深入到敌对几方的心脏，清楚地看到常人很难看到的东西。他用他的亲身经历，为读者勾画出一幅幅恐怖的然而又是活生生的地狱图景，而这些都是读者在任何一部记述那个时代的文字中所难以见到的。

笔者获得的资料大部分是维斯帕先生的自述。由于年代久远，有些部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加之语言方面的的原因，叙述上也有许多不通和费解之处。但为了保证本书所录史实和记录人物情感的真实性——这也是本书最可宝贵之处，笔者在成书过程中，进行综合整理，并对语言做了一些规范化处理，而未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动。其中维斯帕先生的一些议论可能有欠妥之处，但笔者还是决定对此采取尊重史实的态度，由

读者去评判其中的是与非。还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的书名和章节的小标题是笔者加的。

笔者还希望能通过此书的面世，找到这位曾与中国大地结下不解之缘的维斯帕先生。如果维斯帕先生现在还活着，那么，这位神奇的意大利老人定会给读者讲出更多的神奇往事。

谨以此书纪念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

武寒青

1995 年 7 月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 1. 被迫加入中国籍 (1)
- 2. 打击“白奴”贩子 (6)

第二章

- 1. 张作霖被害 (9)
- 2. 日军占领东北 (12)

第三章

- 1. 恐怖笼罩着东北 (18)
- 2. 我见上肥原 (23)

第四章

- 1. 我的新谍报长官 (26)
- 2. 日本特务机构的使命 (28)

第五章

- 1. 影,好一个中国上匪 (35)
- 2. 长官发狂 (39)

第六章

- 1. 与我的助手们会面 (44)
- 2. 官办垄断卖淫业 (48)
- 3. 毒品和堕落 (53)

第七章

- 1. 日本军列被炸 (57)

2. 与游击队接头	(60)
第八章		
1. 与“托尔克马达二世”较量	(67)
2. 奇袭	(71)
第九章		
1. 日本人在制造骗局	(76)
2. 谎言压不倒真理	(80)
第十章		
1. 接受新任务和一个小插曲	(83)
2. 与游击队交换人质	(88)
第十一章		
1. 我到了游击队的营地	(92)
2. 再见“托尔克马达二世”	(95)
第十二章		
1. 日军流行绑票	(100)
2. 加斯普事件	(105)
3. 我被监视了	(113)
第十三章		
1. 我的长官被免职	(121)
2. 制造谎言——日本侵略者的天才	(130)
3. 日本的掠夺奇招	(134)
第十四章		
1. 逃离东北	(142)
2. 上海——不安宁的避难所	(150)
3. 我的妻子讲述的故事	(155)
结束语	(161)

第一章

1. 被迫加入中国籍

1888 年,我出生在意大利的阿格拉。22 岁那年,我远赴墨西哥加入革命军,在墨西哥战役中两次负伤并成为一名上尉。1912 年,我作为一名记者开始漫游世界,足迹遍及美国、南美、澳大利亚、越南和中国。在漫长的旅途中,辽远的西藏、蒙古和东西伯利亚边境令我着迷,于是我留在了东方。

1916 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情报机关远东部看中了我这个中国通,雇用我在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一带从事情报工作,我的间谍生涯从此开始。

在协约国情报部门的那几年,我有机会熟识了许多当时的中国的达官显贵以及日本的文臣武将,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阀张作霖大帅。张大帅对我的间谍身份一目了然,他请我了解当时居住在俄国的中国人的真实状况,并时常让我提供一些他用得着的情报。对此,我总是乐于从命,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接下来,他开始反复向我表示,只要我愿意留在东方,他非常喜欢与我共事。当时,战后的欧洲支离破碎,这就使得张大帅的提议显得尤为诱人。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 1920 年 9 月 24 日加入了东三省督办张作霖大帅的特务机关。

大帅要求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让任何入知道我在替

第一章

1. 被迫加入中国籍

1888 年,我出生在意大利的阿格拉。22 岁那年,我远赴墨西哥加入革命军,在墨西哥战役中两次负伤并成为一名上尉。1912 年,我作为一名记者开始漫游世界,足迹遍及美国、南美、澳大利亚、越南和中国。在漫长的旅途中,辽远的西藏、蒙古和东西伯利亚边境令我着迷,于是我留在了东方。

1916 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情报机关远东部看中了我这个中国通,雇用我在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一带从事情报工作,我的间谍生涯从此开始。

在协约国情报部门的那几年,我有机会熟识了许多当时的中国的达官显贵以及日本的文臣武将,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阀张作霖大帅。张大帅对我的间谍身份一目了然,他请我了解当时居住在俄国的中国人的真实状况,并时常让我提供一些他用得着的情报。对此,我总是乐于从命,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接下来,他开始反复向我表示,只要我愿意留在东方,他非常喜欢与我共事。当时,战后的欧洲支离破碎,这就使得张大帅的提议显得尤为诱人。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 1920 年 9 月 24 日加入了东三省督办张作霖大帅的特务机关。

大帅要求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让任何入知道我在替

他做事。他让我要使人相信，我仍然服务于协约国的情报部门。只有大帅的密友、黑龙江省的省长吴俊升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并直接指挥我的行动。

我很少去沈阳谒见张大帅，非去不可的话就必须在夜幕的掩护下，穿着中国服装，带上墨镜，把欧式呢帽的帽檐遮在眼睛上面，并由他的一个心腹副官引导着。

我替张大帅工作了 8 年。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我常常觉得张大帅是一个光荣而且英武的男子，说到做到。对于那些忠心服务于他的下属们来说，他绝对是一位好上司；而对于那些犯法背信的人，他却异常严厉，他处置叛徒是毫不留情的。

在俄国、蒙古、朝鲜和中国，我用各种姓名和各种护照执行着各式各样的任务：搜集政治情报，监视外国间谍，缉捕土匪、军火走私贩和白奴贩子（这些人贩子输出过几千名逃避革命的白俄妇女）以及日本等国不利于中国的种种活动。

为了掩护，有时我必须专心经营各种买卖，扮演各种职业角色，诸如蒙古金矿或煤矿的调查专员、中国政府特派复兴俄满商业交通调查团的秘书等。1921 年，我当上了俄满边界重镇满洲里一家中俄合办报馆的编辑，后来又在外蒙古乌兰巴托的几家报馆做通讯员。

1923 年我奉命回到沈阳，负责调查偷运军火的案件。当时，走私军火是要掉脑袋的。

最初两个月我在山海关、秦皇岛以及津奉路一带侦察。3 月 2 日军火贩们在离山海关 9 英里处偷过长城时，被我一网打尽。我没收了 500 支步枪，这些枪全部是意大利制造的。3 月 22 日，我又截获了 1000 支来福枪。4 月 12 日，我的同伴在

北戴河附近没收了 200 支意大利造的自动手枪。4月 27 日，在离海岸线较远的地方，我抓获了一批带着 2000 支来福枪的走私贩子。这些枪全是运给东北一带的土匪的，这些土匪正在给东北的社会制造越来越多的麻烦。

我的行动惹恼了我的祖国——意大利的有关方面。6 月间我在天津接到意大利总领事加布勒里的邀请，他要我去见他。

我去了。他问我在天津干些什么事情，我回答说 I 正在做一次愉快的旅行。

他打断我的话：“不要对我说废话，我非常清楚你在天津干什么。我警告你，尽管你能从中国当局手中得到某种有力的证明文件，但你总还是在我管辖之下的意大利人，如果你再惹出什么麻烦，我就毫不迟疑地拘捕你，遣送回国。听明白了吗？！”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份恐吓。然而，我必须忠实地尽我的职责，不论罪犯是什么国籍。

在那一年的夏季，在我所没收的战利品中，有几千支来福枪、手枪，还有 200 公斤吗啡和海洛因 1500 公斤鸦片。

11 月 14 日，经日本当局同意，我在一只停在天津港的日本轮船上，没收了大约 4000 支即将运往广东的意大利造的来福枪。

11 月 18 日上午 10 点钟，一位与我最为要好的意大利警官来看我。他看上去非常苦恼，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了下面这些话：

“亲爱的维斯帕，我来是执行一项我极不情愿执行的任务。总领事加布勒里先生命令我对你下达驱逐令，而且，立即

执行。你现在必须到车站搭乘 10 点 45 分的火车去上海。从现在开始，你不得对任何人说话或打电话，不过你可以告诉你的妻子你有急事要去上海，但不要告诉她驱逐你的命令。我接到命令，倘若你企图通知任何人，就给你带上手铐，由军队把你押到车站。现在我的士兵都在外面的花园里。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极不公正，但我只能执行命令。我不想让你难堪，所以请不要拒捕，就算帮我的忙吧。倘若你答应我在半小时内到车站去，而且不通知任何人，那么我就带着我的士兵到车上去等你。”

我除了接受这些条件以外别无选择。我答应了这可怜的人，而且确实只告诉了妻子我有急事要到上海去。半小时后，我被关进一辆车里，由 4 个意大利水兵和一个叫罗马诺里的下级军官看管着。

11 月 19 日火车抵达上海，我立刻被押解到意大利盖拉布里亚号军舰的一间密室里。

幸而舰长是一位正直的意大利人。我把我的处境告诉他，他立刻派一名军官给意大利总领事送去一封信，信上声明他作为舰长，不愿用意大利皇家军舰做任何不明不白的事，如果在当天下午 4 点钟以前他还沒有接到拘留我的正式文件，那么他就要释放我。

下午 4 点零 5 分，舰长没有接到拘留我的正式文件，于是，他让我离开军舰。我自由了。

两天后，意大利副领事费拉乔罗致函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请求拘捕盖拉布里亚号军舰的逃兵阿马利多·维斯帕。

公共租界的总巡是一个品性刚直的英国人。他去拜访意大利总领事，并且声明：

“维斯帕先生就在我的总巡署里，如果拘捕令上贴着的照片是对的话，那么立刻就可以逮捕他。但是，你们必须涂掉拘捕令上的‘逃兵’二字，因为据我所知，维斯帕先生已在中国居住 15 年了。倘若你们要拘捕的是一个水兵，那拘捕令上的照片显然就是错的。”

中国当局也向意大利公使提出了抗议，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维斯帕是意大利人，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有关维斯帕的任何事情。

整个事情成了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而天津意大利领事馆拒绝取消对我的驱逐令。为了让事情水落石出，在同拘捕房商量后，我自愿被捕，被带去见意大利副领事费拉乔罗。我质问他我犯了什么罪，他无言以对。最后，他含糊地说这是一场误会。我被开释了。

几天后，我又被召去见意大利领事，他代表意大利公使建议我马上离开中国。他许诺给我旅费，还说上船以后再给我 5000 元，我谢绝了。

1924 年 4 月 9 日，当我经过邓脱路的时候，一个人在我的胸口刺了一刀。中国当局确信，凶手是一个意大利退伍水兵。另外，还有一个意大利人两次企图谋杀我，他的同谋是 3 个俄国人和一个印度人。后来那 3 个俄国人在哈尔滨中国法庭被判刑，那个印度人受到了哈尔滨英国法庭的审判，而那个意大利人却始终逍遙法外。

我意识到，由于意大利当局的所作所为，我已经无法再象正常人那样生活了。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国籍。而后，我由中东路督办朱庆澜将军引荐、北满警察厅长魏永兴将军和中东路警务处长敖志曾将军作保，变成了中国公民。我

天真地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就能毫无阻碍地和那些违法者进行斗争了。但事实上并不象我想的那样简单。

2. 打击“白奴”贩子

作为一名意大利裔的中国情报官,在哈尔滨,我面临着所有违法之徒、捣乱分子、走私犯、白奴贩子以及流氓头领的公开宣战。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逃到远东的俄国人,其中有 90% 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而这些人中的 90% 是穷透了的。白奴贩子们象乌鸦一般群集在沈阳、哈尔滨和别的城市里,他们经常捕捉在饥饿恐怖中的年轻貌美的白俄妇女,把她们卖到其它地方去。身为密探和警官,我常和这些行帮接触。我发现最猖狂的白奴贩子就是俄国人自己,只不过他们是俄国男人,并且全部是帝制派人。由于证据确凿,经我的手,他们被逮捕过 23 次,又由于交纳保银,他们被释放了 23 次,保银甚至高达 2 万到 2 万 5 千元。

情况非常复杂而棘手,以至于中国当局要么采取非常手段,要么只能置之不理。

治外法权也是无数外国人干这种罪恶勾当的护身符。其中有两个瑞典人到哈尔滨仅仅一两年时间,就成了在满洲尽人皆知的恐怖代名词。后来我的部下们在哈尔滨火车站抓住了他们。当时他们正要“护送”6 个体面的白俄女子到天津去做“太太”。我的部下们知道通过法律程序是无法惩罚这两个恶棍的,于是就把他们带到铁道旁边,吊死在一跟电线杆上。

1926年,一个衣冠楚楚的法国人包租了哈尔滨马狄尔饭店两个最好的套房,同时在各种报纸上登出广告,征求年龄在18至22岁之间的女打字员,并说报酬优厚。我叫几个密探监视他,发现在24小时内差不多有20多人来求职,这个法国人发给他认为合适的女子每人20元钱。

我去见这个法国人的时候,他正要离开饭店。我用俄语告诉他,我有两个女儿正在求职,我来是想先替她们了解一下这份职业是否高尚,报酬是否合算。这位法国先生先是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是否知道他是什么人,而后对我说:“我是上海法租界的秘书,我要雇一些打字员到我们的工部局里去工作(后来事实证明他和法租界毫无关系)。”

“可我的女儿不懂法文。”我说。

“这不要紧,”那人忙说,“上海法租界里有两万多俄国人,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会说俄语的人比说法语的人更有用武之地。”

“很好,这正是我要知道的。”我铁青着脸递上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名片,你大概知道这个名字吧。先生,我不必再提醒你过去曾有多少白奴贩子在这里神秘地失踪。今晚9点钟有一班从哈尔滨开出的火车,如果你不搭这班车离开这里的话,那么,你也就别想再活下去了。”

法国人当晚就溜了,他没能带走任何一个“打字员”。

在日本占领东北的前几天,我的部下们在齐齐哈尔车站上听到停在铁道上的一列货车里传出哭声。他们立即打开车门,发现里面有1个俄国女人和11个年纪不满16岁的俄国女孩,其中有两个女孩已经冻死了。带她们来的俄国女人叫卢森堡,她用几块钱把这些女孩买到手,再把她们卖到天津去。

我们当即逮捕了卢森堡，把她关进由中国人看守的监狱中。

当天晚上，中国看守把卢森堡绞死在监狱里。这个可憎的女人曾利用她同胞的贫困做着血腥、残忍的勾当，怎么对待她都是不过分的。处死她的中国看守也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许我这是在说服我自己。总之，第二天，就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尤其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无须问。

第二章

1. 张作霖被害

凭心而论，张作霖是我的好上司。前面已经说过，自 1920 年 9 月 24 日以来，我一直在张大帅帐下，为了法律与秩序，用那些看上去不太恰当的武器进行战斗。

张大帅 1876 年生于奉天省海城县。有关他青年时代的故事在中国东北尽人皆知，有些已经近乎神话。我甚至听到过这样的传说：有一次，他只身跑到县衙门里，责骂县官欺压穷人，宣判县官死刑，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即对县官执行了判决，而后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成功地扬长而去。

日俄战争中，张作霖站在了日本一方，负责破坏俄国的交通线。他的工作被日本人大加赞赏。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迫使北京的清朝政府完全赦免了加在张作霖头上的一切罪名，并使张作霖后来荣任奉天省行政长官。也就是从那时起，张作霖开始节节高升。

1922 年，张大帅第一次离开东北去指挥北京附近的战争。然而，他的军队被吴佩孚的军队击败。他退回东北，宣布东三省独立。

他是一个卓越的行政长官，又是一个无情的独裁者。他并没有受过教育，他的成功来自于他的异常聪明和非凡的记忆力。张大帅使东北农民的生活比之邻近各省以及朝鲜甚至俄

国的农民都更为优越，以至只有 1 千万人口的东北到他死的时候就变为有 3 千万人口的富庶之乡了。每年都有成千成万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到东北帮助收割，而后就定居在那里。

说明张作霖强悍性格的例子有很多，其中他处置在当地操纵纸币的银行和钱庄的老板们的故事最具代表性。

9 位大银行和钱庄的经理被张大帅邀请到沈阳开会，到了之后，张作霖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演说，其简单直率堪称世界纪录。

“我明白，你们也一定明白，你们操纵钱票、市价，大发横财，害死了许多农民和商人。过去我警告过你们，要你们负责，而你们不负责。那么现在听我说吧，假如你们不能制止这种投机，那么你们是无能的；假如你们能够制止而不愿制止，那么你们是错误的。不论是哪种情形，你们都该死！”

5 分钟之后，9 位银行家的头颅就落在了张作霖庭院的地面上。

许多年来，张大帅一直在捉弄日本人，并多次利用日本人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1925 年 11 月 22 日，郭松龄将军通电全国，要求张大帅下野，同时，派军越过长城，向沈阳进犯。郭将军的军队装备精良，对此，张大帅的卫队毫无准备。1926 年 1 月 18 日，郭将军逼近沈阳。张大帅恐惹日本人加强对沈阳铁路地带的防务，并让日本人宣布，郭军不得进至南满路 20 里以内。这就意味着沈阳得救了。几天之后，张大帅重新整顿和装备了他的军队，并且把中国军制服发给整整一个师团的日本士兵，大举回击郭军，取得完全胜利。郭将军和他的妻子均被俘获，即刻处死。

此后，张作霖在日本人鼓动之下进驻北京，一住就是两

年。这时北伐军正风靡中国。它最初由共产党领导，后来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从南方直抵济南。当时，日本军队占据着胶济路，在那里，蒋军遭阻。张作霖一看风向不对，就急于要回东北老家，他最可靠的老朋友、当时正负责东三省全部事务的吴俊升将军也催促他回去。

1928年5月19日，住在北京的日本公使警告张作霖不要回东北。这或许是促使张大帅于5月26日突然决定乘车回沈阳的直接原因。

5月31日，张大帅派在东京活动的间谍猪心先生向他发出了十万火急的警报，警告他切不可乘车到沈阳，因为已有情报表明，张作霖将在~~中~~被炸死。猪心并不怎么相信这一消息，他把这事告诉了~~中~~那位日本大佐。那位日本大佐微笑着说根本没有什么值~~中~~的~~中~~，提出愿意和大帅同坐一列车到沈阳去。

我也坐在~~中~~6月2日从北京开出的~~中~~那列将要断送张大帅生命的列车里，~~中~~必须要在天津调查一些事情，在列车到达天津时就下了~~中~~。

6月4日，日本军事当局邀请吴将军~~中~~到沈阳以南20公里的一个车站上车去会晤张大帅。吴将军去了，带着他的几个幕僚，而且从那里和大帅同车回沈阳。列车要到沈阳的10分钟前，那位履行诺言陪伴大帅同车回沈阳的日本大佐起身说要到隔壁车厢里去挂佩剑、戴军帽。其实，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明，这位大佐到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去了。这样，几分钟后，当列车经过那个注定要爆炸的桥上时，大佐处在了比较安全的位置上，而张大帅和吴将军所乘的那一节车厢却被完全炸毁。吴将军和另外17人当场被炸死，张大帅身负重伤，几个

小时之后死去。

日本人是杀害大帅的主谋者，这是毫无疑问的。炸药被放在了桥的钢架下面，而一直在那里站岗的中国哨兵在几天之前刚由日本士兵替换下来。

张大帅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承了他父亲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他非常同情革命的少年中国，更倾向于采取直接对抗日本的政策。但没等他准备好，日本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日本人急于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2. 日军占领东北

从张大帅死的那一天起，我的生活就全部改变了。有一年多时间我在东北军总参谋长杨宇霆手下工作，但同时我必须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用以贴补我那不太稳定的收入。终于有一天，发生了更为糟糕的事。

1931年9月18日夜，南满路的日军迅速而且准确地进入了中国地区，占领了沈阳城、兵工厂和飞机场，屠杀了中国驻军。那些中国驻军在夜间几小时内毫不知情，连开枪自卫的机会都没有。

对于这起事变的缘由，日本方面由河本中尉做出如下解释：

“1931年9月18日夜间，我和6个兵士偶然沿着铁路散步。忽然我们听见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阵爆炸声，我们觉察到是铁路被炸毁了。就在我们研究这一事件的时候，大约100名中国兵隐藏在附近向我们开枪。我立刻和我的第3中队长官取得联络，因为长官就住在距离那里1500码的地方（他并

未说出是怎样取得的联系）。那时我们听见从长春开到沈阳的特别快车的响声越来越近，为避免翻车事故的发生，我命令士兵开了几枪，并对司机示警。可是司机显然不懂，他继续开进，一直到被炸坏的地方。但列车神奇地越过了被炸过的地方，并没有倾覆，而且准时到达沈阳。”

这就是日本人对公众和国际调查团做出的解释。

与此同时，有一本小册子分发到每一个日本军人手里；照例大谈特谈“天照大神”，称日本人民是神明的裔胄，可以逢凶化吉。其中有这样一段写得非常“出色”：

“1931年9月18日晚间，曾使满洲局势恶化并奴役人民多年之土匪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命令支那士兵安置地雷于沈阳附近之日本铁路上，企图倾覆数分钟后即将通过该地之日本列车，该车乃自长春开至沈阳者也。幸遇河本中尉及兵士6人适在该处附近，而河本中尉者‘士族’（即武士阶级）一脉相传永垂不坠之48代嫡系也。数码之外铁道已毁而列车将至，倾覆之祸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彼迫而祈祷神力焉。彼乃面向日本，全诚鞠躬，祈求天照大神之保佑。彼之虔敬之祷告为神所闻。列车抵被破毁之处即自行腾起，越过危险后，复悠然降于铁道之彼端，继续迈进。列车司机及司炉与河本中尉及6名兵士皆亲见此事，足证此超乎人情物理之事实之真确矣——此事又复对全世界证明日本人为神明胄裔矣。”

而国联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却表明：铁道的被炸时间是在列车通过之后，整个爆炸现场是被精心布置出来、用以证明日军所发动的事变是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的。

中国人不但和这起爆炸毫无关系，而且连想都想不到日本人会策划出这么一个大骗局。所以，当天夜里，躺在军营床

铺上的中国卫戍兵，多数都是在梦乡中被枪杀的。他们的枪械都存放在别的屋子里，以至于那些从梦中惊醒的士兵还来不及取出一件可以抵抗的武器就倒在了血泊中。那座军营后来被放火烧掉了，不留一点儿罪孽的痕迹。

还有许多事实足以证明，整个事变是有预谋的。

早在事变前一天，驻守在辽阳、营口和凤凰城的日本军队就接到了让他们于9月18日下午3点进至沈阳的命令。也就是说，在爆炸事故前的7个小时，日军就已经开始向指定地点进发了。19日凌晨4时，距离爆炸发生还不到6个小时，几乎张写着中国政府不守信义、下令攻击日本铁道的安民告示就张贴在了沈阳街道的墙壁上。而事实上，在短短6个小时之内就能查明事实，并写成告示，印好，分贴各处，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地一家俄文报纸主编、前俄国将军克莱吉先生接到日军高级司令部发给他的一份安民告示，又在上面添加了一些讨好居住在沈阳的俄国居民的文词。日方命令他将这份告示发表在9月19日的俄文报纸上。第二天天明时分，载有这份文告的俄文报纸就出现在沈阳的各个街市上。

事变的前一个星期，许多日本的工程师、电气师和机械师就来到了沈阳，说是要建立一家新的发电厂。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这种工厂的计划和必要，这些技术专家是来替代沈阳兵工厂的中国职员的。那些职员9月19日在他们的岗位上被日本人枪杀了。当天下午，铁路区的日军和从朝鲜调来的部队就进入了东北的各个角落。1932年2月5日，日本军队进驻东北重镇哈尔滨。

哈尔滨的城市建筑好些是由俄国人建造的，很象欧洲的

城市。在日军占领前，这里大约有 10 万俄国人和 20 万中国人。它是东北铁道干线的重要中心点。

2月5日那一天，上午10点钟，大炮的轰隆巨响和机关枪的嗒嗒声距哈尔滨城越来越近。日军的战斗机在中国兵营的上空盘旋，扫射着少数失去战斗力而无处逃命的中国兵士。在这以前的两个星期之间，这个城市百业俱废，街市变得一片荒凉。人人都躲在家里。全市大约有 10 万多从日军占领区逃来的难民，难民们的苦难故事惊骇着每一个市民的心。

正午时分，射击忽然停止。到两点半的时候，几十辆有旁座和架着机关枪的日军摩托车突然从四面八方冲来，接踵而来的是骑兵、装甲车、步兵和坦克。当机关枪队通过街市的时候，站岗的中国警察都被射杀在血泊中，取而代之的，是两名日本士兵。

这时，几千名白俄出现在街头。他们举着日本国旗，对着这些新到的统治者高呼“万岁”。许多年轻的俄国女子都被雇到街头来迎接日本步兵队。她们向那些日本军官献花，有时还连带接吻。整个下午，1 万多名白俄的游行队伍穿梭于各个街道。他们一面向日本人喝采，一面辱骂中国人。有些中国人被他们打成了重伤。这就是宽容的中国人款待这班被全世界其它各处都拒之门外的白俄所得到的报答！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几十万俄国人到满洲逃难；在这里，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款待。从 1917 年至 1932 年间，每天都有一批新的白俄逃到中国来。有护照的或是没护照的，犯法的和守法的，全都一律找到了安身之所。中国当局尽一切可能减轻这些人的困苦。他们中的几千人被安置于政府机关、军队、警署、铁路、矿厂和其它行业，而且往往得到比中国人还要

优厚的待遇；当这些白俄要求组织各种自己的团体时，中国当局不但对他们予以承认，而且还向他们发放活动津贴，甚至赋予一些白俄出席市政会议的权利，委任他们为商会会员……

而现在呢……他们却对善良的中国人反目成仇，把笑脸迎向那些人侵者，对他们高呼“万岁”。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原来这些白俄流亡者一直幻想着在满洲建立白俄政府，建设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日本人为了在东北站住脚，暗地里许诺只要俄国人与日本人大力合作，日本将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这些可怜的、愚蠢的、被欺骗的人！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摆在了他们面前。

日本侵略者来到仅几个星期，就有几千名白俄被投入牢狱，几百名白俄被枪毙或谋杀，几百个年轻的俄国女子被日本兵士强奸，俄国商人手中的钱币财产都被转入日本入手中。

伴随着财产的全部没收，几乎常常连带着逮捕、拘押和处死……日本军官都因此富裕起来了。

那时的满洲境内，几乎每个象点儿样子的日本人都有一两个俄国侍妾，日本人只要花上 5 块钱就可以尽情使用那些年轻的俄国女子一个月。

这就是白俄们那样热心欢迎侵略者所得到的报偿。他们向野蛮人撒去鲜花颂词，得到的只能是死亡和堕落。

一连好几天，日本兵不断开来。四处是离奇的谣言，人们惊恐万状地低声谈论着日本人又枪杀了几百、践踏了几千俄国人和中国人。

1932 年 2 月 10 日早晨，我看见在离日本骑兵军营几步远的地方，倒着两具被强奸后勒死的中国女子的尸体。一个有

胆量的中国人去警署报告他昨夜曾经看见日本士兵把这两个女子从军营里抬出来，于是，他被捕了，从此再无下落。

同日晚间，俄国妇人莎丽曼在街头遭到4个日本兵的袭击，被剥得一丝不挂。

日复一日，连续发生的许多兽性故事成了人们日常谈论的主要话题。在恐怖的统治下，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安全而忧心忡忡，每个人都渴望逃离东北。

至于我呢，我是一个职业间谍，似乎没什么可害怕的。

这些年，我与日本军事当局也时有接触，也曾经多次在中国人面前替他们说好话。我问自己，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认识日军驻满总参谋长寺内伯爵将军（后任日本陆军大臣、华北日军总司令），与满洲日军情报处长铃木将军打过交道；我和天津日军情报处长田中大佐是很好的朋友，他给我提供了许多结识日本高级官员的机会；甚至连日本驻罗马的大使都曾很客气地给我写过信……我没有任何理由为我个人的安全而忧心忡忡。日本人一向是敬重我的，我想他们将一如继往。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些想法是在安慰和欺骗自己，不久我就从我为自己编织的好梦里惊醒了。

第三章

1. 恐怖笼罩着东北

日本侵略者强迫大多数过去为中国东北政府工作的中国职员仍然留在他们的岗位上，这是他们阴谋的一个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使全世界和国际联盟相信，“满洲国”的成立和日本人毫无关系，是“满洲”人民自己的意愿，是“满洲”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至于那 15 万荷枪实弹的日本陆军、18000 日本宪兵和 4000 名秘密警察，则是由“满洲国”政府聘请来用以“保护”满洲人民免遭国民党、共产党和贼匪侵害的。

日本人完全控制了这个“满洲国”的政治舞台，并打着保护人民、防御敌人的幌子，把他们的所谓权力充分伸展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名义上，他们都不过是“顾问”，而这样的“顾问”在“满洲国”里就有 10 万名。在政府的任何机构，不论是什么部、什么署、什么会，都至少有一两个日本“顾问”。“顾问”们管理着每一件事，命令着每一个人，随心所欲。

而这些顾问都是些什么人呢？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令人作呕。

日本军队刚刚在东北站稳脚跟，凡是会呱啦几句中国话或是俄国话的任何一个日本人——不管他的人品、德行及教养如何——就全都成了大权在握的“顾问”。这些日本人在成为顾问之前大多是罪犯、骗子、冒险家、毒品贩子和妓院领班。

在东北，黑社会的头目 95% 都是日本人。由于有日本国旗和治外法权的保障，再加上中国当局为了避免和日本人发生“纠纷”，训令中国警察对日本人的胡作非为必须闭紧双眼，因此，这些日本渣滓就得以横行无忌地逍遙于中国法律之外。

就是这些人，如今全都成了“满洲国”政府聘请的日本“顾问”！

这些人昨天还是被每一个人都厌恶的一堆垃圾，今天却忽然发现自己竟坐在了行政长官的高位，手中握着决定中国人和俄国人生死的权力。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他们大捞特捞的机会来了。除了大笔的贿赂外，他们不会被任何人或事所打动。如果他们能够做到，他们甚至会去征收每个人呼吸空气的课税。在哈尔滨，这些人上台没几天，警务“顾问”就传令拘捕中、俄富豪，只有缴纳完巨额罚金后才能释放；司法“顾问”在审理法律案件、裁判谁是谁非的时候，自然总是出钱多的胜诉。

为了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明白满洲的日本“顾问”制度，我现在向大家展示一下这群败类当中的一个标本。

君士坦丁伊凡诺维奇·中村，正如这名字所示，是一个皈依了俄国东方正教的日本人，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比以往更象日本人。他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住了 20 多年，以理发为业。他在哈尔滨近郊的南岗有个小店，这地方对于警察来说可以算得上是臭名昭著。事实上，中村并不喜欢使用剪子和剃刀，那间小店也不过是一个掩护。他干的真正勾当是买卖吗啡、海洛因和鸦片。在离他的理发店不远的地方，他还经营着一家妓院。

中国当局的一贯做法是息事宁人，对于日本人贩卖毒品

和妇女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在这些匪类过于放肆的时候，才不得不做点儿事情。即使如此，中村的名字还是被一连3次记入了哈尔滨警察的档案。

先是1923年中，中村“包”了一个俄国妇人。她是一位带着11岁女儿的寡妇。几个月后，中村强奸了那个小女孩。由于女孩母亲的控告，警察逮捕了他，并将他交给了日本领事馆。日本法庭审不出中村这种行为有任何罪过，因为依照日本法律，当他“买”了那母亲的时候，他就“已买”了那女孩，因此，那个小女孩已经变为他自己的私有财产了。一切不了了之。

1926年间，警察又要对付中村。这回是一个俄国人到他的店里刮脸，被麻醉后劫走500元。当他醒来察觉损失时，就来到了警察局。和从前一样，日本领事馆又来插手这件事，宣布那个俄国人并非被麻醉而是自己喝醉的。中村无罪开释。

1928年，中村又被押解到日本领事馆，因为在他的妓院里收留着一个12岁的小女孩。结果仍和以前一样，他又一次被赦免了一切罪过。

如今，中村是日本宪兵队的主任“顾问”、俄侨管理处的主任“顾问”、圣弗拉基米尔大学（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的名誉副校长。

老百姓不得不咽下这杯苦酒。不仅如此，就在他们被这些遍地皆是的“顾问”们的铁蹄践踏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另一种更为可怕的灾难又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成千上万最堕落、最无耻、最不可救药的日本刑事犯——其中有一些是被日本天皇的大赦令刚刚赦免的——如同大群饥饿的吸血鬼，一窝蜂似地涌入东北。这些为虎作伥的野兽，其野蛮、残忍、凶狠、恶毒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反神明、反人道、反自然的种种罪

行已经足以打破任何一项世界犯罪纪录。

东北的夜间是不安全的，事实上就是白天也不例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商民被一群所谓“浪人”（日本的恶汉）殴打劫掠，日本警察不闻不问；白种妇女不论在哪儿都没有安全感，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曾被这些日本的“神明胄裔”剥去衣服强奸。“浪人”们在每时每处制造着恐怖。

这里只讲几千个案例中的一件吧。

1932年2月27日，S.K.太太带着她16岁的女儿在街上，被一伙日本浪人劫到了一间日本小屋里。在那里，他们强奸了母亲后，又逼迫那位母亲看着自己的女儿遭受4个浪人的蹂躏。

被释放后，母女俩立刻到离那儿不远的日本领事馆宪兵“出张所”（即派出所）去，把她们可怕的遭遇告诉当时值班的两个宪兵、一个下级军官和一个翻译。

“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你的女儿被强奸？”下级军官用讥笑的声调质问母亲。

“我可以指给你那房子，还可以请医生检验。”

“好！我现在就要检验。请你们俩都进屋去。”

她们照办了，走进了隔壁的房间。两个宪兵缠住母亲，与此同时，那个军官和翻译又轮奸了已经昏迷的女儿。然后，母女俩都被当成无照拉客的妓女拘留并押送到了中国监狱里。

事情发生将近一个月之后，S.K.太太的丈夫才从中国侦缉队方面得知自己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他不得不向日本人缴纳500元，才将她们赎出来。5天后，即3月28日，这个不幸的男人又被日本特务机关传讯。日本人警告说，倘若他有什么反日言论，就让他脑袋搬家。

哈尔滨一家俄文报纸刚一发表这一类的消息，日军当局就勒令停刊，并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

绝不许在罪犯身上使用“日本人”这个名词，在述说匪类的时候，只许使用“外国人”这个名词。

从此往后，日本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就全都算在“外国人”的账上了。

对于咖啡店、饭店和小酒馆的老板来说，这些日本浪人无疑是一种经常出没的恶魔。不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能哗然闯入中国人或俄国人开的这一类店铺，命令全体侍者放下手头的各种事情，供奉他们大吃大喝，然后不给一个铜板，一走了之。这种掠夺也是日本宪兵队官兵的家常便饭和例行公事。这些宪兵甚至比浪人还坏。他们不但强迫店主白白供应他们吃喝，而且常常在临走的时候，抄走他们认为可以装饰他们营房的任何东西。留声机、收音机、桌布、酒瓶、安乐椅无一幸免，尤其是金银器皿。他们特别爱好钟表。每一个日本宪兵都有在满洲服役期间尽量搜集掠夺品的野心。这样，当他们回日本的时候，这一切“纪念品”就可以随之带走了。

我曾经亲眼看见过好几次日本兵团在大连上船归国时的情形。他们全都满载着掠夺品，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挂钟、收音机或留声机。

中国人和俄国人，尤其是女人，在日本浪人、日本兵士、日本宪兵和日本“顾问”的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是超乎常人想象的。以残忍暴虐而论，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蛮族入侵都无法与这次日本人侵满洲相比拟。古代蛮族的杀戮搜掠是直截简单的，而这些日本野人却是悠悠然有计划地干着这种肮脏的勾当。他们吸食牺牲者的鲜血，而保存那些肉体，以便重复吸食。

在大城市里发生的这些恐怖事件，还远不能与乡村中所遭受的毁坏蹂躏相提并论。日本兵士所到之处，走后留下的只是死尸和灰烬。他们劫掠、杀戮，而且毁灭。年轻女子都被强奸过了，几乎无一幸免。

当时，世界各国都犯下了一个最可怕的错误，那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当作文明人来看待。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其结果是致命的。

这些配备着现代毁灭性武器的蛮族野人，正对着毫无防御的和平国度的百姓疯狂逞凶。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2. 我见土肥原

1932年2月14日，一个日军中尉和一个军曹来到我家。前者用英语告诉我，日军特务机关长官土肥原贤二大佐邀请我去谈话。那中尉在三鞠躬中的异样态度让我感觉到，这与其说是邀请，倒不如说是命令。我对他说：

“请你回去报告土肥原大佐，我吃完中饭就去拜访。”

中尉又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做出一种咬牙屏息的姿势——这在日本的传统里是恭敬的表示——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大佐要你现在就去。车就在外面等着，我奉命陪着你。”
的确，这是命令。

我只能戴帽穿衣，随他而去。

在特务机关本部等了5分钟之后，我被引入土肥原的专用办公室里。

我认识他已经许多年了。当我在蒙古与他初次会面时，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算坏。我记得他是一个圆脸的矮胖子，上唇有一小点黑髭。他一向对我显出格外的礼貌。外国新闻记者称他为日本的“满洲劳伦斯”（劳伦斯是英国著名间谍）。那时我经常暗想，假如他的妹妹不是日本某位亲王的侍妾，那么他就很难能如此飞黄腾达了。

象从前一样，土肥原大佐含笑迎接了我，我不知道那笑容是讥讽还是嘲弄。我们相互握手，他请我就坐。而后，他用俄语说：

“我喜欢用俄语，只有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我才说英语。我讨厌含混的语言，正和我不愿意雇用英美人一样。”

他沉默了几分钟，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们彼此相知，维斯帕先生，是不是？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是在哪儿见面的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天津。”

“很好。你有良好的记忆力。我听说你非常聪明，一件事不用对你交代两遍。我们直说吧。日本军事当局过去多次提议，要你放弃中国的职务来与我们合作，你都拒绝了。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并不是邀请你，而是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必须替日本工作。我知道只要你肯做，你完全能够做得非常出色。另外，如果你的工作不见成效的话，就说明你不愿意为我们工作，那么，”他故意把这句话说得审慎而且缓慢，“我的习惯是枪毙那些显然对日本抱有恶意的人。”

紧接着，他又用平静的声调说：“这是战时，维斯帕先生，凡是企图逃避责任的人一律以逃兵论处，而且我们处置逃兵的方式是死刑。假如你是单身汉，又有那么些朋友在满洲和蒙古，我承认，你要跑到中国内地的任何地方，都易如反掌。但是

你有一个家。带着一家五口，要想越过满蒙大平原，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劝你振作起来，拿出你的才干，那样的话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我为他的这种态度感到惊异，而且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反感。我本来并没有特别不愿意替日本工作，因为我已经积蓄了一点儿钱，而且经营着两家剧院，需要某种保护，倘若他们真心诚意地邀请我，而不是用这种恐吓的手段，我是有可能考虑这个职位的。

土肥原皱起双眉盯着我，说：“我并不是邀请你，维斯帕先生。我是命令你，而且我相信我已经把理由讲得很充分了。明天上午 11 点钟你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要介绍你去见驻满日军情报局局长。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等你和日本人处惯了，你就会发现我们比中国人要好上一千倍，比美国人或世界上别的人种都优秀得多。任何欧洲人都应该以能够替日本人工作为荣。当心，留神你的所作所为，别忘了你的那位朋友猪心最后是什么下场。你还记得吗？他淹死了，是不是，维斯帕先生？！”

猪心是一位替中国政府从事情报工作的美国人。他在日本遇害后被抛进了大海。据东京的报纸报道说，他是在一起偶然事故中溺水身亡的。

第四章

1. 我的新谍报长官

第二天上午 11 点，我如约去见土肥原。传令兵刚一通报，土肥原就走出他的办公室要我跟着他走。我随他穿过一个花园，走进紧邻特务机关署的一个大宅院。

这个宅院原来是属于一个名叫加伐尔斯基的波兰人的。日本人强占了它，拆除了分隔两个庭院的墙壁，并在其间建造了一个花园。

我们走进左边的一道门，门里是一个大房间，有 5 个日本人正坐在写字台后面。土肥原用日语和其中的一个相互问答了几句，那人鞠躬以后，走进一扇用幕布重重掩住的门里。几秒钟后，他出来要我们进去。

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房间的一角，一个日本人正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后面。他是一个满面喜气的人，大约 45 岁，穿着普通便装，眼睛里闪出异常机警的光。

在我为这个神秘的人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我始终没能弄清他的姓名和真实身份。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参加任何盛典、出席任何宴会或是到任何人家中去做客。他每次秘密外出，都可以随意调用飞机或汽车。凭着多年间谍工作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要问他工作以内或以外的任何问题，我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虽然我暂时还没有被人监视，我的任何可疑行动

也不会被报告到他那儿去，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位新上司仍然有可能因为任何一点儿小事随时把我一枪崩了。

有一次，我对他说犹太人毕竟不全是坏的，他几乎要当场毙了我。但是，他最初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位十分温和的绅士，他说着一口极为流利的英语，对前来与他见面的人彬彬有礼、照顾备至。

土肥原用日本话与他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回头用英语对我说：

“维斯帕先生，这位先生就是你的新长官。从今往后你必须忘掉我的面貌以及你同我见面的事。今后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再见面，你都必须做出完全不认识我的样子。祝你好运。”说完，他向我的新长官鞠躬，而后离开房间。

我独自面对我的新长官，他仔细打量着我。

“请坐。”他说。

他的英语讲得几乎接近完美，这在日本人中是少有的。我想他一定是在国外住过许多年，或许是在美国吧。初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非常鲜明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后，我还记得他所说过的每一个字。

“维斯帕先生，我不必问你是什么人。我这儿有你一切活动的全部记录，从1912年你在中国落脚直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谍报员曾在中国、满洲、蒙古、西伯利亚和俄国跟踪你。许多日本将领，如田中大佐和寺内中将等，都很器重你。这就是我们的军事当局认为你没有反日倾向的原因，有些人甚至还相信你是亲日的呢。总而言之，我希望我们互相了解，你与我们共事没必要担心什么。如果土肥原大佐对你说过什么使你感到不愉快的话，请你不要把他放在心上。有几个外国人随口说

他是日本的劳伦斯，他从此就喜欢用一种鲁莽的态度来显示他的与众不同。说老实话，他在我的手下工作过许多年，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远远比不上劳伦斯。他犯过许多次丢人的错误，可外人都把这些错误算在整个日本谍报机关的头上。举个例子，你能说张作霖之死是一个杰作吗？”

我无言以对。过去，我也曾听说日本人内部相互仇视和尔虞我诈，但我总怀疑这种传言是出于一种反日宣传，现在，我不能不承认这些传言的正确性了。否则，我的新长官怎么会公然承认张作霖的被害是出于日本参谋部的命令，而土肥原正是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呢？

我暗自吃惊，但保持沉默。

长官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奇怪我为什么对你说这些。我承认日本人正努力使全世界和国联相信：满洲的独立是反对旧统治的人民革命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用不着欺骗你。因为你和我就要在一起共事，我必须对你坦白，使你明了日本的方针。对你的能力和经验我了解得非常充分。我知道，如果我对你还去重复我们对国联讲的那堆废话的话，你会耻笑我的。”

他看了看他的手表。

“12点了，你先去吃午饭，两点钟再回来。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工作要点——我们有许多大事要做。再见。”

2. 日本特务机构的使命

两点钟，我回到新长官的办公室，他开始向我宣讲日本的侵略政策：

“日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负担不起因为占领满洲而花费的高额费用。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设法让满洲的中国人支付这笔巨款，同时，又不能让国联和其他国家的人指责我们。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头等大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局已经开始向那些可靠的商人暗中发放垄断经营权，这些独占权包括在中东铁路走私货物、独占经营鸦片烟馆、毒品专卖、栽种鸦片、输入日本妓女、开设赌局，等等。获得独占权的商人会向日本政府缴纳巨额款项，因此保护他们的利益就成了我们谍报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还要用间接的手段强迫中国人和俄国人——尤其是有钱的犹太人——交出他们财产的大部分……我们必须做得很灵巧，使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日本人所为。”

我被这些话的坦白所惊骇，呆坐在那里。长官点起一支烟，吸了几口，仰望着大窗户外的天空。他抛掉烟，继续说道：

“这几天，有 50 多个与我们相识的中国土匪将从沈阳过来与本地流氓接头。我们要在北满组织 1000 到 1500 名这样的人随时准备执行我们所发出的任何命令。土匪有许多用处，比如，让他们袭扰苏联的各条铁路线，使它们陷入瘫痪；绑架富人，迫使他的亲人支付高额赎金；袭击中国乡村，等日本军队一到就逃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感谢；假装袭击日本军队，我们就可以实行剿办和撤退居民，并向那个区域输入日本移民……

“在哈尔滨，我们必须找出 20 多个能够‘办事’的强悍的俄国人，他们必须善于使用短刀和手枪，而且能闭紧嘴严守秘密。我们还需要 10 多个熟练的扒手，他们必须机警聪明、衣冠华贵，知道怎么对付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住在

满洲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旅行者皮包里的文件和信件。要让我们明目张胆地搜查外国人是很难的，他们会没完没了地提出抗议。可如果是俄国扒手偷了他们的皮包或是行李，他们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和北满其它地方都有许多俄国侨民团体。你，维斯帕先生，在满洲居住了 20 年，当然了解这些俄国侨民组织的一切。我要你就这些组织团体的性质、纲领、活动以及负责人的简历写一份详细报告。我们要消灭一切对日本有不亲善倾向的社团和组织。同时，我们也需要用俄国人的名义来掩护我们的行动。我们要把这些俄侨团体改组为反对苏联的有力武器。我们要让那些不太聪明但有野心的年轻人来负责这些社团，他们贪婪、卑鄙而又缺乏爱国心，他们的虚荣心会使他们为了一官半职而乐意为我们做事。你的任务就是从俄侨团体中选拔这样的人。”

我把我的任务记录下来。

“在满洲有 4 万苏联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做着赤化和反日宣传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想尽办法迫害他们，我们的工作原则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我们必须把每个混帐野种都驱逐出境。至于那些我们无法驱逐的，我们要让他们每一分钟都不得安宁，直到他们自愿离开。

“除此之外，北满还有 7000 犹太人，满洲最大的外国公司都归他们所有，多得数不清，以至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一面外国国旗插在门前，里面就肯定藏着一两个犹太人。虽然这些犹太人全都出生在俄国，可他们大多加入了其它国籍，有些变成了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还有些成了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波兰人。我们不能公开地直接为难他们，尤其是

对那些享有治外法权的犹太人。但是我们要用间接的办法给他们制造麻烦。我们可以找借口拘捕那些与犹太人做生意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让他们明白，与犹太人做生意是非常危险的。

“哈尔滨还有许多外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他们都享有治外法权，其中一些人是美国或英国的间谍。我们必须随时对他们严加监视。他们总以为他们的国家在远东有什么特权，所以日本每次行动他们总是编造一些愚蠢的理由来干涉。我们日本人根本不承认他们那些特权，整个东方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必须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高丽、满洲、蒙古、中国和西伯利亚将成为一个帝国——日本帝国，臣服于我们的伟大天皇。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文化传播给被我们征服的人种，因为这些人种终将被我们消灭，只有天照大神的后裔才配作我们帝国的人民。下一步，我们就要征服印度和太平洋的一切岛屿以及西伯利亚以西的乌拉尔山地带。你不要笑，神是不说谎的。日本的命运是由神明来决定的，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住日本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帝国！”

“你千万不要被我们内部的政治暗杀、经济危机以及各种争斗所迷惑，这些事情并不是腐败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正是爱国精神的体现。每当有日本人因为拖欠外国人债务、房租和其它钱财而被告到法庭上的时候，外国人都对日本的司法官不肯强迫被告偿付欠款表示惊奇，这些人其实是不懂得日本哲学的基本原则。你想想，作为日本司法官，一个神明之胄，怎么能够去强迫另一个神明之胄去给野蛮民族、命该毁灭的种族付钱呢？这种事情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叟得斯卡？”我不由用日语说了一句（意即：是这样吗？）。

“不，不！不要说日本话，我们日本人不愿意听外国人说我们的言语，就象是亵渎神明似的。日本的语言是专供神明之胄使用的，它是天照大神的语言。我一听见外国人说日本话就想绞死他。咱们还是说英语吧。不论什么时候，我一想要骂谁，就总是说英语。

“记住，除了与日本人有密切关系的事件外，我永远不会出面、永远不会作证。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做我的中间人。过去，不论是俄国人还是欧洲人，都不许直接向我报告或走进我的办公室。现在，你可以不经请求或通报直接见我。因为我相信你，所以给你这种特权。但是，因为你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所以，我随时可以把你枪毙掉。况且，现在你的家属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你最好还是尽忠职守。”

不论这位满洲日本情报长官说些什么，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泰然自若的样子，看上去似乎对一切都很适应。可是，从他毫不掩饰的话语里，我越来越明了日本人的肮脏勾当，心里也就越来越强烈地升起一股要冲上去扼住他咽喉的欲望。他是如此冷静而又精密地计划着成千上万个善良无辜者的灾难和死亡，而且对我说得那么露骨，就象是认定我永远逃不出他的手心似的。我恨不得立即反抗，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我自己和我的家庭。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根本无济于事，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并不会因此而停止转动，他们立刻会用其他零件来顶替我的。我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坚持倾听到底。

“我给你的这些训令，也给过北满日本谍报机关的一切首脑。我是能够对你发令的唯一的人，除我而外你不必向任何人作汇报。不要让你的部下知道、哪怕是猜测，你是在替我工作，我是你的长官。你也永远不会知道我对你的命令是从何而来。

对你的主要助手也是同样，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谁在幕后向他们发号施令。我们的情报工作并不象一道连环，一环不必连着下一环，倒是必须点点相续，既无直接联系，又起到和谐一致的作用。那么，纵然敌人抓住一个，他也无从发现其他人。

“我看你记笔记，这是一种坏习惯。笔记本容易丢失或被偷。最好是全靠你的记忆。我听说你的记性很好，这是你的一种长处。现在去吧，明天就开始工作。”“请原谅，”我说，“你提到别的谍报员、我的主要助手们，我可以问他们是谁、在什么地方吗？”

“别担心这个。到适当的时候你就会认识他们。现在你先去给我准备那份关于白俄组织的报告吧。”说着他向我伸出手，我与他握过，走了出来。

走回家的路上，我恍如梦中。一切都是那么难以置信，他竟然那么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如此多的黑幕。现在我才知道，过去我所听说的日军在高丽的大屠杀以及许多我不曾相信的故事，正如过去的4个月间东北地区的种种恐怖传说一样，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最令人痛惜的是，全世界都曾经帮助并武装了他们。如今，他们摘下了假面具，露出狰狞的真面目。他们残酷无情、缺乏道义，对别人的苦难熟视无睹，他们穷凶极恶地杀害了数百万人却毫无悔意，还傲然自称是“神明之胄”！

现在，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正被逼迫着作日本人丑行的帮凶。反抗的暴风在我的心中激荡，我多么想加入那些中国的抗日队伍去“打鬼子”，我宁愿在艰苦的环境下勇敢抗争也不愿投降。但是，一想到我的家庭，我周身沸腾的热血就不由凝固住了。如果我任由自己的感情冲动，我的家庭会变成什么样

子呢？我的勇敢的妻子、我的可爱的儿女、还有我那衰老的岳母会怎么样呢？在这些残酷的迫害狂手中，他们将要遭受怎样的折磨呢？理智告诉我，我现在只有忍气吞声，等待着有一天机会的到来。一旦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的一切努力都已无济于事，那么我会立即采取极端行动，但现在还不行。

从这一天起，差不多有5年之久，我期待并寻找着逃离东北的机会。对自由的渴望使我忍受住了我亲眼所见的种种恐怖情景，也使我忍耐着狂妄恶劣的日本人对于手无寸铁的人们的百般侮辱。

第五章

1. 影，好一个中国土匪

1932年2月25日，我的长官叫我去新城大街上的日军司令部，说是有人在那里等我。

在那儿迎接我的是一个讲着一口流利的俄语的中国人。他把我让到上位，就象是在他自己家里一样。一个仆役送上烟茶后，我们按照中国的礼仪，在未谈实际问题之前，先互相问候彼此亲属的安康。客套一完，他突然说道：

“维斯帕先生，你就要见到一位你的老相识了。”

“我的长官让我见谁都行。”

“很好。但是，你的这位老相识和你的长官毫无关系，他甚至不知道你的长官，而且将永远不知道。他将听你的指挥，你负责给他执行命令所必需的经费。别的事均与他无关。”

“很好！什么时候我和他见面？”

“我们现在就去。请吧！”接着，他又一次警告道，“记住，不要提我们的长官或日本人！”

一辆日本军用轿车正在门口等着我们。我们一坐上去，车立刻就开了，过了新城大街又向左转。

司机和坐在他身旁的人说了几个字。

我觉察他们俩都是俄国人。

10分钟后，车停在一座大宅院前。大门立即就开了。

当我们走进接待室的时候，我看见 4 个手提机关枪的中国人。我还来不及看清他们，一道门闪开，一个胖胖的中国人笑嘻嘻地迎向我。

我认出他，吃了一惊。

站在我面前的是远近闻名的袭扰东北各地的著名匪首，他有 20 多个名字：王建治、林秉直、马秀之等等。

我的向导说的不错，王是我的一个老相识。我和他的最近一次相会，是在满韩交界的一个叫王堂台的村子。在那场遭遇战中，我的 3 个部下和他的 9 个土匪都永远地葬在了那里。当时他的胸部和右腿上各中一弹，我捉住他并把他送到了医院，诊治他的中国大夫说他快要死了。可是 4 个月后，他逃出监狱，重操旧业，而且比以前更有活力。

他现在正笑嘻嘻地看着我。

他伸出手来，我们的手握在一起。

王是个勇敢而又爽直的人，从来不怕公开宣布他是什么人和他正干着什么营生。倘若日本人也能够有这样的爽直该有多妙！纵然要因侵略行径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和蔑视，至少也还有可敬之处。

“再见到你真高兴，维先生，”他说，“我们现在要一起合作，真是太棒了。我要告诉你，你从前跟我作对的事儿我已经忘了。你也忘了吧。打今天起，一切都重新开始。”

他转向那 4 个远远站着、全副武装的中国人，说：

“喂，伙计们，都过来！这位先生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维先生。从今往后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对他都得恭敬从命。谁要是敢在他面前撒野，就别怪我不客气。都记住，这是我的命令。谁要是不尊敬维斯帕先生，那就是不尊敬我，那样的混

蛋就该死！”他又转过来对我说，“维先生，这是我的四个帮手，铁、石、心、肠。”

· 4个人上前对我鞠躬，然后我们大家握手。

在这段日子里，我握过不少自称为军官、宪兵和文明人的日本强盗的手，现在，握着这些不怕承认自己是土匪的中国人的手，我反倒觉得踏实和愉快。

陪我来的中国人沉默好久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土匪。他的皮肤是黄白而细腻的，指甲养得很长，显然是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城市居民。他在自我介绍时，并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却说：“我承我们长官看得起。”

王举手示意，一道门打开了，我看见一张大台上摆满了中国的珍馐和俄式大菜。

“我想，”王对我说，“我们最好随便吃点儿东西来庆贺我们的重逢。你肯赏光尝尝这些小酒野菜吗？”

我们笑着坐下。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些穿着中国服装的侍役们，全是日本人。凡是在东方住过多年的人，都能够迅速辨别这两个国家的人。

气氛渐渐活跃起来。王喜欢讲述当年我们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上时发生在我们之间的那些事。他谈论张作霖大帅，谈论其他中国要人，其中还有几个做了他的刀下鬼。他也谈论到日本、中国和欧洲的政治。

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是那么博闻强记，我不能不对这个匪首另眼相看。

一个侍役走近陪我来的那个中国人——这个人始终没有加入我们的谈话——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日语。他马上转向

我，让我到外面去接电话。

“哈喽！”

“哈喽！维斯帕先生吗？我是情报班长。你吃完饭后立即到我这里来。”

“是，长官，我就来。”

我回到餐厅里，陪我来的中国人就起身道歉，说是还有其它要紧事，告辞了。我送他到门口，并对他说：“希望我们能再见面。”

“我恐怕不能了。今晚我就要到南方去了。”

由于我的长官训诫过我，不要问其他间谍或与特务工作有关的任何人任何问题，我就不再说话了。

回到桌上，王命令侍役拿香槟来。这时，啤酒和烧酒已经使每个人都显得十分亢奋，王尤其高兴。

他不断重复说着和我重逢是怎样开心，将来我们一起合作怎样了不起。

“我再专心干5年，那时我的钱一定够养老的了。我要住在中国内地的外国租界里，那儿有我的许多朋友和同行。要不然我就去留洋。所以现在我必须干活挣钱。能在你的手下真是荣幸。为了纪念新生活的开始，我要取一个新名字。以后我就叫作‘影’。维先生，你也应该给你自己取一个新名字。”

“不，谢谢，我还是用我那老名字吧。”

“好吧！我听说意大利文的‘维斯帕’是说一种带刺的小动物。我们中国话叫它‘蜂’。那么，我们就叫你蜂吧。来，伙计，把酒杯都斟满，我们要庆祝蜂和影的健康。”

喝完祝酒，我说我要走了。一个侍役立刻就告诉我，车正在门外等着我。

影硬要把我送到街上，催促我尽快告诉他，我们要一起做哪一类的工作。

我们告别后，我坐进车里，发现还是那两个俄国人坐在前座。

2. 长官发狂

“唔，你在王家很快活吧？”我的长官面无表情地问道。

“请原谅，王已经死了。他现在是影。”

“是的，我知道。你是蜂。”

“那日本侍役已经把我们的谈话通过电话告诉你了？”

他微微一笑，说：

“听着，影——以后就这样叫他——已经替我们工作了 20 年，可他并不知道他接受的是日本人的命令或金钱。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日本军官交谈过。好，现在谈我们要做的事吧。影已经带来了 36 个人，每一个都是经过考验，证明可靠的。大约需要五六个星期的时间，你要带他们从当地土匪中选出我们所需要的 1500 个人来。他们全将接受你的指挥，与你单线联系。千万记住这一点，绝不可提到我或日本人。影和他的部下都是绝对相信自己是在替苏联政府工作的，他们中的部分人以为自己在替美国工作。无论如何，你必须不露声色地使他们猜想，这次他们是在替欧洲人干。大约 10 天之内，影必须召集足够的人数使我们能够开始行动。

“我已经吩咐宪兵司令征集一批什么也不怕的俄国人——敢放枪的人、铁石心肠的人、能够闭紧嘴巴而且毫无良心的人。我原想直接指挥他们，但又觉得这不太方便，我要避免

和欧洲人有一切直接关系。你是一个欧洲人，但你现在入了中国籍。即使我枪毙了你，我也用不着去对任何人解释什么。当然，我并不想这么做，恰恰相反，我相信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而且不久我就能够完全信托于你了。

“这是宪兵队选出的俄国人的名单。考察他们，写一份报告给我！我要把你的报告和宪兵队的评语比较一下。我不信任任何人，维斯帕先生，我接到的各种报告都需要我严加审查、多方审核。我必须掌握真实情况。

“那些俄国流氓将要帮助我们敲榨那些我们讨厌的富裕的犹太人和俄国人。我要把他们的财产夺过来，把他们踢出满洲。他们离开的时候，只能带着空钱包。”

“犹太人也不全是坏的，”我大着胆子说，“我知道在满洲的许多犹太人都还是十分本分地在做生意的。”

我没有想到，我的长官竟然一下子跳到了我的面前，好象要一把扼住我的咽喉似的。

“你敢对我这样说？你敢替犹太人辩护？你再说我就掐死你！犹太人全是猪！欧洲人全是狗！这就是我们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和太平洋的原因。犹太人更坏！你敢说你觉得他们不坏吗？犹太人掠夺与他们做生意的每一个人！我要剥了犹太人的皮！我给你的名单上的那些俄国人就是要替我们去干这件事的。我们日本人才不愿意弄脏我们的手呢。你干嘛不看看我给你的名单？”

我看了看那份名单，上面有10个名字。

“有你认识的吗？”

“差不多全都认识。他们都是些积案很多的刑事惯犯。”我回答。

“他们是最合适去讹诈犹太人的家伙。你以为我们该雇些学者或是道德家去干这事吗？”

他半闭着眼睛看着我，嘴上挂着一丝讥讽的笑。他继续说着：

“你知道，你让我非常吃惊。我听说你是一个十足的魔鬼，没想到你是这么优柔寡断、满脑子道德教条。你在张作霖和杨宇霆手下究竟是干什么的？张本身就是个土匪，你跟了他十多年，这足够把你变成一个头号土匪了。回答我。”

我强压怒气答道：“关于张大帅的出身有种种故事和传说，我也难辨真伪。我只知道，他是统治东三省的高明长官。在他的治理下，近 20 年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从其它省份来到这里安居乐业，就是明证。我在张大帅手下这么多年，从没见他本人讹诈过任何中国人、俄国人和犹太人；不仅如此，只要政府官员有讹诈行为，那家伙的脑袋就得搬家。另外，如果你认为我不适合干这种工作，如果你嫌我优柔寡断，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强迫我去工作呢？你最好是让我带着我的家眷到中国内地去。”

“你和你的家眷都要住在这里，”他坚决地说，“拥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人一律不准到中国内地去。他们只有三条路可走：替我们工作、当和尚或是被枪毙。以你而言，因为你是欧洲人，不能做和尚，所以只剩下两条路：替我们做事，变为满洲国的好百姓，否则枪毙。你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住了 29 年，你知道每一片乡村，知道这些人民的言语和习俗，你知道谁好谁坏，你替张作霖做过有价值的工作，而且你将要为我们做同样有价值的工作。老实说吧，如果你是单身汉，那么我一定枪毙你，因为我不能信任你。如果你是单身汉，我相信你早已作了

土匪头子，给我带来无限的麻烦了。但是你有一个家，你衷心爱护的家。我相信只要我们监视你的家，你就会施展你的本领，忠实地服侍我们。如果你要反叛，你的妻子、儿女和岳母将要遭遇怎样的事故，你是知道的。不要再和我谈到中国内地去。从现在起，你只有一条路：执行我的命令，放弃你的良心。把良心交给我们吧，我们是能对你负责的。我担负你的一切道德的责任。你的宗教是什么？”

“天主教，长官。”

“天主教？看你赞赏犹太人那样子我就估计你是天主教徒了。好，我们不谈这个，还是讲任务吧。日本运输公司国际联运会社，已经取得了在中东铁路上以日军给养名义免费运输商品的垄断权。他们为了获得垄断权付出了大宗款项，所以，接受这宗款项的日本军事机关必须给他们一切必要的保护，一切私人公司要想不付苏联铁道运费而减价运输货物，也都必须去请求国际联运会社。

“现在有不少宪兵军官、甚至陆军军官常常帮私人公司减价运输货物，而后把赚得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这是不允许的。这些钱必须归入日本军事金库。我们不能触动那些军官，但必须设法绕过他们，惩罚货物的所有者。你和你的部下应该注意的是，除了垄断公司而外，什么人在运输货物。当然，国际联运会社将会给你们提供他们知道的情报，使你便于工作。”

“可是，一旦苏联当局得知大宗货物没付运费的事，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他们能说什么呢？铁路是在我们日本陆军的手中，如果日本付给苏联政府任何款项，那对他们来说是件可耻的事。更何况，中东路不久就要属于我们。我们要

自己拟定一个价格来购买它，否则就用武力来夺取。苏联政府是什么东西，呃，一群虚张声势的家伙。苏联陆军是只纸老虎。他们的海军也是一只纸老虎。今天我们占领满洲，明天占领华北和蒙古。然后我们就要向全世界表示，苏联的统治者是怎样一个虚张声势的大骗子。倘若我们愿意出几百万买下中东路，那是因为我们要不付一分钱就得到西伯利亚大铁道——连西伯利亚的土地在内。我们一得到中东路和西伯利亚，我们就要发动我们的强大海军，向南方进发：菲律宾、越南、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几内亚、澳洲、印度……”

这位日军驻满情报局局长说到日本的侵略计划，大为兴奋，满脸通红，好象要突然中风昏倒似的。

沉默了一分钟，他才较为清醒地说道：

“明天傍晚 6 点钟，你到新城大街日军司令部去见蔡增志，他将给你介绍 5 个直接在你指挥下的特务员。每个特务员手下都有 10 多个助理特务员。不要让助理们知道他们是替你工作的，也不要让特务员知道你是在替我干。跟这几个人接好头后，你就来我这儿，我还要给你另外一些指示。”

第六章

1. 与我的助手们会面

第二天下午 6 点我到司令部去找蔡增志。一个日本军曹引我走过庭院，来到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摆设的大房间，把我单独留在那里。几分钟后，一个大约 40 岁的中国人，穿着西装，走进来问我是不是维斯帕。

“是的。”

“欢迎。”

我们握手。

“请坐，等一等。”

一个日本军曹送来烟茶。

我们坐下交换了几句客套话，听见一辆车在门外停住。

“带他们进来。”蔡对军曹说。

当 5 个人被领进来时，我认出其中 3 个是俄国退职军官。

蔡对那 5 个特务员说：“这是你们的长官，不论他发给你们什么命令，你们必须绝对服从，你们自己和你们的部下都要忠实执行。你们的任务和你们的薪水都由他发给你们。你们不得接受其他任何人的命令或与任何人联络。”

然后，他对我说：“这几个人是你的助手，他们是第一号到第五号。谁也不必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我要走了。”

蔡走了。我单独面对着我的 5 个新助手，我说：“现在我只

有一个命令，要你们查看在中东路上作为军用品免费运输的货物是否由国际联运会社经手，不是的话，是不行的。”

然后我告诉他们在正午 1 点钟的时候，到我的住处向我汇报。那住处是日本特务机关第二部的公署里的一个房间，日本人强迫我必须住在里面。

散会后，我去见我的长官。

“你看你的助手们怎么样？”我刚一进门，长官就问道。

“我认识其中的 3 个，是俄国退职军官；另外两个我不知道，看上去象是军人。”

“你的眼力不错，他们全是俄国退职军官，文化人，不是刑事犯。你只要用他们的头脑工作，别让他们去做强暴的事。你会和他们合得来的。

“另外，麻醉剂专卖权已经卖给一家日韩合资的大公司了，它在哈尔滨的代理人是一个叫竹内的律师。这家公司在全国有垄断鸦片、海洛因、吗啡和可卡因商店的专营权和批准中国人开设烟馆的许可权。我听说这家公司为得到这些权利向日本军事机关缴纳了好几百万。所以我们必须保障他们的利益。

“还有，日本宪兵也想插手这桩买卖。他们分头去找麻醉品贩子和鸦片烟馆馆主，许诺要保护他们。警察不敢关闭宪兵保护下的铺子，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的职责是把由控制垄断权而得来的款项归入日本军事机关，而不是宪兵军官的私囊。你必须把这一点明确地告诉你的部下。

“说到赌博，除了哈尔滨以外，中东路沿线各个城市的赌博专利权都已经卖给了一家由朝鲜和亚美尼亚合资的叫金阿巴利的公司。这家公司有权在铁路沿线任何地方开设 20 家赌

场。在哈尔滨只有一家赌场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得利润要由我们和几个俄国团体来划分。我们必须保障金阿巴利公司的利益，即使在哈尔滨也不例外。

“中东路沿线的娼妓、艺妓和舞女的垄断专营权已经卖给了日本公司，它在哈尔滨的代理人是一个叫木良田的公证人。只有他们有权从东京、大阪和其它都市输入日本女子。宪兵军官也想自己经营这个行业。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取缔制度，制止垄断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包买包卖日本女子。

“其次是保险免税输送货物进入中国的专营垄断权。这种权力已经卖给了满铁会社，它在哈尔滨的代理是国际联运会社。只有他们有权向中国输送货物而不用缴纳关税和运费。要完全控制这件事很难，在边界线上有不少军官借着保护私贩营私肥己。我们必须机警敏捷，凡是勾结任何军官做这种事的任何人都要加以逮捕。

“现在说到苏联侨民。他们在满洲有好几千。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都是些讨厌的下流胚，不消灭掉也得用搜查、迫害和拘捕的手段使他们走开。”

“如果没有什么理由就去拘捕他们，我们会惹出大麻烦的吧？”我问。

“没有理由？一个特务长怎能不知道如何找出一个好理由呢？你每次去搜查苏联侨民住宅的时候，总要想出一个理由呀。我告诉你，日本特务机关第二部，就是你住的那个地方，已经奉命为你准备好了各种材料，诸如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从俄国、美国或任何其它国家寄来的各种信件，它们都盖着那个国家的邮戳，还有根据各种需要伪造的各种文件。有了这些东西，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对任何人施行任何逮捕。我们还有中文

的共产党宣传册，这是用来对付中国人的，尤其是那些有钱的中国人。日本是贫穷的，而日本在满洲的军队每天要花费几百万。我们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减轻这种负担。有好几千富足的中国人，他们的钱都是作土匪、将军和贪官之类积累起来的。我们必须夺取他们的不义之财才算公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用各种方法骗取财富的犹太人。现在该轮到他们尝尝被敲诈出油是什么滋味了。

“下令给你的部下，叫他们调查和报告哪些犹太人最富有，找出他们的银行存款簿，考察他们自己的产业是否要出卖。所有报告必须准确，否则，交来错误情报的人就要倒霉。我有 3 个象你一样的秘密特务员，我要用他们 3 人的报告来鉴别其他人的。要是让我发现谁的报告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那处罚会是很严厉的。”

“等到一切调查和准备工作就绪，我们就开始行动。倘若干得好，那么大家都好，反之，将非常糟糕。我不许有一点点错误、一点点马虎。记住！”

“我不会忘记。”

“你要在什么地方见你的那些助手？”

“我约他们在正午 1 点钟在特务机关第二部指定给我的房间里见他们。”

“很好！关于保护那些垄断权以及如何尽力对付那些苏联侨民的事，你必须准确无误地指示他们。”

“留心听着。明天晚上 9 点钟有两名叫克鲁庇尼和萨比洛的俄国人要到大马沟车站上车。你命令你的一个特务员去把他俩杀掉。他们对日本人要两面派，这就该死。现在，你去吧。”

我去见我的 5 个助手，命令他们保护各种垄断权，然后我

问他们谁认识克鲁庇尼或萨比洛。

我的第2号，他的名字叫巴士图京（虽然他并不知道我认识他），回答我说他知道他们，并说萨比洛并不是俄国人，而是波兰人。

“不管这些，我需要的是杀掉那两个向双方讨好的东西。他们明晚到大马沟去搭车的时候，你去干掉他们。你再找几个适合干这种活儿的人。”

克鲁庇尼被杀掉了，但是，萨比洛却毫无损伤地逃走了。

2. 官办垄断卖淫业

在我哈尔滨住处的隔壁，住着一对日本的青年夫妇，叫田上喜之卫和千须子。田上是满洲财政部的顾问（在满洲的日本人没有被称为职员的，全是顾问），身材矮小、素质极差、英语程度也很低。千须子则是一个海军大将的女儿，东京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擅长英语、法语和德语，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能书善画，还会打网球和高尔夫球。一句话，她是一个高雅、多才的女子，而且非常好看。

可是田上却很少与她说话，更谈不上什么和蔼的口吻。他不请仆役，让千须子尽心服侍他，操持一切家务，洗濯、烹饪，从早忙到晚。当他下班回来的时候，她要替他脱鞋、洗脚、穿拖鞋。然后她要摆上饭桌让他吃饭，而自己却要往来于厨房之间，等他吃完饭后，才能坐在桌子的一角，谦卑地吃着残余的东西。

差不多每天晚餐之后，田上都要去茶室之类的地方和艺妓玩儿到半夜，到凌晨两三点钟回来，疲倦而且瞌睡的千须子

必须起来迎接他，因为日本女人是不能在男主人未入睡前就寝的。

田上年轻美貌的妻子在各方面都优于他，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日本女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奴隶。她是专为服侍男人而生的——服侍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她的儿子或工厂主和妓院老板。日本女人的教科书上第一页第一句话就是：

“男人高如天，女人低如地。”

日本男人因为有着如此妄自尊大的信条，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女人当作了他的奴婢和机器了。这信条适用于各个阶级，无论贫贱富贵。要说例外，只有少数学了点儿西方文明皮毛的日本男人在外国人面前对他的妻子有些礼貌，这多半是出于装装体面而不是出于真正的尊重。日本的贵族太太往往对男仆也要先鞠躬，因为她知道自己毕竟是“低如地”，而他则“高如天”。

日本的丈夫，不论属于什么阶级，都不会把他的妻子当作平等的同伴，纵然她的教养高过他十倍。

T. 欧科罗教授曾在东京军官学校和其它大学任教多年，娶了一位日本的贵族女子为妻，在日本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并写下了著名的《日本的威胁》一书。关于日本的妇女问题，他写下了如下意见：

“日本妇人在本质上是比普通男子更为聪明得多的。在西方人看来，她同样是优雅精细的，只不过她的自觉卑下的意识使她不敢反抗。

“日本男子的唯我主义是毫无限制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推理上。他可以把艺妓或是娼妓带到家里来，他甚至可以命令

她替他自己和他的临时情妇铺床叠被，并要他的妻子站在那里听候呼唤和指使。妻子被叫去再烫一瓶米酒来，她明明知道这是在为他们的寻欢作乐服务却要忍气吞声，因为，不服从就会遭到遗弃。她的丈夫随时都有权给她一纸休书让她离开这个家，这对于日本妇女来说，是最大的侮辱。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位日本新娘站在寝室门外等候新郎召唤的情景。她才 16 岁。结婚刚刚一个星期，那丈夫就带回了一个娼妓。他命令他年轻的妻子铺床叠被并在门外伺候。当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跪在稻草褥上，紧紧攥着自己的手，伏下身子，把头撞向地板。我觉得她似乎是要把自己脑子里的苦痛撞出去。晶莹的眼泪流过她的面颊，她用力咬住嘴唇，鲜血从嘴角流下。突然，她抓起自己和服的一角，发狂地撕扯它，而后把它塞进颤抖的嘴中试图去堵住悲愤的叫喊……我的到来显然使我和那位丈夫都很尴尬，所以有半年之久我避免再去他家。谁想命运偏偏捉弄人，当我再次踏进他的家门时，又遇到了同样的事。这一回，妻子正在安静地读着一张报纸，当她看见我时，先是鞠躬，而后微笑着起身跑来迎接我——她已经习惯于这种服从的生活了。”

1932 年 4 月初，千百个日本女子由独占公司从日本输入满洲，用以供给妓院、茶室、酒吧、舞厅以及饭店。在日本人看来，这种贩卖妇女的行业并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它与其它职业同样正当，因此许多日本的大公司和银行也都在这个行业里大量投资。

在哈尔滨，独占专营输入日本女子的公司就开设在托尔戈伐亚大街上，门口由日本宪兵守卫着。不论国籍或人种，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订购 100 个或 1 个女子。如果是开大妓院的

娼主，就会被衣冠楚楚的秘书引到一间欧式陈设的漂亮房间里，翻看大本的影集。影集上的每幅照片旁边都有一段说明性文字。比如，是否是处女，高矮胖瘦，文化程度以及歌舞技艺之类。人选一定，双方签订一份包用价格和包用时间的合同，大多数的合同期是5年，娼主即付25%的包银。

半个月或20天后，娼主就会接到一个银行的通知：货物到了，请支付货款的另外75%。于是娼主到银行交清货款，取得收据，把收据交到独占公司，公司就派职员陪他到一个储存女子的日本旅馆当面交货。

照哈尔滨的惯例，每当一家妓院买到一批新的女子的时候，都要把她们打扮起来，装在彩车上招摇过市。车上有大幅广告，写着这些新来的姑娘们的种种优点，而写得最明显的，自然是妓院的地址。

从此以后，那些女子就成了合同拥有者的绝对私有财产。他可以随意处置她们，任意剥削她们。根本没有保护这些不幸的妇女的法律。她们完全在茶室或妓院老板的掌握之中。

日本娼主的兽性在远东是臭名昭著的。在他们手中的女子被当作奴隶、走肉，专供他们践踏、辱骂、毒打甚至杀害。假如有一个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会把搜索她当作自己应尽的职责，好象她是一个越狱的囚犯似的。当她被押送给她的主人时，主人就会更为严厉地处罚她，以儆效尤而严禁再犯。

当合同期满的时候，这些女子就回家去结婚，尽力替天皇生养孩子。她们常常这样说：“18个月后我的合同期就要满了，我要回乡去和父母替我选定的男人结婚。”

日本宪兵是绝不会放过任何从罪恶中赚钱的机会的。他

们未经独占公司许可，就在城区各处开设了许多妓院、俱乐部和茶室。缴纳过巨额款项的独占公司立即向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提出抗议，当局又把这些抗议转给了我们。

我的谍报员开始不断送来有关宪兵非法经营妓院的报告，这下可把我的那位长官难住了。假如他去查封那些未经独占公司许可开设的场所，那些宪兵军官可不是好惹的。更何况，他压根就不想去得罪那些无视任何权威、权力无边的宪兵。可是，如果什么也不去做的话，他又如何向他的上司交代呢？

他把这件事研究了好几天之后，终于叫我命令影派他的土匪去奇袭那些非法俱乐部、茶室和烟馆，抢掠那里一切值钱的东西，如遇反抗的话，就把对方杀死。

我和影讨论这项任务，决定首先袭击刚刚在马家沟开张的一家俱乐部。我们知道这家俱乐部是日本宪兵包办的，其中有 40 个日本女子，设有赌场、烟馆和麻醉剂销售处。

影派了 20 个人去执行突袭任务，告诉他们要什么就拿什么，然后放火烧掉那个俱乐部。日本宪兵听到风声，在俱乐部周围布置了警卫。当影的部下就要接近目标的时候，却被迎面扫来的一阵机关枪子弹打死 3 人，打伤 7 人，其余的只得逃跑。

影勃然大怒，发誓要为弟兄们报仇。两夜之后，一股土匪闯入由日本宪兵包办的两家烟馆和一个赌馆，当场杀死 3 人，给了每个瘾君子和赌徒一顿好打，并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第二天夜里，卡萨其卡亚街的一个烟馆也遭此劫，两个企图反抗的馆主和两名吸客被杀。

3 天之后，那些暴怒的日本宪兵搜查了独占公司的几个

妓院、赌馆和烟馆，抓走了 50 多个顾客，说他们全是共产党。独占公司意识到如此下去对自己毫无益处，于是设法与宪兵调停。

独占公司与宪兵军官坐到了一起，和议成功。独占公司允许日本宪兵经营 5 家妓院、5 家烟馆、1 家赌馆和 1 个吗啡商店。这不算多。因为在 1936 年间单是哈尔滨就有 112 家妓院、56 家烟馆和 194 个吗啡商店。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共有 550 家合法妓院，拥有 7 万名日本妓女。

3. 毒品和堕落

由日本独占公司承办的、遍布满洲全境的卖淫业固然可怕，然而更为穷凶极恶的，则是日本麻醉剂的垄断独占业。

日本侵占满洲才几个月之后，整个满洲，尤其是大城市，就染遍了吸毒的恶习。在沈阳、哈尔滨、吉林等地，没有一条街上不设有烟馆或麻醉剂商店。那些日本和高丽的毒品贩子想出了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贫穷潦倒的瘾君子不必走进商店，只需敲敲门，商店门上的一个圆洞就会打开，他把捏着两角钱的赤膊从圆洞伸进去，店主接了钱，就会在他的手臂上注射一针。

埃德加·斯诺在 1934 年 2 月 24 日的周末邮报上叙述满洲毒品贸易状况时写道：

“单哈尔滨一处，就有 200 多个官方许可出售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商店，这些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由日本人和高丽人经营的。我请一个中国人带我走进一家附近的毒品店，我看到了价值 20 个铜板的一小撮海洛因。……据最可靠的估计，在

满洲的日本人和高丽人中，有 20%以上是与毒品贸易有关系的。”

当时国联禁毒委员会的一篇报告曾将日军占领满洲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描绘出了一幅日本如何有计划地毒化满洲的可怕情景。据该委员会代表巴沙称，许多日本的大企业家都视以贩毒牟取暴利为自己的副业，而许多小企业家更是如此，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

日本人到哈尔滨后，有几万俄国人作了麻醉剂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染上毒瘾，每天都有毒瘾发作而死的尸体倒在街头。当局对领事团以及中国、俄国的各种团体所提出的抗议充耳不闻。日本毒贩还侵入了俄国的小学和中学，他们重金收买那些年轻的瘾客再去引诱他的同伴上钩。

在大连、沈阳、哈尔滨、吉林、天津和其它大城市，日本人都设有工厂制造吗啡、海洛因、可卡因以及其它毒品，产量每年约值数亿元。

日本人还派员下乡劝导农民放弃大豆而改种罂粟。结果，鸦片的产量增长迅猛，以至于日本人每年从满洲输往中国内地的鸦片价值达数百万元。

尽可能迅速地毒化征服地人民，这是日本侵略者的基本国策，因为一旦上了毒瘾，再坚强的人也会即刻丧失一切抗日思想。

在哈尔滨的乌卡次科瓦亚街，就开设着专门把鸦片运入中国内地的日本公司。这家公司的经理是日本陆军军官，公司的主要成员也都是日本军人，他们全都穿着便服，看上去就像是普通商贩，实际上却在运送“日军给养”的伪装下把鸦片输送到天津、北平以及汉口等地。

象这样的“日军给养”每天都在向中国内地输送，接收者通常是各地的日军司令部。没有日军司令部的地方，就寄交日本领事馆。日本军舰沿着中国海岸线把鸦片输送到各个港口，再由日本炮舰把它们运入中国内河以至腹地。

日本人的既定国策就是毒化全世界。用这些摧残身体和灵魂的药品毒害别国人民的程度越深，他们的征服计划实行起来也就越容易。用枪炮杀人是要耗费钱财的，而用毒品则既能杀人还可以赚取高额利润，这不但是一桩好买卖，而且也是绝妙的战略决策。只有天照大神的子孙才能想得出这么一套逻辑并一丝不苟地去实行。

因此，日本毫无限制地把毒品输入中国，也大量输入南北美洲、菲律宾、马来半岛、爪哇、婆罗洲、澳洲和新西兰。

与此同时，日本却严禁本国公民吸用毒品和聚众赌博。在满洲，如果一个日本人被发现呆在赌馆里，是要被遣送回国的。凡是沾染上烟瘾或毒瘾的日本人，是要被判处五年徒刑的。

日军司令部发给在满全体士兵的一本小册子里有如下条文：

“第十五条：象日本人这样优越的人种是绝不该吸用麻醉剂的。只有劣等人种、颓废民族，如中国人、欧洲人、印度人之类，才吸用这种东西。这就是他们命该作我们的奴隶而终归灭亡的理由。

“犯了吸用麻醉剂罪的日本军人就不配穿着我大日本皇军的制服。”

然而，不论怎样严刑处罚，在满洲的无数日本军官已经落入了他们自己设置的陷阱，堕落为麻醉剂的牺牲品了。

第一任“驻满全权大使”兼驻满日军总司令官武藤大将对此大为震惊，于 1933 年 5 月 3 日密令各军长官注意以下事实：

“据报，多数军官常赴赌场以至烟馆，已变为麻醉剂嗜好者。本总司令望唤起尔等注意，并令谍报机关控制军官私生活……将此种有辱皇军荣誉之事立即呈送本总司令，违犯者应立即遣送回国。”

武藤大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所以他在他的那个阶级中是孤立无援的。他的善良品性使他反对日本政府残害和劫掠满洲人民的政策，并想竭尽全力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面对日军在满洲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他向东京日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向满洲移植日本刑事犯并对滥用职权的日本宪兵实行制裁。然而，东京对此置之不理。在极度失望中，他给日本天皇写去奏章，希望天皇改变对满政策并对日本军方加以控制，并在最后写道，满洲的中国人民的唯一错误就是他们已经被征服。然后，他于 1933 年 7 月 27 日自杀了。

为了向全世界掩盖事实，日本当局发表声明，称武藤大将因“患心脏麻痹”而死。

第七章

1. 日本军列被炸

1932年4月9日，我的长官要我去见他。他得到情报，苏联将有大量大豆运往海参崴。

“我们必须阻止它。你命令你的人去穆陵附近炸毁那列货车。”

我把命令传达给影。他答应马上通知他的人准备行动，并让我派人给他驻在穆陵的部下送去50磅烈性炸药。我把送炸药的任务交待给了我的第2号助手，而后告诉影，我的第2号将乘哪趟列车到达穆陵。

4月11日下午5点，影打电话来说他必须立刻见我。

“你是怎么搞的？”影一见我，劈头就问，“我接到电报，你的助手和炸药根本不在你说的那趟车上。”

我意识到出了麻烦，当即去报告长官。他立刻通知宪兵团，并向铁路沿线各站发出10多份讯问电报。所有回电都说，没有看见我的第2号助手。

第二天凌晨5点钟，我和宪兵团的武藤大尉以及一个宪兵团的谍报员同乘一架飞机前往调查。我们在途中的阿城和苇河停了两次，下午两点到达穆陵。我电告我的长官：无论哪儿都没有我的第2号或是炸药的影子，他和那50磅炸药全都失踪了。长官回电让我在穆陵待命。

傍晚 6 点钟，我和武藤大尉正在讨论对策的时候，一个宪兵跑来报告说，车站站长刚刚接到一份电报，说是 5 点半钟，在穆陵以西 100 公里处的横道河子附近，有一列日本军列被炸，死伤数百人。

我们直奔飞机场，7 点钟的时候到达横道河子。迎接我们的是一幅惨景。正当军列通过一座架在深谷中的小铁桥时，爆炸发生了。车头把 7 节满载日军的车厢拖下深谷，其它 11 节车厢倒在山坡上，正在熊熊燃烧。眼前的情况使我不禁回想起 4 年前，日本人正是用同样的办法杀害了张作霖以及他最亲密的朋友吴俊升。

在现场，我们看到驻横道河子的日军少佐司令与 20 多个铁路警察正在指挥一大批中国工人搬运着被烧焦的尸体。

我们对少佐说明来意，他冷冷地答道先作抢救工作，随后再进行调查。

几分钟后，一列救护车赶到。直到半夜两点钟，最后一个可怕的烧伤者才从一节残破的车厢里被拉出来。山坡上躺着 192 个死者。374 名伤者中，有 60% 情况极为严重。另外，两名列车司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波兰人，也受了伤。

救护列车载着伤兵回哈尔滨去了。按照日军的习惯，死者都被焚化成灰，装入罐子运回日本，交给他们的家属。能够辨出面目的尸体是一个个分开焚化的，认不出的就成堆焚化，然后如数把灰分成若干份，每份装入一个罐子。

紧接着，一列载着日本兵和大批日本、俄国和中国的调查员、警官和侦探的列车匆匆赶到了。

要找出爆破点其实并不困难。在铁桥的一条横梁下，一块基石被移开从而形成了一个安放炸药的洞穴；一条完好的电

线出现在离桥不远处，它直通距桥 200 码的一片丛林里，接在一节干电池上。

我心里已经十分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这是 S 和他所在的那支抗日游击队干的。S 原是一名俄国退职军官，曾在我的手下工作多年，是东北情报处的一员干将。“九·一八”事变后，他和许多人一样，做了我想做而没能做的事，加入了抗日游击队。我们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我知道，他所在的游击队由一位神秘的中国上校 C 领导着，就出没于这一带的村镇山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给日本人制造麻烦的机会。

日本入开始在横道地区及铁路两侧的所有村庄挨户搜查。

13 日下午 1 点钟，400 多名中国人和俄国人被捕。然而，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一点儿信息。

下午 2 点钟，一个日本宪兵大佐从齐齐哈尔坐飞机赶来，全权负责调查工作。这位大佐身材矮小、两腿弯屈、牙齿凸现、面目可憎，酷似 15 世纪西班牙的宗教审判总长托尔克马达。托氏曾杀数万名异教徒，以凶残著称于世。如今，站在我面前的这个日本宪兵大佐简直就是魔鬼的转世，我不由在心中暗称他为“托尔克马达二世”。

“托尔克马达二世”懂几句俄语，说着极糟的英语。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安放炸药的人找出来，即使杀光现场周围的所有百姓也在所不惜。

因为我的身份不能暴露，与我同来的武藤大尉向“托尔克马达二世”介绍我时说我是翻译。事后武藤大尉对我说，这个大佐是个卑劣的杂种，他自己恨不得立即回哈尔滨去。我对

此深有同感，于是打电报给我的长官请求回去。可长官回电却让我仍然留在原地。

被捕的 400 多名嫌疑犯，中国的和俄国的、乞丐和绅士、穷的和富的、男的和女的，全都象一群羊似地被关在一个大货仓里。

至少有 100 名日本兵带着步枪和机关枪守卫着仓库。

大约下午 3 点半钟，“托尔克马达二世”叫我立刻到火车站去，他已经在那里占据了两个房间作为他的办公室和卧室。

大佐和两名军官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我一进去他就说道：

“我听说你是哈尔滨司令部的翻译，而且是意大利人。很好很好，我不喜欢俄国人，我恨他们，我恨所有的俄国人，无论是白俄还是红俄，都和中国人一样，全是些毫无价值的人。他们只会搞暗中谋杀，却不出来公开战斗。猪，他们全是猪。4 亿 5 千万中国人和 1 亿 6 千万俄国人，你知道他们加起来一共是多少吗？”

我沉默着。

“你不回答？好，我告诉你，是 6 亿 1 千万只猪！猪！！猪！！！现在，咱们去审问吧。”

2. 与游击队接头

20 个宪兵守卫着我们 4 个人来到关押囚犯的仓库前。他们打开大门，那些惊惶失措的人误以为自己已经被释放，纷纷向外跑去。宪兵用枪托打着他们，并在人丛中清出一块空地，摆上一张桌子和 3 把椅子。“托尔克马达二世”坐在桌子的首

席，他的两个助手坐在两侧。一道全副武装的宪兵人墙面对着囚徒们。一个宪兵把一摞俄文和日文的文件放到桌上。“托尔克马达二世”随便抽出其中的一件看了一眼，而后交给我。

“叫他过来。”他说。

我看到写在那张纸上的名字，叫道：“费多瓦西里维奇·阿斯台金。”

一个大约 45 岁的典型的俄国工人走上前来。

大佐对我说：“这家伙是看守那座铁桥的巡道夫。他是苏联人，当然就是共产党。他肯定知道是谁在桥下放的炸药。告诉他，他必须从实招来，否则，我要枪毙他。”

我把他的话翻译给阿斯台金。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能说的。如果他们要杀我，让他们杀了我好了。”

我把这话翻译给“托尔克马达二世”后，他象一只猿猴一样跳起来：

“啊！是这这这这样？你不回答？你不怕死？大概你以为我们不会杀你，我要你看……”

他怪叫着把手枪拔出来，用枪口敲着阿斯台金的前额，然后回头对我说：

“再问他一遍，警告他，如果说，我就打死他！”

我照他的话说了，但那工人仍然毫无畏惧，他沉静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不知道。”

大佐看着我，大喊道：

“他说什么？！”

我迟疑了一下，但是不得不翻译：

“他说他不知道。”

最后一个字刚一出我的口，一声枪响。阿斯台金一声不响地倒下了，他的脸上满是鲜血。男人们咒骂着，女人们开始嚎哭，整个仓库陷入疯狂。一个强壮高大的中国人难以抑制他的愤怒，冲破宪兵的防线，直奔“托尔克马达二世”。大佐对着这个中国人连放三枪，而后对我咆哮：

“你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不安静下来，我就对他们开机关枪了！”

我跳到桌子上，胡乱地连嚷带比划，设法使大家安静一些，而后把“托尔克马达二世”的恐吓命令翻译给他们。

他们静默下来。

两个日本兵拉起那两个死者的脚，把他们拖了出去。

“托尔克马达二世”继续开始审问。

50多个中国和俄国的男女被过了堂。谁也不知道关于爆炸的任何事情，更不知道安放炸药的人。只有一个中国小孩说，出事的那天早上，他看见两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躺在离桥不远的地方休息。

在宪兵与群众之间的空场上，已经审过的嫌疑犯被命令站在左边或右边。晚上10点钟，“托尔克马达二世”宣布今夜审判结束，没有审过的人仍然关在仓库里，站在右边的放掉，而站在左边的全都拉出去枪毙。被枪毙的人中间，有3个俄国女人和1个中国妇女。

这时，恐怖开始在全区各处蔓延。酒馆店主被杀死，喝得烂醉的日本兵蹒跚在乡镇之间，比他们清醒的时候更为凶残。好几百个中国人、俄国人被屠杀了，他们的家被搜劫过后放火烧掉。几十名年轻女子被强奸，其中有的还不到10岁。400多个日本兵和宪兵四处撒野，没有一户可以幸免。

就在“托尔克马达二世”的临时办公室所在地，我遇见一群喝醉的日本兵正拖着一些中国和俄国姑娘，其中有几个身上被剥得精光。“托尔克马达二世”看着这惨景微笑，对我说：

“我相信今后这里再也不会有列车被炸了。只有恐怖才能教训中国人和俄国佬。”

他邀请我吃晚餐。为了不引起他的疑心，我随着他和他的那些部下，走进他的办公室。

菜肴很丰盛，还有各种酒水，全是打劫来的。除了武藤大尉和另一个军官很少喝酒始终保持沉默外，大佐和其他军官全都大吃大喝，而且很快就烂醉如泥，原形毕露了。

他们离开桌椅，坐在地板上，脱掉衣服，开始痛饮。他们都讲日本话，有时相互看着，就爆发出一通唏里哗啦的大笑。

忽然，大佐对着一个侍候的士兵说了几句日本话，士兵立刻走出门去。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而且笑得比刚才更厉害。

“喝呀！”大佐叫喊着：“喝呀！我听说意大利人不喜欢水，他们只喝酒，在酒里洗澡，是吗？”

我不说话。

“你干嘛不说话？能陪伴大日本军官你应该感到骄傲和高兴，哪儿能这么闷闷不乐的。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又用日本话对他的同伴说了几句什么，他们都看着我，大笑起来。

一个军官爬到一边，张着嘴，露出一排丑怪的牙齿，不久就打起鼾来。

“托尔克马达二世”还在喝酒。

“你愿意做日本军官吗？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立刻

回答我！”他使劲儿怪叫着，那神气可恶之极。

我打定主意绝不回答他。他叫道：

“你应该交出你的生命！即使这样，你也不配做日本军官。你可以变成美国军官，或是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但是你绝不可能有变成一个日本军官的荣耀。

“做一个日本军官，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即使你有巨大的财富、华丽的住宅，也不配享有日本军官的荣誉。

“日本军队是世界上最完备、最光荣、最伟大的武装，唯一一支没有打过一次败仗的军队。我们打败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帝国——中国和俄国。

“几年之内，日本军官就要征服中国、俄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整个太平洋，从北极到南极，都必定是日本的。我们光荣的陆军将要征服一切土地，我们无敌的海军将要统治所有海洋。我们要把我们的国旗插遍太平洋的每一块陆地，我们要让美国人替我们擦皮鞋。”

他笑了又喝，全然不觉他是在暴露侵略者的野心。这时，他派出去的日本兵回来了。他示意士兵上前，士兵对大佐说了几句。

“叟得斯卡？”大佐答着，用脚去踢那个熟睡的军官。

门开了，5个哭哭啼啼的俄国女子被一些日本兵推了进来，其中3个看上去象是乡下姑娘，而另外两个则象是属于上等家庭。

“托尔克马达二世”笑了，咕噜着日本话，努力要站起来，但却跌倒在这个睡着的军官身上，把后者惊醒了。

女子们被迫坐在大佐和醒来的军官旁边，“托尔克马达二世”拿啤酒给她们喝，却被她们拒绝了，这使他很不快活。他转

过来对我说：

“你告诉她们我是大佐，对所有的人都有生杀之权。如果她们好好侍候我和我的军官，那一切就都好说。要不然的话，可就太糟了。你说，哪一个最好？你挑吧，你是我的客人，你先挑。我们日本人总是谦让待客的。”

他看我既不说话也不动弹，又说：

“你不喜欢俄国女人？你要一个中国的吗？我叫他们去找一个来给你。”

我实在不能忍受，起身说时候不早我要回去睡了，又说：“我已经有儿有女，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大佐定定地看着我，说：“我让你走的时候你才能离开。”

“不管你让还是不让，我都要走了。”我冷静地说，“我的职务是司令部的翻译，关于女人的事情你另找别人。”

说完，我转身就走。我听见他问武藤大尉什么话，武藤大尉似乎在尽力缓和气氛。

火车站的站长准许我睡在停在道旁的二等卧车里。

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8点钟。刚一离开车，我就遇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他向我要几分钱，并说：

“我有1个女人和3个孩子，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这句话是我与S之间的联络暗语。我意识到，这个“乞丐”是游击队的联络员，连忙停下来，装作摸索钱包的样子，低声问他：

“你们的队伍离这儿多远？”

“3天路程。”

“好！告诉你的长官，两天之内赶过来，几百个中国人和俄国人正在被屠杀呢。我的第2号呢？”

“我们把他埋了。”

“要钱用吧?”

“不。”

“祝你好运。”

我在他的手里放了 5 分硬币，与他分手。

第八章

1. 与“托尔克马达二世”较量

直到下午 2 点钟“托尔克马达二世”还没露面。武藤大尉告诉我，昨晚有两个女子被大佐和另一个军官奸污了，其余 3 人都被送回家去了。

审讯继续了几天，每天都有成批的人被枪毙。100 多个被关在仓库里的人受了酷刑，但是毫无结果，并未发现安置炸药的任何人。

从哈尔滨运来了 20 多个替宪兵“工作”的俄国人。他们是从各种刑事犯中择优选拔出来的。他们立刻开始了“工作”。

他们任意逮捕他们认为有钱的嫌疑犯，要等犯人交清赎金才能释放。被勒索来的款项，大部分交给宪兵军官，零星的部分就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一个日本宪兵大尉坦率地告诉我，他在 5 天之内已经收入了 6500 元。“托尔克马达二世”则有 2 万多元流入私囊。

我一再打电报给我的长官，请求他允许我回哈尔滨去。他的回电总是“仍留此地并监视一切”。

19 日晚，影和他的两个助手来了横道河子。刚一下车，他们 3 人就被当作嫌疑犯抓走了。影的一个手下跑来向我报告。我立即去见“托尔克马达二世”，告诉他影是日本人的朋友，在对影采取任何处置前，必须先电告哈尔滨。

“我电告哈尔滨的什么人？土肥原大佐吗？你以为他是比我更大的人物吗？我是宪兵大佐，宪兵大佐比陆军将官还高呢。在这里做主的是我，不是土肥原！我倒要亲自审问这3个中国人，假如他们无法令我满意地说明他们的来意，我就要枪毙他们。”

我去找武藤大尉。

“我们必须设法营救影和他的两个助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穆陵和横道之间有好几百个影的党羽，他们会为营救他们的首领，毫不迟疑地进攻日军守备队的。”

我并不希望影的土匪袭击日军守备队，因为，我另有安排。

武藤大尉提议用军事密码电告日军司令部，说明影被宪兵逮捕，请求他们转令宪兵方面释放。

夜里2点，驻满日军总参谋长来电，命令“托尔克马达二世”立即释放影和他的两名助手，不得延迟。

早上8点，大佐召我去见他。

他独自坐在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而后难看地皱起眉头，问道：

“为什么你要打电报给总参谋长？这个影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在替什么人做事？你又是个什么东西？谁是你的上司？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就要在你的脑袋里放一粒子弹！”

“我曾经与日本高级长官约定，绝不说出我为谁做事和做什么事。要我回答你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那么我只有一句话——问参谋长去。”

“你是被派来监视我工作的？！”

“你错了。我在铁桥没被炸之前就到穆陵了。”

“那你为什么不走？！”

“我的长官不叫我走。只要我接到要我走的命令，我会立刻就走的。因为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你！”说完这话，我看都不看他走掉了。

这可恨的矮子使我厌恶极了，我一边走一边在心中咒骂他。真的，我还从来没有遇见如此卑劣狠毒的畜牲。我相信，在任何国家里，都是不允许这种东西穿着正规军队的制服的。可是在日本的军队中他竟然还是个重要人物，掌握着对不幸百姓的生杀大权。

直到在一个村舍旁边遇见我的老“乞丐”，我才从愤怒中清醒过来。我把一个铜板放到他的手里，他对我说：

“C 上校带着两千人明晚就到。S 现在和我在这里。今晚 11 点，他到你的车上来看你。”

S，这个曾经与我一起摸爬滚打的伙伴，如今已经成了那些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队中的一员。在整个满洲，正是数不清的象 S 这样的人，扰乱着可恶的敌人，使他们得不到一分钟的安宁。

一直到我离开满洲的时候，这些游击队都是铁路线以外地区的真正主宰。就在日本占领满洲 6 年之后，日本人仍然只能统治铁道附近的地区，而离铁路线不过几公里以外，就是抗日游击队的势力范围。尽管日本飞机随时可以去狂轰滥炸，而步兵却不敢离开铁路线太远。

由于消息被封锁，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称作“贼匪”的人的爱国精神和英雄行为，以及他们对日本鬼子的无数次奇袭。

1935 年 5 月间，323 名中国的抗日游击队被两三千日

军包围在一个距齐齐哈尔 100 公里名叫梅突卡突的小村子里。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顽强抵抗了 3 天之久。日本飞机在村子上方抛下了 100 多枚炸弹，大多数居民被炸死。只剩下 60 个受伤的队员了，他们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日军确信已经消灭了全部敌人，晚上在宿营地放心大睡起来。半夜，这些还能动弹的游击队员带着刺刀、大刀和手榴弹爬进日军的宿营地，展开了一场可怕的肉搏。结果，中国人全部牺牲，日军 175 人被打死，200 多人受伤。

即使是在最野蛮的民族之间，对于艰苦善战而死的勇士也是由衷敬佩的。日本人则不然。当指挥进攻的日本大佐站在战死的中国指挥员的尸首前时，他显出武士道的精神来了。他对这死去的英雄破口大骂，横加侮辱，甚至用脚去踢死者的脸。

半夜 11 点，S 来到我的卧车里。在这种环境下再次相会，使我们俩都百感交集。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畅叙离情，我们有更为要紧的事要做。

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横道地区内外的全盘形势，特别是日本兵的具体人数、他们的宿营地以及宪兵、哈尔滨来的俄国助手、日军长官和司令住处的情况。

S 将这些情报了然于胸之后，给我匆匆讲了他和 C 上校的游击队的种种冒险，以及日军对他们的多次围剿。

不知不觉间已是凌晨 2 点钟，我们不得不告别。他跳下卧车，很快就消失在黑夜之中。

2. 奇袭

4月22日，武藤大尉接到电报，命他回哈尔滨去。我的长官则打电报来命令我留在那儿，准备一份有关当地全面情况的报告。他要我特别侦查关于宪兵和那些俄国助手的问题。

当晚9点钟，一个喝醉了酒的日本军官在一家妓院枪杀了一名不肯伺候他的女子。他穿着日本皇军的制服，自然谁也不敢惹他。烂醉如泥的他从妓院中走出来，一路立功，打死了迎面走来的1个高丽人，打伤了1个俄国女人和2个中国人，凯旋回营去了。至于他会受罚还是受奖，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1932年4月23日，我派人去邀请影，约他当晚9点钟来卧车上与我共进晚餐。

下午4点钟，那个中国“乞丐”通知我，C上校的队伍已经到达横道周围，让我晚间千万不可离开卧车。

晚上9点，影带着2个助手和4个保镖如约来了。他叫他的人站在车子外面。

我为他预备了丰盛的酒肴，可是，美酒却无法替他消愁解忧。

“我现在算什么呢？这么多年我的人马一直有1500多。可现在呢？才1000人。他们答应我要带5000人。他们只给我很少的一点儿钱，倒尽叫我干下流事……叫我去打劫村子，然后就由日本人和高丽人搬进去住，当我不知道呀！谁敢这么愚弄我，最好当心点儿！他们现在又让我打中国人。我已经受够了，有一天，我要叫他们知道，我可不是好惹的！”

我听着，无言以对。影继续说着：

“你别以为我是跟你过不去，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日本人硬逼你，你是很不情愿干这种讨厌的勾当的。我通通知道，连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我最伤心的是你还不大相信我，其实你和我可以一起干。我真希望有一天，你和我，脱离这该死的日本人，咱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去。这小日本究竟算什么东西？论身体他们是矮子，论心地他们连大猩猩都不如。

“你看那个大佐，可恶的耗子。我打算割掉他的耳朵，让他记住我。我的帮手李同，他就在外面，他说如果那个大佐再不离开横道的话，他就……”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就是一阵来福枪和机关枪声，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影的一个卫兵进来告诉我们，全镇各处都在开火。现在是 11 点 10 分。我问影：

“我们是不是该离开这儿？”

“干嘛要离开？”他似乎毫不在乎，“咱们只有手枪，打不过步枪和机关枪。更何况，我觉得他们不会来车上打扰咱们。”

然后影叫在外面站岗的卫兵都进来。他当初告诉我只有 4 个，这会儿却进来了 11 个。这个狡猾的影。

枪声时断时续，直到凌晨 2 点半才渐渐平息下来。

日本兵大多数都是在睡梦中，来不及拿起他们的武器，就被杀死在宿营地里了。其余的全部被俘。

多数日本军官那时都在艺妓家中，穿着和服，没有武器，想要抵抗的全被打死了，其余的都被游击队带走了，“托尔克马达二世”也在被俘者之中。

奇袭过后，游击队和全部俘虏都消失在了山林里。

等到 4 点钟，我们走下车。一些日本官兵也慢慢从各自的隐藏处爬了出来。

早上 7 点钟，残余的 11 名日军军官——职务最高的是大尉——和 137 名士兵在空场集合。他们的武器全部被游击队夺走了。宪兵队的 23 名俄国助手中，有 14 人被打死，剩下的 9 人逃得无影无踪。总之，日军共有 143 人被打死，127 人被俘。

通讯刚一恢复，我们就听说，在袭击横道的同时，另有一股游击队袭击了距哈尔滨 100 公里的一面坡，打死 134 人，86 人被俘。那里的日军被迫撤退。

上午 11 点钟，一列载着一营日军的特别快车驶进横道车站。另外，有十几架从哈尔滨起飞的日军侦察机盘旋在空中，寻找着游击队的踪影。

第二天，4 月 24 日，我的长官终于来电命我回哈尔滨去。几小时后我就登上了火车。

影来为我送行，显得有些伤感。他因为必须到穆陵去会他的部下，不能与我同行。火车开动时，他突然对我说：“假如你不请我到车上吃饭，我和我的人就都没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5 月 1 日，我回到哈尔滨。我的长官颇为诚恳地迎接了我。除了军列被炸、日军遭袭而外，他似乎更关心有关“托尔克马达二世”个人的一些情况。他详尽地追问了大佐从到达横道那天起直至被俘的种种细节，至于那些俄国的、中国的、甚至是日本的牺牲者们，他却只字未问，也毫无一丝同情或怜悯的表示。

我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就看见日本间谍机关发布的有关横道事件的公报：

“本月 12 日下午 5 时半，苏联间谍在横道附近破坏铁路，

开至穆陵之一列车因此出轨。死乘客 3 人，伤 10 人。军警当即有所捕获，并证明此乃共产党阴谋。

“23 日半夜 11 时，贼匪 4000 余人袭击横道之日本驻军一队。我军当即加以击退，贼匪遗弃死尸 367 具，俘虏 211 人及大批枪械弹药。

我方死兵士 4 人，伤 11 人。”

大日本特务间谍机关长 土肥原大佐”

这份公报体现了日本人的典型作风。他们认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的军队当然是不可战胜的。军队既然不可战胜，那么任何兵员也必然是天下无敌的了。所以，写出几个中国人炸毁一列满载日军的火车、一队日本兵被打败的事实，就是侮辱全军，侮辱天皇乃至天照大神，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把几个中国人改为苏联政府，把损失压缩到最小，把士兵说成是一般乘客，这似乎就可以保持日军、天皇以及天照大神的荣耀了。

在我替日本人做事的 4 年半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关与“贼匪”交战的报告，但其中没有一份是真实的。驻哈尔滨师团长多门将军所发表的关于松浦战役的战报便是一个歪曲事实的可笑标本：

“1932 年 5 月 18 日，日军 1200 人在松浦附近遭遇贼匪 8000 余人，武装齐备，皆携有苏联制之步枪及机关枪。激战 6 小时之中，屡次冲锋肉搏，幸赖我军英勇绝伦，贼匪狼狈溃窜，遗下死尸 1214 具，伤匪 763 人。我方伤 31 人，死 14 人。

“师团长 多门将军”

据我所知，真实的情况恰恰与这个神话相反。事实是这样

的：

日军 3500 余人在松浦遭到大队义勇军攻击，被迫退入松花江边一个渔村里，等待黑夜突围。夜里，日军乘渔船渡江，遭到岸边的义勇军的猛烈射击。3500 人中，只有受伤的 1676 人勉强到达对岸。

6 天之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发现渔村和岸边有日军死尸 907 具，死尸身上的军服全部被“贼匪”脱净。

15 天后，又在江里捞上日军死尸 531 具，其中一个是大佐联队长。

紧接着，日军驻哈尔滨司令部收到游击队司令的一封信，通知日军 382 名士兵和 11 名军官被俘，要求交换俘虏。

第九章

1. 日本人在制造骗局

我回到哈尔滨的时候，由李顿率领的国际联盟调查团还有10天就要到哈尔滨了。一周之前，所有警务机关，包括日本情报局、日本宪兵队、满洲国宪兵队、满洲国国家警察、哈尔滨市警察、日本领事馆警察、国家情报局和铁路警察，全都接到命令，要逮捕和监禁一切“企图”向国联调查团有所陈述的人。

这各种警察机关并不合作，他们各自为政，甚至常常互相对着干。按照惯例，逮捕都在夜间进行。所以，每当夜幕降临，各式警察就争先恐后地去逮捕那些最富有的人，企图讹诈完钱财再释放。糟糕的是，有的人往往刚被宪兵敲榨完放回家，紧接着又被另一拨警察抓走，不得不再次缴纳赎金。有些倒霉的中国富人就是这样被接连逮捕五六次，倾家荡产，却仍然关在监狱里。

依照日本当局的命令，这一次被捕的“嫌疑”犯都要关在牢里，等到国联调查团走后再释放。他们全都被抛在地牢里，与窃贼、土匪、杀人凶手们关在一起。而大多数在调查团离开后三四十天还不得自由。

调查团来哈尔滨之前的一个月，日本人就命令一批中俄要人组织了一个向国联“请愿”的委员会。各种“请愿书”都由日本人拟好了，这些中俄要人只不过签一个名而已。不用说，

这些“请愿书”都是一致颂扬满洲国光荣的现在和将来的。

接待委员会的组织最为周密。精心挑选出来的所有委员都要练习进退坐立的礼仪。他们必须熟读谨记所要说的话和怎样说法。他们受到警告：假如他们说了比教给他们说的多了一个字或是少了一个字，假如他们的话使别人产生了一丝一毫的误解，那么他们就要用生命来抵偿。

日本人竭尽全力掩盖事实，并用各种方法欺骗调查团。他们做得太过头了，以至弄巧成拙，最后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调查团的主要成员所住的马狄尔饭店处于严密包围之中。邻近调查人员的住房全都被国家政治警察局的日俄密探包租了。另外，3个密探在账房冒充书记员，还有一些作为厅堂和房间的侍役以及茶房等等。他们还雇用了3个日本女子作了房间侍女。几十个侦探散布在餐厅、阅览室、接待室以及饭店周围。调查团的另一些成员可能去住的新世界饭店等，也如法炮制。

日本人认为调查团可以去的重要商店、酒店和头等剧院，都一律派了侦探去作雇员、书记员、侍者、导购员等。

据确实统计，有1361名中国人、俄国人、高丽人和9个日本人作为“企图”向国联调查团呈递反满函件的“可疑”分子，被押解到松花江北岸距哈尔滨6公里的乡镇——松浦。所有政治犯、一切苏联侨民以及会说英语或法语的犯人，也都被转到了松浦集中营。因为日本人认为，国联调查团有可能要访问他们。

所有医院也都同样施行了严密戒备。凡有“嫌疑”的病人全都移送到调查团不会去的日本医院里。

接下来就是布置一种群情激昂的热烈场面，使调查团得

出全体人民都拥护满洲国的印象。

日本人印制了无数面满洲国小国旗以及溥仪像，其成本为5分钱。住在哈尔滨的每个人以及住在铁路沿线的一切中国人、俄国人和高丽人，都必须花2元钱买一张像和一面旗。他们组织了无数个“旗和像”的售卖队，每一支队伍由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会计组成。各队分头挨家逼买，并且声明：如果在调查团到来期间不好好将“旗和像”悬挂在门上或窗上，那么就要被逮捕。他们还限令那些穷得出不起两元钱的人家，半个月之内将钱缴到警察分驻所。

此时此刻，我的长官似乎忙昏了头。他常常刚刚发出命令，马上又违令；刚刚叫抓人，忽然又让放掉。看来他是唯恐偶有疏忽闹出乱子而紧张过度了。

调查团定于5月10日到达哈尔滨。

5月4日，长官传我去见他，说是十分紧急。我刚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炸了，说这几天他的脾气很坏，而后劈头盖脸对我一通臭骂：

“你什么也不懂，我交代一件事你才知道做一件。我真不明白张作霖看上你哪一点！他干嘛要提拔你，给你那么多钱，居然还用了你这么多年，真奇怪！如果我是他，头一天我就要把你踢出去，一分钟也不留你！你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儿好处！”

“假如你这么认为，”我回敬他，“那你为什么不把我踢出去呢？我从来没有求你给我工作。如果你让我走，我真是没什么可抱怨的。”

“你总是这一套！别忘了你是在和情报局局长讲话。我爱

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你无权反驳我。现在听着，你知道张凤亭和莫文鸿吗？”

我当然知道。张凤亭管辖着 20 多家银行和钱庄，是个百万富翁；莫文鸿则是发隆百货公司的财东，也富得流油。

“这两个人打算联合其他富商，给国联调查团秘密递一个请愿书。”长官告诉我，“一个日本谍报员刚刚来报告，据说这份请愿书对满洲国非常不利。现在，我命令你办这件事，无论用什么方法，把这请愿书弄到我们手里。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帮人挨个送上军事法庭，没收他们的财产。哈，一百多万，够日本军用一阵子的了。我希望你尽快搞到请愿书。监视这些人，监视他们的住宅，监视去访问他们的每一个外国人。我猜他们会利用某个外国人去递他们的请愿书。”

“好，我派人把他们全都监视起来。不过，我的谍报员每天 24 小时都在工作，我再也抽不出人来了。”

“可以让影的土匪去干，由宪兵团给他们一张证书，聘任他们为临时谍报员。”

“可他们全是土匪，你知道他们穿的是什么破布呀，他们的样子哪里象是谍报员？”我问，“再说，谁能保证他们一旦有了权力，不会去滥用职权呢？”

“我已经准备了 500 套满洲国军服，都交给影去用吧。”长官回答，“至于那些土匪会干出什么事来，我倒不管。我关心的只是不要让我们不喜欢的人接近调查团。”

我和影对每一件事都做了细致入微的规定。3 天之后，每个中国富人的家里就出现了四五个穿着满洲军装的“谍报员”，号称为“光荣的侍卫”。他们的家宅周围，另外有几名“谍报员”巡逻并负责跟踪那些访问过这些家宅的人们。

我要感谢影的土匪们。他们并未滥用职权。他们奉公守法，没有做过任何可诅咒的事。他们以行动证明，他们是最好的谍报员。

2. 谎言压不倒真理

1932年5月9日下午4点钟，国联调查团来到哈尔滨。当天中午，火车站和调查团将要通过的街道上，全都布满了中俄警探。平常在哈尔滨街头蜂拥着的日本军警一个都不见了。日军司令部下了命令，不准一个穿日军制服的人出现在街上，这样才能使调查团相信，“满洲国”这个新国家的成立，完全是人民自己革命的成果，日本人并未插手。

好几千名日本宪兵和陆军全都穿上了“满洲国”的军服。

遵照日本司令的命令，“满洲国”的省市当局和军队将领都来到车站，和招待委员会排列在一起。

列车到了。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员走出来，那一群当局要人迎上去，然后全体向出口走去。正在这时，一个高丽人——穿着“满洲国”制服在月台边站岗的日本宪兵队员——忽然走上前来，想要把一封信交给一位调查团员。他刚走了两步，就被一群穿着“满洲国”制服的日本宪兵拖到警戒线后面去了。

这个高丽人被带到了我的长官面前。

他叫金巩，在日本宪兵队服务7年了，但他对压迫他同胞的这种人深恶痛绝。他相信调查团是伟大的，有权力给与正在受难的他所爱的祖国自由解放。在他用高丽文所写的那封信里，他问道：为什么国联这样关心刚刚被日本占领几个月的满洲，而不同样关心受难多年的高丽呢？

我的长官亲自审问他，因为他坚信金巩背后还有同党。

但是金巩是真正的英雄，即使有同党他也绝不出卖。

我的长官眼看达不到目的，立刻化为野兽。他对金巩施用了最酷烈的苦刑。他命人挖掉他的脚指甲和手指甲，折断他的手肘，用酒精灯烧他的脚后跟。我的长官还亲手用自己的钢笔挖出他的左眼珠。金巩不断重复着：“我没有同党，信是我自己写的。我要求国际联盟把日本人赶出高丽。”

当天晚上 9 点钟，正当国联享用在哈尔滨的第一次宴席时，他们把被折磨得半死的金巩拖到附近的墓地，一枪结果了他。

对于每一位调查团员，日本人都派遣 4 个侦探轮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纪录他所作的每一件事、和他谈话的每一个人或是想要接近他的人。

调查团询问街头为什么这样寂静，日本人解释道：这是为了防备共产党和那些拥护满洲独立的中国人袭击调查团员而采取的措施。这些解释是毫无根据的，并不能说服调查团，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使调查团和每一个人隔离开。

然而这一切无济于事。许多被日本人派去侦察调查团的中国人、俄国人和高丽人本身就反对“满洲国”，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帮助调查团查出事实真相，就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他们布置了许多次私访和会谈，而且向调查团传递了几百份书面报告。

但是，李顿调查团绝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在哈尔滨停留的 14 天内，有 5 个中国人和 2 个俄国人因为想要向他们递交几封信而被日本人枪杀了。他们绝不会想到，1932 年 5 月 13 日晚上 9 点半钟，就在他们居住的马狄尔饭店的 2 层楼上，一个

俄国青年学生因为想递给他们一封信，以抗议日本人关闭他所在的工业专科学校，被当场杀死了。他们也绝不会想到，有150多名中国人和50多名俄国人仅仅因为走近马狄尔饭店而被拘捕了。他们更不会想到，那些欢迎他们的队伍，是由日本人何等精心组织起来的——每一个公务员、官员、工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只要是能站得起来的，一律被强迫上街，他们必须使劲摇动“满洲国”的小旗，高喊“满洲国万岁！”

第十章

1. 接受新任务和一个小插曲

国联调查团走后的第二天，我的长官传见我。这一回他似乎很高兴，一个劲儿地让我坐下，而后对我说：

“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那群老蠢货已经走啦。谁知道他们要到日内瓦报告些什么呢？好，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日本人绝不会再搭理他们。假如国联承认满洲国，那固然好；假如不，我们也不承认国联就是了。这叫以牙还牙。我们已经征服了满洲，无论国联怎么唠叨，我们也不会放手。凭什么他们要对满洲说这么多废话？真是愚蠢！等我们占领中国、西伯利亚、菲律宾和越南的时候，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瞧着吧，日本会让他们吃惊的。人人都会大吃一惊，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还有我们亲爱的英国老太婆。那会儿国际联盟就太忙了，他们要派多少个调查团到我们占领的各国去呀！”

他怡然自得地微笑着，显然是对自己这通的雄辩非常满足。而后，他又说道：“我感谢你在调查团到来期间的出色工作。一切都非常顺利，我真该祝贺你。如果我偶尔说过什么让你不愉快的话，你不必在意。我有一种神经过敏的脾气，当事情办糟了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发脾气，见谁骂谁。所以我希望你对我前些天的粗暴不要见怪。我这人很神经质，我向你道歉。

“我正在准备给东京写有关调查团的报告，我会提到你执行命令时的认真态度。我希望日本不久以后就会充分信任你。对你我毫不怀疑。你毕竟是个意大利人，对于伟大而高贵的日本帝国，你不可能不由衷钦佩。

“和中国人你能有什么共同之处？中国人算什么东西？我劝你加入‘满洲国’国籍，这样，你就可以彻底脱离中国与你的联系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要考虑考虑。要知道更换国籍毕竟和变更戏院的剧目不同，在决定之前，我必须认真地想一想。将来，等到日本当局相信我、不把我当作一件抵押品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属商量商量，或许我会听从你的忠告。”

“很好！你什么时候决定了就来告诉我，我随时准备给你作介绍人。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信任你。听着，贼匪现在扣留着我们 500 多个日本兵，其中有 30 多个军官。匪首们通知我们，他们准备和我们交换俘虏，两个土匪换一个日本人。他们还要我们付几万元钱。我们愿意交换俘虏，但是拒绝付出一个铜板。现在的困难是，在哪里交换？具体工作如何进行？事情已经拖了两个多月了，还是毫无结果。我想只有你能办成这件事。几乎每个匪首都是从前中国军队的军官，你或许认识他们。倘若如此，你就更便于和他们讨价还价了。你要严守秘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贼匪俘获了我们的人。”

“两三天内，贼匪就要派代表来。你同他一道回他们的驻地，与他们的头领交涉。我还要求你在那儿确定一下，是否真有这么多日本兵成了俘虏。”

我不由问：“如果那些贼匪真是从前的军官，那他们肯定知道我为中国政府服务多年，而且还加入了中国国籍。他们会

不会把我当成汉奸送我几枪呢？”

“你不必有这么多顾虑。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派人去，他们对我们派去的人一向都是很客气的。”

的确，我相信中国土匪确实比日本军官更守信用。我对长官提起发生在海拉尔的一件事：一个日本少佐允许两个苏联人作为代表越过苏满边境，来索回一群被日本兵偷去的母牛，结果却是这两名苏联人不但受了苦刑，还送掉了性命。

“苏联人是十足的瘟疫，全都该被消灭掉。”长官打断我，“我们还是谈别的事吧。我让你侦察张凤亭和莫文鸿，情况怎么样了？”

“毫无进展。”我告诉他，“据我看，这两个中国富豪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全都反对满洲国；但是他们太聪明了，绝不公开反对，因为他们不愿失去他们的几百万财产。假如你们日本人想要他们的财产，尽可以依照惯例没收嘛。如果你以为他们会公然反对满洲国，那你就想得太美了。”

长官似乎喜欢我的坦率，他大笑着说：

“你说得很对。可是，这两个人在中国和外国都有太多的朋友。如果不通过适当的法律手段就没收他们的财产，那乱子就会闹大了。如果我们能够有证据证明他们反叛满洲国，那么一切就简单得多了。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现在你去吧，等土匪代表一到，我就通知你。”

我向我的住处走去，在门口遇见我的助手第1号。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我们走进日本间谍机关指定给我会见助手的那个房间。

我们刚一进去，第1号就关上门，告诉我说，我的第4号失踪了，他已经找了两天都没有结果。

我跑到第 4 号居住的旅馆里，那里的人告诉我说，他 3 天前就带着全部行李离开了。我打长途电话给大连和山海关询问他的下落，回答说谁也没有看见他。

第二天，当我走进马狄尔饭店的时候，一个侍役将一件密封的信交给我。我打开一看，正是我的第 4 号在马狄尔饭店里用俄文写给我的。这封信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亲爱的维斯帕先生：

“我不得不离开满洲。那些日本猪强迫我帮他们做了许多恶事之后，又在设法迫害我了。我必须向你说明我离开的原因，因为你对我一向不错。

“上个月，两个曾和我一起共事过的日本宪兵大尉告诉我，他们正在策划绑架傅家店交通银行的中国经理，拉我入伙。

“我、两个日本宪兵、一个军曹以及宪兵团一个叫克尼伯的俄国侦探前去逮捕那个中国经理，把他从家里架到傅家店宪兵派出所附近的一间空房子里，那两个宪兵大尉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中国经理被倒吊起来。两个大尉命人去把他的妻子也抓了进来。他们让她看她的丈夫，并告诉她交出 30 万元来，否则就这样吊死她的丈夫。两个钟头后，她带了 18 万元现款来，说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她无法全数凑齐，等她丈夫被释放时她一定交清。

“经理被释放了。他刚一走，大尉们就给了我和克尼伯一人 1 万元钱，要我们发誓对任何人都不说一个字。

“没想到，今天早晨，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局局长把我叫去，告诉我，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并要我交给他 8000 元钱，否

则，他就要拘留我。

“我太知道日本人的这套鬼把戏了。即使我交了钱，他们也照样会加害于我的。所以，我想我还是带着这一点儿钱逃到别的地方去另谋生路吧。

“请你原谅我的错误，相信我——

“尊敬你的人

“副组长第 4 号”

信尾处还有一行铅笔字：

“我请求侍役等我走后 3 天再把这封信交给你，请你不要骂他。”

读完信，我马上离开饭店，径直去见我的长官，把这封有趣的信交给他。我本以为他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却把它当作一个天大的笑话，笑得十分起劲。然后他说：

“这就是我所说的效率！两个钟头 18 万元，好精明的一对流氓！我真该让这两个大尉平平安安地享用这笔钱。可惜数目太大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们一方面做得象是十足的骗子，另一方面却又象是白痴。他们竟然拿 2 万给两个俄国畜牲！真想不通！这种事要是让我们国内那些口袋里从来没有 5 块钱的陆军军官知道，他们非造反不可。”

他马上打电话给宪兵团，让他们立刻扣留克尼伯，不准他见任何人，听候他的处置。

那两个宪兵大尉被迫交出 14 万元，我的长官准许他们留下 2 万。克尼伯被拘押了 43 天，他受不过苦刑，供出了藏有 9600 元钱的地方。而后，那两个大尉把克尼伯带回宪兵团服务，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2. 与游击队交换人质

两天之后，我在长官那里见到两个陌生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那日本人和长官讲了几句日本话之后就走了，然后，长官把我介绍给那个高大结实、长着平常面孔的中国人。

长官对我说：“这人代表流窜于北满的一股贼匪。他们拘留着 2 个日本军官和 34 名士兵，他们愿意和我们交换被我们抓住的他们的朋友。明天你就和他一起出发，由他告诉你下车的地方，他带你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等你到了匪巢后，你要查明是否真有日本俘虏在那里。如果有，你就写下他们的名字和队号，布置交换的条件和方式。”

第二天一早 7 点钟，我和那个中国人出发了。

我的同伴一直不开口，我有话问他的时候，他只是用点头或摇头表示可否。直到离哈尔滨有 50 公里的李家窝铺，他才恭敬地对我说要下车了。离开车站，我们进了一个村子，走过几条街，到了一座小房子面前。那里站着两匹备好鞍的蒙古马。我的同伴上前解开马缰，把一条缰绳递给我，让我上马。

骑了 6 个小时以后，下午 3 点钟，我们到了另一个村子，立刻被一群中国人拦住。这些人与我的同伴交换了几句话后，走来要蒙住我的眼睛。我欣然同意。

又骑了 20 分钟，当我的蒙布被解开时，我发现我们在一个地窖前。有 5 个中国人正等在那里。其中一个人穿着西装、长筒皮靴，说着一口十分标准的俄语，走上前来欢迎我。

讨论非常简短。他们的确是土匪，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让他们被日本人捕去的 27 个同伴重获自由；作为交换，他

愿意释放那 34 个日本兵和 2 个军官。我们最后达成协议：他们先放 17 个日本兵和 1 名军官，第二天日军司令部就依照他们提供的名单释放 17 个“贼匪”。为了防止日本人捣鬼，他们要我留在那里做人质。

傍晚 7 点钟的时候，18 个日本人被蒙着眼睛、骑上马放走了。我请其中一个军官将我的一封信转交给我的长官，那上面写着我们谈妥的交换条件。

两天之后，正当太阳落山的时候，17 个被释放的“贼匪”回来了，剩余的那 18 名日本人也就象第一批人一样被送到哈尔滨去，而我仍然被留在原地做人质。由于我此行关系到他们同伴的命运，所以他们把我当成了要人，待我非常客气，并从他们不很充裕的给养中选出最好的食品来款待我。

又过了两天，最后释放的 10 名“贼匪”安全到达了。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可以依照来时的方式回去了。我由两个卫兵保护着骑了几个钟头之后，被命下马。他们解开蒙着我双眼的绷带，把我的手枪还给了我，又叫一个中国人把我领到一个有些亮光的地方。半个小时后，我到了兴隆镇车站，这儿离我第一次下车的车站有 40 公里。

我的长官在哈尔滨笑眯眯地迎接了我：

“今天我就要报告东京，说你工作出色。我绝不会忘记向他们报告你为了日本士兵的自由宁愿自己去做人质。

“现在你的第二步工作是去营救被游击队抓去的几百个日本兵。这伙贼匪跟别处的比起来更难对付些。我们和他们谈判已经有两个月了，还是没有结果。这帮家伙武器非常糟糕，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糠咽菜，还总是给我们惹麻烦，炸列车，破坏铁道，不停地袭扰我们的军队。如今，中国人不能作战

的老观念早已被粉碎了。你已经看见嫩江桥、松浦、齐齐哈尔等地的战事了。现在，你再看看他们——这帮贼匪，还在如狼似虎地打着，死也不肯投降。到处都有他们，但是你却看不见他们在哪儿。我们以为已经消灭了他们，但是我们的列车到处被炸，我们的人每天被杀，几百个日本兵反倒成了他们的俘虏。

“我，一个日本的将军，这样和一个欧洲人谈话，你觉得奇怪吧？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相信你是同情日本的，我把你当作我们中的一员，我希望你不久就会真正变成我们自己人。”

长官破天荒第一次请我上楼去他的居室吃点心。我暗自吃了一惊，但还是接受了邀请。

点心完全是欧洲式的。有两个年轻的日本女子精心服侍着我们。

坐在餐桌上的长官看上去就象一个十足的英国绅士，这使我既困惑又好奇。我面前这个神秘奇特的人时而形同村夫，此时又能化作绅士；他往往对许多事情显得蒙昧无知，却又拥有多方面的教养；他有时似乎对他的国家前途充满忧虑，有时又象是确信日本必胜。他是我所遇见过的最矛盾的一个人。

当饮到第二瓶法国美酒的时候，我冒昧地说道：“你使我觉得你是个游历过许多地方的人。”

“何以见得？”

“你说着纯粹的英语，又带点儿美国腔调。只有久居英美的人才能说出这样好的英语。”

我的长官注视着我，而后，他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你或许是对的，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回答你。在日本情报机关服务的人，不论是什么地位，都不许说出自己的姓名、

职衔以及生活中的轶闻趣事。我们都一律只有号码，没有姓名，没有荣誉，更没有任何社会生活。我们最好只谈工作。

“现在，我打算在两三天内派你去设法营救我们那些被俘的士兵。你可能会和那些土匪住上几天。所以，你可以先休息一下，如果没有异常事故，我暂时不会叫你办事。”

第十一章

1. 我到了游击队的营地

4天之后，长官叫我去见他。一个据说是刚从长春来的大佐已经等在长官的办公室里。他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遍，而后对我的长官说了几句日本话，又转向我说：

“你使我们的士兵从游击队手中重获自由，司令官对你很赞赏。现在，为了剿灭游击队中最强的一股，他希望你能在交换俘虏的同时，再搜集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情报。你看怎么样？”

“这可不容易，”我回答，“如果我把同他们的谈判拖延两个月，游击队马上会意识到我除了营救俘虏外另有企图。我可不想去做这种蠢事，白白扔掉一条性命。”

大佐和我的长官用日语讨论了十几分钟。我能感觉到，长官和大佐的意见并不一致。最后，大佐对长官三鞠躬后，走掉了。

过了半晌，我的长官打破沉默：

“明天你动身到穆陵去，有一个游击队的代表在那儿和你接头。我知道你会全力以赴的，我充分信任你。我们打算用两个土匪交换一个日本兵，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准备出一分钱。你可以向他们暗示我们陆军和空军的强大，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久就有可能将他们全歼。当然，如果你能够说服他们交枪投降，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总之一句话，你全权处理。”

28 小时后，我到达穆陵。刚一下车，就有一个俄国农民打扮的中国人过来问我是不是维斯帕先生。我答应是的，他带我走出车站，骑上两匹配着鞍具的马。出城时，一群日本哨兵把我们拦住，我把一张特别通行证给他们看，上面写明，沿途军政官员均不得盘问我的行踪。

骑马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村子，C 上校早已笑呵呵地等候在那儿了。握手之后，C 向我介绍了与他同来的几位军官，其中还有我的老相识呢。

“你现在是外交官，”C 大笑着说，“而我呢，是个土匪，但是我既不羡慕你也不忌恨你，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顿美餐。”

说着，他把我领进一所中国式房子，餐桌上摆满了美酒佳肴，四周的家具简朴而洁净，一个非常讲究的收音机显得格外醒目。C 看见我一副惊奇的样子，笑着告诉我：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些东西都是日本人的。收音机、家具、茶具、餐具，还有这些食物、罐头食品，全都是我们从日本人手中得来的礼物。我们的大多数士兵穿的都是日本军服，我们用的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也都是日本人的。我们有两尊山炮，可惜没有炮弹。还有那些马，全是日本人送上门儿来的。我们还准备弄一架飞机。我们已经用日本的高射炮打下 5 架了，可惜都被打烂了，没法儿用，再等机会吧。”

就这么说说笑笑地吃过饭，C 带我去看他的驻地。他说得一点儿不错，我就象到了日本兵营一样。所有装备都是日本的，制服、军帽、被褥等等，只不过那些东西上的日军标志都已经被销掉了。

“想想真可笑，”C 上校对我说，“日本人说是苏联政府武装了我们，其实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正是他们！他们还得接着供

给我们呢，直到他们被赶出去或是被全部杀光。贼匪，他们管我们叫贼匪？是他们来我们的国家偷盗，劫掠我们的财产，屠杀我们的人民，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贼匪！”

“那些俘虏在哪里？”我问。

“离这儿有 50 里地，跟我们的人住在一起。”

游击队员都住在中国人家里，他们和当地百姓感情非常好。我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个个都那么健壮，显得训练有素，而且每天都有新兵加入进来。

我看见有些伤兵系着绷带，不由问 C：“谁来照料这些伤兵？”

“我们有 4 个大夫，有一个还是外科医生。”

C 告诉我这些大夫的名字，我一听，他们都是东北的名门子弟。

“我们还有 6 个队员是富豪的儿子，另外，还有 30 来个队员原来是政府官吏、翻译、学生、商人什么的。哼，日本人叫我们贼匪！这些刽子手！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在为我们祖国的解放而战。我们根本不抢劫谁，只打日本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家乡打强盗。人人都有权反抗强盗和杀人凶手。你已经看见这儿的老百姓对我们有多好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的士兵。我们之所以打仗，是为了把日本强盗赶出这儿。我们就是要破坏他们的列车、铁道，抢夺他们的财产，我们还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汉奸。你知道吗？游击队没有一天不在袭击日本鬼子，他们现在根本不敢走出距离铁道两里地以外的地方，我们才是这儿的真正主人。”

的确，日本的宣传机构同盟社一直称游击队为贼匪。如果这些艰苦奋斗的爱国者真的算是什么“匪”的话，那么整个东

北地区应该是遍地皆“匪”了吧。

2. 再见“托尔克马达二世”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C 和我骑上马，由十几个游击队员护送着，走了两个钟头，来到安置日本战俘的驻地。

C 把我带进一所独立的房子，地面上铺了一些草，摆着桌子和条凳，还有一个非常讲究的收音机。我猜这房子以前一定是关牲畜的地方。

40 多名军官等在那里，有的看书或是聊天，还有的在玩纸牌、搓麻将。C 一进屋，全体立即起立，而后开会。大家一致赞成交换俘虏，但不少人担心上当，怀疑日本人会食言。

我向他们声明，只要是由我来负责这件事，就保证不会在暗中欺骗和捣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先将 50 名日本人送到需要两天路程的一个车站放掉，等到 100 名游击队员被释放回来后，再以同样的办法放出 50 名日本人。

我睡在 C 上校的房子里。他为我准备了上好的被褥，这自然也是从日本人手中得来的战利品。但是我们都睡不着觉，兴奋地聊着各种话题。我们说着游击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谈起那些资助游击队的爱国者，回忆起上次我们里应外合、突袭横道和一而坡的胜利。当然，我也没忘记把我的长官让我恐吓游击队的话学给 C 听，而后，我们俩象小学生一样开心地哈哈大笑。

C 兴奋地告诉我，“托尔克马达二世”——那个在横道大肆施暴的日本大佐，现在已经成了游击队手下的一个模范战俘，乖得就象一只最为驯服的癞皮狗。

第二天早上 7 点钟，S，那个曾在横道的车厢中与我会面的俄国人，带着 5 个加入游击队的俄国人来看我，说是要向我致敬。C 请他们和几个中国军官同我们共进早餐，一股浓浓的友爱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涌动着。

吃过早饭，我请求 C 准许我去看那些日本战俘。日本士兵们都被关在用铁丝围着的 20 多间中式平房里，有几个哨兵在围栏外看守着。日本军官则被关在另外两间平房里，其中军阶最高的就是托尔克马达二世。C 上校、S 以及 4 名中国军官与我一起前往托尔克马达的住处。里面有好几个日本士兵正在用装过煤油的铁皮桶洗着衣服，另一些在劈柴。

我们刚一进去，10 多个日本兵立即全体起立，不停地向我们恭敬地鞠起了日本人那举世闻名的、毫无意义的 90 度大躬。他们有的穿着军服，有的穿着便装，而托尔克马达二世等几个却穿着和服。如果说这位日军大佐穿着军服的样子象是一只猴子的话，那么他现在穿着和服、留着须发的样子真让我想起炼狱中的花斑鬼。托尔克马达二世一看见我，就做出了应该算是微笑的一副怪相。他想凑上前来，却被 S 一把推了回去。我以为他会大声抗议了，没想到他却极其恭敬地鞠起躬，一个劲儿地用俄语道歉。

这个曾经把数百名中国人和俄国人的生命捏在沾满鲜血的手中、以杀人害人为乐事的屠夫，如今却在他骂为猪狗不如的敌人面前变得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他身边的那些日本军官也同他如出一辙，这些可怕的武士道精神的捍卫者、神圣天皇的儿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现在全都在那儿反反复复地鞠躬再鞠躬，令人作呕。

我走到托尔克马达二世面前，对他说：“我是日军司令派

来交换俘虏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希望第一批交换的 50 名日本兵今晚就能起程到哈尔滨去。”

“谢谢你，谢谢你，”托尔克马达二世极尽恭敬地鞠着躬，几乎要趴到地上了，“您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绅士，一个最伟大的、最光荣的绅士！如果我能重获自由，我一定不会忘记你！我希望光荣的绅士能让鄙人跟第一批俘虏回去。”

我们走出房子，我发现大家都跟我一样感到恶心。我真难以想象这个卑鄙的东西就是几个星期前以枪毙威胁我的那个暴君。我对 C 上校说：

“拿鞭子痛打这畜生一顿倒是挺有趣的。”

“人总应该设法款待好朋友，……”C 想了想，笑着说，“今晚你就可以实现你的心愿了。”

“是吗？……可我回哈尔滨后，他们非把我枪毙了不可。”

“放心吧，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说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黄昏时分，50 个伤病老弱的日本兵被蒙上眼睛、扶在马上，由 25 名游击队员护送着，向铁岭河车站出发了。为了躲避日军的飞机，整个队伍昼伏夜行。我将一封信交给一名被释放的日本军官，让他转交我的长官。在信里，我说明了与游击队谈妥的交换条件，并要求他履行诺言。

第一批俘虏离开两小时后，C 上校、他的军官们和我同桌吃过晚餐，而后他将我带进一个小房间，把我单独关在里面。这令我大吃一惊。

大约 10 分钟后，门开了，C 上校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只手枪。他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演出开始了，”而后高声大叫，“滚出去，混帐的满洲人！出来，快点儿，进去！”

我装作勉强服从的样子，走进一个大房间里，我看到，托尔克马达二世正象一个和尚一样，跪在房间中央。C上校将一条鞭子交给我，用手枪指着我，厉声命令道：“可恶的满洲人，你不是要求先放这个混蛋跟第一批俘虏走吗？可见你们是好朋友啦？我偏要你抽你这好朋友 20 鞭！使劲儿抽！否则，我就放一粒子弹在你的脑袋里。”

我作出一副昂然不屈的样子，对此断然拒绝。

“你不肯？好吧。但是在枪毙你之前，我要你先看着你的朋友被打，可不是 20 下，而是 50 下！”C 上校转向一个士兵，命令他，“给这家伙 50 鞭！”

士兵走到我面前，伸手向我要我手中的鞭子，同时恶狠狠地盯着托尔克马达二世。后者浑身颤抖着哀求我：

“请……请！维斯帕先生，您最好打我 20 下，……这家伙会杀了我的……”

我故作勉强地举起鞭子，轻轻打了托尔克马达二世两下。

“打重些……打重！打重呀！”C 上校严厉地命令我，“否则，我要他挨 50 下。”

其余的 18 下我就竭尽我的全力了。每打他一下，我都在心里想着我亲眼所见的那几百名无辜的牺牲者。托尔克马达二世的叫喊声就象是被关在笼中的野犬。

惩罚结束后，C 上校命令士兵把托尔克马达二世带回他的住处。我将他送出去，悄悄向他道歉说我是万不得已才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来。

而后，我和 C 上校开怀大笑。

历时 19 天，我的使命终于结束，日军俘虏们通过各自不同的路线分别被遣送到不同的车站。

我和 C 上校以及他的军官们依依惜别，回到哈尔滨。

我的长官把我当成了一个英雄，他告诉我，他已经向东京推荐我做他的副手。由于托尔克马达二世是穿着和服被俘的，他因此受到斥责，并被押送回日本本土。

第十二章

1. 日军流行绑票

在第十章中我所讲过的那两个日本宪兵大尉因为成功地绑到 18 万元，从而引起了无数人的羡慕。如今，绑票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的例行公事。宪兵团所雇用的 10 名土匪，几乎没有一天不“抓获”几个有钱的中国人或是犹太人的。恐怖弥漫着满洲全境。各种警察机关都各有一群绑人勒索赎金的土匪。在各大城市中，富裕的中国人和犹太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绑去勒索巨款。大多数被绑者缴过赎金被释放出来后都不报警，因为他们大都知道绑匪和警察实际上亲如一家，一旦报警，将会给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

这里我只叙述我亲眼看见和经过我手的事。

我的长官命令我查办日本宪兵团和情报部门雇用的中俄土匪绑票案，让我弄清那帮人勒索的赎金是否过多。长官还亲自审问那些富有的、声称自己没钱或钱不够的被绑者，在这种时候，他常常叫我去作翻译。以下是一些被绑者的真实姓名和赎金数目：

富豪王尧卿为赎回自己的儿子付款 25 万元，而后又为赎他自己付款 40 万元；百货商店店主莫惠堂被绑 2 次，每次赎金为 10 万元；商人张清和被绑 3 次，前两次赎金均为 20 万元，第三次为 10 万元；商人陆泰为赎回自己的儿子付款 10 万

元，又为赎回自己付款 5 万元……

许多中国富豪和前任高官显宦的财产都干脆被全部没收了，这些人都被迫到庙里去做和尚。前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王先生，现在哈尔滨的俄国新坟园附近的一座庙中做方丈，有不少和他同样经历的人跟他在同一个庙里。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庙里去看看这些前任高官是否真地在那儿静坐念佛，这是长官派给我的固定任务。据我所知，他们中有几个人是罪有应得，但其他人却是值得尊敬的。

凡是认识加斯白克医生的人，都对他充满敬意。他是一个充满慈祥仁爱之心的坦荡君子，曾被日本宪兵队的土匪绑架过两次，每次都被逼着交纳巨额赎款。海里逊医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商人特拉生科被宪兵绑去，勒索 15000 元；后来他又被市警察绑去，勒索 5000 元。商人提斯敏尼斯基也被迫缴赎金 15000 元。爱斯金先生被迫缴赎金 10000 元。舒勒狄弗洛伦斯先生刚刚从犹太会馆里走出来，便被 6 个全副武装的土匪绑去，当时有 200 多人在旁边看着，警察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绑匪是日本宪兵队的人。舒勒狄弗洛伦斯被囚在一个黑牢洞中整整 150 天，直到缴款 25000 元后才得以释放。

日本宪兵队队长下令绑架一名波兰学校的富有的学生，前去执行的 3 名绑匪认错了人，架走了天主教堂孤儿院里一个叫伐伦丁太那伊夫的孤儿。宪兵队队长却拒绝释放这个可怜的孩子，他说：“天主教堂有钱，就让他们来赎这个穷孩子吧！”两个月后，吉林的主教才用 2000 元把他赎了出来。

哈尔滨一家大药房的主人是个犹太人，叫科夫曼，看上去非常富有。1932 年 3 月 11 日晚 10 点钟，他被日本宪兵队的

几个俄国人绑去，关在新城宪兵队的地牢里。第二天，俄文报纸上发表了科夫曼被绑的消息，然后报社就接到绑匪的通知，要求被绑者的家属马上缴出赎金3万元。当天夜里，宪兵队将科夫曼从地牢转移到郊外马家沟的一个小平房中。

宪兵队里的俄国情报员说科夫曼是个富人，交出3万元对他来说很容易。而另一些宪兵却说估计科夫曼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因为他虽然有财产，现金却并不多。我的长官就此事询问我的看法。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不相信科夫曼家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同时，我提醒他，现在外面都在议论，说绑架科夫曼的不是土匪而是日本宪兵。

“我对这些谣言不感兴趣。我猜想，即使科夫曼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阔气，犹太人联合会也会筹款来赎他的。”

12号，宪兵队决定把赎金降到15000元。正当他们要把这个消息送到那家俄文报社时，绑匪之一的俄国人拉佐伊夫斯基走了进来，坚决反对降低赎金额，并说他已经得到了有关科夫曼财政状况的可靠情报。

这个可恶的年青无赖拉佐伊夫斯基是于1927年带着两个与他同样可恶的亲属从苏联逃到东北来的。最初，有人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因为他的父亲是苏联领事馆的雇员。后来，他加入了一个白俄匪帮，专门打着所谓的爱国和反苏旗号进行盗窃活动。这个无赖曾因行窃两次被捕，还曾用恐吓的办法强迫一个法律学校承认他是该校学生，并于几个月后弄到了一张毕业文凭。自然，他所在的这个匪帮很快受到日本人的重视，于是，他们被邀请加入了日本人谋财害命的罪恶行列。

“我要求让我去审他。”拉佐伊夫斯基说，“如果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我保证能让他吐出3万元来。让我去吧，不

会有错的。”

他得到了准许。两个日本宪兵、吉里兼科与他一同到幽禁科夫曼的地方去。

当天中午 11 点半，我的长官急匆匆地找我去见他。

“你知道出什么事了吗？”他对我说，“科夫曼死了。他们大概让他受了苦刑，而他的心脏衰弱，根本受不住。无论如何，我要你去看看，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了宪兵队，叫他们让你进去。”

我跑到宪兵队本部，从那儿坐上非军用汽车直奔马家沟。

10 分钟后，汽车停在一座破房子前。陪我同去的宪兵军曹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立即闻到一股恶腥味。在一支烛光下，我看 5 个人正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其中有 2 个穿便装的日本宪兵，还有拉佐伊夫斯基、吉里兼科和一个叫卡留斯科的俄国人。

拉佐伊夫斯基请我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喝酒。

“不，谢谢，我来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拉佐伊夫斯基斜起眼，充满嘲弄地看着我，说：

“我还以为死了一只猪没必要做什么报告呢。这混帐的犹太猪要钱不要命。他不肯写信给他的老婆。我才吓唬了他一小下，他就死了。我们有什么法子。象他这样的猪，哈尔滨多的是。”

我要求看看科夫曼的尸体。他被放在一个角落里，用一条脏毯子盖着。我看 5 个人的上半身，立即吓得打了一个寒颤。科夫曼已经面目模糊，被烙得不成样子，还带着一股烧肉的气味。现在我才明白，刚进屋时我闻到的那股恶腥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了。

“这是谁干的？”我问。

“我，”拉佐伊夫斯基满不在乎地答道，“凡是肮脏的犹太人都是俄国的敌人，都应该被这样弄死。”

我发现不幸的科夫曼临死前遭受了残酷的苦刑。他们烙了他的手脚之后又烙他的脸，而且在他叫唤的时候塞住了他的嘴，以至于将他窒息而死。

我回去将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报告给了我的长官。他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只不过说了句：“太糟糕了，简直是毫无意义的胡闹。”

更令人恐怖的是，日本宪兵事后竟将科夫曼的尸体劈成了4块，埋在了他们处置死在街头的吸毒者的坑道里。

然而，日本宪兵队仍然在和科夫曼的家人就赎金数目进行着谈判。科夫曼惨死的3个星期后，科夫曼的夫人交了18000元钱以赎回她的丈夫。

各处的日本宪兵队和各种日本警察机关所雇用的俄国帮和中国帮的绑匪多如牛毛而又互相倾轧，以至于中国和俄国的富人们不敢出门半步。这恐怖的统治或许比历史上的任何暴虐时代都更为恶劣。

在讹诈苏联侨民的钱财时，日本宪兵觉得绑票过于麻烦，索性栽赃诬陷他们是共产党或宣传家，而后拘捕他们，不缴巨款者便不释放。在东北的大多数犹太人也都遭受了同样的榨取，被关进监狱。

这或许就是日本外交官向全世界宣布的“门户开放”原则吧，只不过他们开的只是监狱之门罢了。而一旦跨进监狱之门，就只能拿钱来换取自由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他的文章《日本所建立的新

殖民地》中写道：

“哈尔滨，曾经是可亲可爱的地方，现在却成了生死场。……或许世界上各大城市的生活再也没有象这里这样动荡不安的了。哈尔滨的居民，其中大约有 10 万白俄和红俄，如果不带武器，即使是在白天，到处也都有生命危险。强盗、凶手和匪匪，是畅行无阻的。

“外国领事馆不能设置卫队保卫他们自己。有一天，我和正在满洲旅游的波士顿议员丁康来到松花江边，去拜访最为豁达雍容的总领事汉森。汉森先生的卧室前小桌上摆满了步枪和自动手枪，他的住宅两边散布着如临大敌的卫兵。

“我所下榻的马狄尔饭店主人的儿子不幸失踪，这个法国籍的年轻人叫西蒙·加斯普，是一个富有才华的钢琴家。俄国匪徒将他绑去，勒令他的父亲缴出 30 万元赎金，否则，他们就砍掉钢琴家的手指。最后，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被匪徒们割去了耳朵并夺走了生命……”

2. 加斯普事件

在和我有关的多起绑票案中，加斯普事件是在国际上最引人瞩目的。我为了这个案子几乎丢了性命。

被绑者西蒙·加斯普的父亲约瑟夫·加斯普先生，在日俄战争中曾在一个俄国骑兵团中作战，战后作为俄国难民来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开了一个修理钟表的小店，几年之后发展成一家专营银器和珠宝的大商店。1918 年，他成为远东最著名的珠宝商，兼营哈尔滨第一流的马狄尔饭店。到 1932 年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他成了马狄尔饭店的唯一主人，同时又

是许多家联营电影院的首席董事。他的各种资产加在一起，已经价值几百万。

约瑟夫·加斯普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谈论他自己以及他的财产，更喜欢炫耀他那两个在法国留学的儿子，其中一个在巴黎大学，另一个在音乐学院读书。他爱吹嘘自己的孩子们学业超群，自然也要谈及他们都已经加入了法国籍。

由于他已经觉察到日本人对他的财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居心叵测，因此他着手把全部财产全都登记在了两个爱子的名下。当他的财产转移工作全部结束之后，法兰西的三色旗就开始高高飘扬在他所经营的马狄尔饭店以及各家影剧院门前。

眼看着这些赚钱的大产业如此堂而皇之地过渡到法国人的管辖之下，日本人是绝不能容忍的。

早在 1933 年 5 月初，我的长官就表示要绑架约瑟夫·加斯普。但是他承认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老加斯普很少出门，偶而出门，也总是带着武装精良的俄国保镖，他所居住的马狄尔饭店地下层警戒森严，窗子和门上都安有钢板，好似一个炮台。

年轻的西蒙·加斯普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来到哈尔滨小住。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一个有天份的钢琴家。他的父亲、老加斯普毫不吝惜地花钱让他的艺术家儿子在他最好的剧院里演奏，还为他布置最豪华的排场到上海、东京去演出。

小加斯普刚从东京演出回来，哈尔滨的日本宪兵就派人跟踪上了他，而这个法兰西籍的年轻人对此毫无觉察。

1933 年 8 月 14 日，我的长官问我法国领事里诺特和加

斯普家的关系是否可以称得上亲密。我告诉他，据我所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友谊。

“我也这么想，”我的长官说，“法国领事和那些犹太猪之间能够有什么共同点呢？他肯定知道加斯普那两个儿子加入法国籍，不过是要防备他们的财产被日本人拿去。无论如何，法国三色旗也不能阻止我们所要做的事。我已经命令宪兵队绑架小加斯普。据我在马狄尔饭店的密探报告，他常在晚上和几个犹太姑娘出去，到很晚的时候才能回来。但是为了防备有人怀疑到日本人，这事件只能让中国人去下手。等我计划好了就通知你，你叫影挑选 8 个最能干的人来干。”

1933 年 8 月 17 日，我的长官命令我派影率领 50 个人到洮南去剿办一个村子，因为一个日本宪兵和小军官在那儿被杀身亡。当时他并没有提起加斯普一事，我以为他已经放弃这个计划了呢。

8 天以后，我的第 1 号告诉我，听说西蒙·加斯普已经被绑。我把这谣言报告给我的长官，他的嘴角泛起他特有的那种讥讽的微笑。

“我也听说了，但还不知道详情，你就不必操心了。我已经命令别的特务员去调查这件事了，我知道你太忙，况且，几天之内就要完事了。”

当晚，我的特务员给了我一份关于这起绑票案的详细报告，并且指出了直接或间接参与这次暴行的有关人员名单。事实是这样的：

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翻译秘书中野和督察员马丁诺夫是这次阴谋的主谋，动手的 15 个罪犯，都是由杀害科夫曼的那个拉佐伊夫斯基从法西斯俱乐部中选拔出来的。拉佐伊夫斯基

现在是这个俱乐部的首领兼《我们的路》报的编辑。他们还派了一个叫孚托普洛的希腊流氓到马狄尔饭店，把小加斯普每天晚上偕同出游的女子的姓名以及所经过的街道，全都一一侦察出来，报告给中野。

1933年8月24日，小加斯普在他常去的一家门前停车的时候突然被绑，而后被藏到哈尔滨附近的一个隐秘地方。

第二天，日本宪兵队要求老加斯普缴出30万赎金。老加斯普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说，等他儿子平安回来的时候，他愿意拿出几千元钱来。这位老人的性格极其倔强，即使日本宪兵威胁说要杀死他的儿子，他也绝不动摇。谈判因此毫无结果。

一个月之后，9月28日，小加斯普的耳朵被割下来送到他的父亲面前，但是这并未能改变老人的决心。他仍然说，等他的儿子被释放后，他才肯出35000元。

法国领事对日本当局提出抗议，日本人的回答是：愿意尽力寻找小加斯普。

法国副领事沙保——一个非常能干的年轻人，深知日本当局的回答只不过是敷衍了事的空话，于是雇了几个可靠的干探，自行侦察。他很快查出了真相，但是苦于没有证据。他命令他的干探逮捕孔米萨连科——绑架小加斯普的匪徒中最年轻的一个，并把他带到法国领事馆来。孔米萨连科在领事馆里不但供认不讳，而且还把供词写了下来，并在供词上面签名。他被当即释放了。

第二天，沙保先生亲自去见警察厅长，正式控告绑架小加斯普的匪徒及与此有关联的人，并呈递孔米萨连科供词的抄本。

警察马上通知了日本宪兵队，宪兵队立刻派人押解孔米萨连科到离哈尔滨 600 里的大黑河去逮捕沙保雇用的干探。（干探中的奇米斯台奇先生到我 1936 年逃离东北时仍被关在监狱里面。）

次日，日本人所办的两家俄文报纸《哈尔滨时报》和《我们的路》就开始攻击沙保先生，说他是共产党、犹太人，等等，这种舆论声势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一个所谓的法西斯党徒甚至要求沙保先生来与他决斗。

但是，这起绑票案的消息已经流传到了国外，英、法、美各国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暴行。东京政府显然还是要顾及舆论的，命令设法结束这一事件。于是，我的长官迫不得已下令逮捕沙保先生向警察厅投诉的那几名绑匪。10月9日，绑匪中的马尔丁诺夫和山达尔被捕。他们坚持说，他们并不知道小加斯普被关在什么地方。而其余的匪徒此时都不知去向，逍遙法外。

与此同时，小加斯普仍然被幽禁着，老加斯普和日本宪兵队的谈判又在进行中。小加斯普给他们写了十几封信，但是老人不顾儿子的请求和日本人的恐吓，仍然坚持非到儿子释放后才肯缴款。他过于自信，甚至扬言日本人会不要他的一分钱就把他的儿子送回来，而且还要向他道歉。他哪里知道，这种论调足以要他儿子的命。

当我的长官听到老加斯普的话时，他沉静地说道：“加斯普先生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儿子了，即使他愿意出 100 万。”

日本人现在绝不可能活着释放小加斯普了，因为他曾经与中野以及其他日本宪兵队的军官们面对面地说过话，他清楚地知道，绑架自己的并不是俄国人，而是日本人。如果让他

活着出来，他会向全世界说出真相的。

为了防止法国副领事沙保先生所雇用的干探以及加斯普家的保镖们找到小加斯普，日本人给他更换了好几个地方。

尾井大佐，铁道警察局的“高等顾问”，其实是真正的局长，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君子，在满洲国的日本大员中极少有的好人之一。虽然他位高权重，管辖着铁道沿线好几千公里的地区，他却能慎重地行使职权，严正无私。他严禁部下使用其他警察机关所惯用的酷刑。对于他手下的职员来说，无论国籍，他都是一位廉洁严明的上司。即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尊敬他。在他所管辖的铁道区域内，绑票的事是没有的，任何日本人要是在他的领域里胡作非为，就会即刻被遣送回日本。尾井大佐不但不赞成其他日本军事当局的暴虐，而且敢于直言指责。“叫他们回国去胡闹吧。”他常这样说。因此，别的警察机关手下的人员都无法在铁道地区之内任意行事。

当沙保先生向警察厅控诉绑架小加斯普的匪徒的时候，日本宪兵队把孔米萨连科押解到大黑河，而这地方恰恰是在尾井大佐的管辖之下的，所以大佐命令逮捕孔米萨连科，并把他带到哈尔滨铁路警察局来审讯。孔米萨连科把他向法国副领事供认的供词又复述了一遍。

尾井大佐将带有孔米萨连科亲笔签名的供词转交给了日军特务机关长。

事已至此，日本宪兵队还是不顾一切，并不放弃从加斯普身上得到赎金的希望，最初是要 30 万，后来逐步降低，从 15 万、10 万、7 万 5 千，以至 5 万。但是老加斯普仍然固执，要到他儿子回家后他才肯缴出 3 万 5 千元。

1933 年 11 月 28 日，尾井大佐得到情报，绑架小加斯普

的两名匪徒——比斯鲁奇科和赛亚兹夫——常常经过哈尔滨旧城车站。当夜，正当他们要上车到小林去的时候，尾井大佐下令逮捕了他们。这时，小加斯普就囚禁在小林附近，由吉里兼科和加留斯科看守着。当他们看到火车进站而来接替他们的比斯鲁奇科和赛亚兹夫却没有下来时，他们开始怀疑事情有些不妙，于是心焦起来。吉里兼科尤为敏感，他三番五次地到车站上给中野打电话，询问那两个同伙为什么还不来。但是中野并没有告诉他那两个人已经被捕，只是让他不要着急，耐心等待。

在吉里兼科出去给中野打电话的时候，加留斯科趁着单独看守小加斯普的机会，向他提出两人做一笔交易。

“如果你父亲肯给我1万元的话，我可以把你放掉，那样的话，他就不必再向宪兵队交一个儿子了。”

“你要我怎么做？”

“把这意思写一封信给你的父亲，由我送去。”

小加斯普当即照办了。

当吉里兼科打完电话回来的时候，觉察到两个人的神色不对，顿起疑心。当加留斯科坚持当晚就要回哈尔滨时，吉里兼科就更加怀疑两人之间有什么默契了。他不露声色，暗中决定在加留斯科离开之前再给中野打个电话。一个小时后，他到车站给中野打通了电话，把自己的疑心说了出来。中野让他通知加留斯科在当晚5点钟的时候到铁道货仓附近去见面。

中野带着一个日本宪兵和孔米萨连科（又释放了）来到约会地点。加留斯科被抓住并受到搜查。小加斯普写给父亲的信自然被查了出来，但那是用铅笔写的法文，这4个人只懂得一个数目字：“¥10000”。但这足以使一切明了了。中野当即

拔出手枪，打破了加留斯科的头颅。然后他叫人带了一封信给吉里兼科，命令他即刻杀掉小加斯普，而后回哈尔滨，他会将护照和钱交给他，让他远远地离开此地。

吉里兼科执行了命令，而后拿着日本宪兵队给他的一张假护照向北逃去。但是他没走出多远，就于 12 月 18 日在呼兰车站被尾井大佐派人逮住了。

就在加留斯科被中野枪杀的第二天，拉佐伊夫斯基到我家里来取小加斯普用铅笔写的那封法文信的译文。小加斯普在信上要求他的父亲将 1 万元交给加留斯科，请求父亲不要延误时机、以致危及他的生命。这个年轻人到死还相信加留斯科是能够履行他的诺言的。

事后，日本宪兵队在解释加留斯科的死因时，宣称他是抗拒警察的拘捕而被当场击毙的。

12 月 3 日，日本宪兵队宣称小加斯普已经被杀。他的尸体在掩着一层薄土的浅坑里被发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情景。这个年仅 24 岁的可怜的年轻人落在非人的匪徒手里，必定是受尽苦刑了。95 天的幽禁时光把原本英俊体面的他消磨得已经没有人形，完全成了一架骷髅。他的耳朵是被割掉的，东北 11 月的气温低至零下 25 到 30 度，严寒冻裂了他的面颊、鼻子和双手，以至肉块崩落。在 95 天之中他不可能梳洗一次。看着他的面容，想到他的精神和肉体所遭受的痛苦，我甚至为他已经死去而不再受苦感到安慰。结束这孩子生命的那一粒子弹或许是他的那一段悲惨生活中唯一的一点恩惠。然而，悲剧并没有就此完结。

小加斯普那体弱多病的母亲从巴黎赶往哈尔滨，盼望能营救她的儿子。12 月 3 日她到达上海。第二天一早，她在汇中

饭店进早餐时,从《中国北方日报》上吃惊地读到她儿子惨遭杀害的噩耗。

当小加斯普的尸体被运回哈尔滨时,老加斯普不顾朋友们的劝告,硬要将棺木搬进他的家里。他揭开棺盖,想要再见到儿子一面。他旋即发出一声癫狂而绝望的尖叫,惊骇得当场昏倒在地。

3. 我被监视了

哈尔滨全城百姓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不但是犹太人,所有的俄国人、中国人、高丽人、甚至有些日本人全都痛恨这种无法可说的暴行,一致公开诅咒日本军事当局应对这起绑票与谋杀事件负责。公众打算在为小加斯普出殡的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日本军事当局从齐齐哈尔调来了 250 名日本宪兵和一个联队的步兵来增强哈尔滨的警卫。

我在哈尔滨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盛大的出殡场面。日本当局发出了禁止殡仪通过主要街道的禁令,并派出大队军警。但是,哈尔滨的全体市民对此全然不顾,他们紧紧跟在灵车后面,高呼着“和日本军阀拼死!”、“和这些野兽拼命!”、“和这些混帐猴子拼命!”等口号,一起来到犹太人墓地。

考夫曼博士,一位多个犹太人团体的首领,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他用辛辣的字句斥责谋杀西蒙·加斯普的绑匪们以及在幕后庇护他们的人。

第二天,考夫曼博士被传唤到日本特务机关中去。日本人使出浑身解数对博士极尽辱骂,并恐吓说要将他驱逐出满洲。拉佐伊夫斯基在充满邪恶的《我们的路》报上发表了长篇大

论，要求逮捕博士并治罪，其理由是他侮辱了那些爱国的俄国人，而他们只不过是杀了一只肮脏的犹太猪、一个“第三国际”的间谍的儿子，等等。

日本军事当局为安全起见，把那 6 名绑匪押在刑事警察的监狱里，却不准将他们送上法庭受审。在监狱里，6 名匪徒一直受到特别优待，饭食都是由附近的餐馆送进去，而且每天都可以会见亲友。他们就这样在监狱里安然度过了 15 个月，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审判。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常常在夜里被放出来继续从事绑票或是其它有利于日本宪兵队的勾当。对此种说法，我坚信不移，因为我就在无意之中亲眼看见过他们中的两个人。

1934 年 6 月的一天夜里，我和日本宪兵队的原少佐，带着 2 名俄国情报员、4 名日本宪兵以及影的 25 名土匪，正在离哈尔滨几公里处的小村里搜查苏联侨民的家宅。忽然，我们看见一群人迎面走来。原少佐命令我们隐藏起来，等待那些人走近。不一会儿，我们将他们团团围住，并用步枪对准他们。一个日本人走上前来，并向原少佐解释着什么。我趁机向那群人仔细看去，发现竟是绑匪中的山达尔和吉里兼科以及 3 个我不认识的俄国人。另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欧洲人，他们的手都被反向捆着。几句话说完后，原少佐不再说什么，让我们放那群人通过。我无法弄清那两个被绑者究竟是什么人。

加斯普事件过后，法国领事、加斯普的家属以及各大外国报纸仍然都在针对日本政府进行着抗议，并要求把谋杀西蒙·加斯普的凶犯交出来由法庭审判。这致使东京发来一个命令：6 名罪犯必须移交满洲国司法当局。起诉书是由著名的刑事科长奥下卫起草的，这位科长正是一切俄国的、中国的、高

丽的和日本的匪徒的秘密同谋，每年靠交纳 10 万元钱以维持他的现有地位。

在那份无耻的起诉书中，6 名罪犯被称作“是最正直善良之国民，是曾竭其大半生之精神致力于反共斗争之真正俄国之爱国志士。倘彼等果有绑架西蒙·加斯普之事，则其动机绝非为个人之利益，而实为供给反共团体必要资金以继续其反布尔什维克之崇高战斗也。……被告等曾犯何罪乎？（起诉状在此绝口不提绑票一事）伤害罪乎？……割加斯普之耳者加留斯科也……而加留斯科已死……不能负此罪责。……谋杀罪乎？谋杀加斯普者亦该加留斯科也……法律将无所施矣……勒索财物乎？则加斯普并未交付一钱。诚如上述各情，则被告等所犯唯一罪行似为‘意图勒索’……然事势所需，情有可原，盖此种‘意图’并非起因于私人利益而乃源于政治理由也；而此‘意图’之对象乃一公认之共产党犹太间谍、一赃物收买者、一社会公敌……尊亲之罪自来报应子孙，西蒙·加斯普已偿其父之恶……被告等爱国心切，见义勇为，情有可原，似应从宽……”

哈尔滨的领事团一致斥责这份起诉书横行霸道，东北人民对此极为愤慨。刚直的尾井大佐认为这样的文件简直就是日本的耻辱。（此时，大佐已经和我成了朋友，而且经常请我替他帮忙。）

6 名被告终于被移交到高等法院，收监在牢里，并提交中国法官审判。

虽然当时法院都是在日本“顾问”的控制之下，哈尔滨的中国法官还是坚信法律与公道与他们同在，因此敢于鼓足勇气向“顾问”们提出异议。面对绑架小加斯普的杀人犯，法官们

不满意于日本人所制造的一面之词，决定由法院对一些具体事实重新进行调查。但是事情进行得困难重重，因为到处都布满了日本密探和奸细。那时，我的长官就对我这么说：

“你知道高等法院院长要调查那 6 个被告的历史吗？他显然是在怀疑奥下卫的起诉状的可信性。哼，他自以为比我们更聪明，等着瞧吧。我已经通知各种警察机关，只要遇到法院来人调查，就必须遵照奥下卫的起诉状的口径来回答。不过，我估计主审法官正在搜集官方以外的材料，所以我要你做一点儿事。我要你派人去监视那 3 个法官的住宅，而且拘捕所有去拜访他们的嫌疑犯。我可不愿意再发生沙保那样的事情。”（法国副领事沙保由于揭发了绑匪，已经被日方认定为“不受欢迎的人”，被法国政府调到天津去了。）

我的长官还命令我去设法蒙蔽中国法官。第二天，我请我的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 3 名中国法官中的一人，谈起我想要向他们提供有关那 6 名被告的种种情报。那位中国法官听了非常高兴。

一星期之后，我将所有必需的文件交给了这位中国法官。这些文件足以证明 6 名被告与政治一向没有任何关系，证明他们是一些最恶劣与危险的刑事犯，证明马丁诺夫在 6 个月前曾经奉日本宪兵队长的命令杀死过阿格诺夫上校以及 10 多名中国和俄国的富人，证明山达尔和吉里兼科是妓院老板及白奴贩卖者，证明这些恶棍全都属于日本宪兵队所组织的一个暗杀团，证明割掉加斯普耳朵的是山达尔，证明杀死那可怜的年轻人的是吉里兼科而不是加留斯科……

在长时间的审判过程中，法官们为了要弄清各种问题，多次和我秘密接头。我把尾井大佐从他抓获的孔米萨连科、赛亚

兹夫、比斯鲁奇科和吉里兼科身上搜出的各种通行证件也交给了法官们。这些证件明确标明，这4名绑匪是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员，任何人都不得干涉他们的自由。如果没有这些证件，这些匪徒是不能在铁路上随意往来，而是寸步难行的。

审判一直持续不决，而日本人对中国法官们掌握的情报之多感到十分惊异。

2月26日，我接到法西斯党领袖兼《我们的路》主编的一封恐吓信：

“维斯帕先生：

“本党认为阁下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我们的主张，而明显偏袒犹太人。阁下身居高位，故应当知道该怎么去做。

“特此警告，务请停止有害我们爱国同胞的行为。

“法西斯党领袖

“K. V. 拉佐伊夫斯基

“1936年2月26日于哈尔滨”

这封信使我大吃一惊。在我拜访那些法官时有谁跟踪我吗？哪一位法官会泄露了什么吗？倘若日本人知道了……又究竟知道了多少呢？事到如今，只有豁出去了。

我把恐吓信交给了我的长官，他微笑着，说：

“你没必要把这信看得太认真。也许是你去巡查那些监视法官住宅的暗探的时候被人看见了，拉佐伊夫斯基这个蠢货就怀疑你是去给那些法官提供情报了。”

我见长官对我深信不疑，于是添油加醋地说道：“每次我在法庭旁听，都发现法官们的消息确实灵通，然后我就到他们的住宅附近去查看有没有什么走露风声的线索。”

我的长官拿起电话，用日语说了几分钟后，对我说：

“我刚才把你去拜访法官是奉我的命令的事告诉了宪兵队长，叫他转告拉佐伊夫斯基专心于他自己的，少管闲事。”

1936年3月4日半夜1点钟的时候，我刚刚与一位被日本人逼迫着做了和尚的中国大员会了面，从一个中国寺庙走出来，忽然迎面碰见日本宪兵队派在马狄尔饭店的那个希腊流氓孚托普洛。我充满嘲讽地问他：

“这么晚了孚托普洛先生还在这儿转悠什么？”

“我跟一个住这附近的朋友聊天，在他那儿耽搁得太晚了……你，维斯帕先生，这时候你在庙里要干什么呢？”

“你不会不知道吧，这庙里有许多重要人物，而照看他们是我的任务。我总是在这个时间到这周围来，因为这些人往往可能在夜间逃跑。”

“夜间也是密谋的好时候。”

这家伙的回答令我极不愉快，我决定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孚托普洛先生，我想跟你多聊一会儿。如果明天上午11点钟你有工夫的话，请到我的家里来坐坐。怎么样，愿意吗？”

“愿意愿意，维斯帕先生，我一定来。”

第二天，他如约前来。我将他带到花园的条凳上坐下，我的朋友影就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说：

“孚托普洛先生，我不知道你了解我的一些什么，我也不在乎这些，但是你应该知道一件事。7年前你到哈尔滨的时候，连件衬衫都没有。没有一个象样的欧洲人愿意与你来往，你只好去替一个中国人做事。那个中国人并没厌弃你，象亲兄弟似地看待你、帮助你，让你赚了两三万块钱。可你是如何报答他的呢？日本人一来，你就去侍奉他们，学着他们的样子从

早到晚鞠躬又鞠躬。溥仪登基的时候，你是上表称臣的唯一一个欧洲人。你不但让那位待你如兄弟的中国人吃尽苦头，而且还不放过那些仍然忠于他的人。你的所作所为令我的一个朋友很不开心，他让我把你介绍给他，他要给你一个警告。”

说着，我转身向正在观看过往行人的影叫道：“影先生！”

影走上前来，规规矩矩地向孚托普洛鞠了一躬。经我介绍完后，影用爽快的声调说：“孚托普洛先生，我最亲爱的朋友维斯帕先生告诉我，你近来自讨没趣，招惹是非。你的这种胡闹已经妨碍了维斯帕先生的睡眠。维先生和我是血盟兄弟，我必须让他能舒舒服服地睡着觉。现在我要邀请妨碍他安眠的人去作我的宾客，他让我在星期六杀掉那个混蛋。我不愿意眼见着你处于同样的境地，孚托普洛先生，生命是这样的甜蜜！瞧，春天来了，花都开得如此美丽，我不希望维斯帕先生有什么不快，如果说有的话，我只好请你去作我的宾客，我会陪你度过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小时。”

影又鞠了一个躬，走了。

希腊侦探的脸被吓得面如死灰。他呆呆地坐下，两眼直直地盯着地面，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影？……影？……”然后他望着我，歇斯底里道：“维斯帕先生，我向你发誓……维斯帕先生……我绝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不过是遵从中野的命令……中野恨你。他说他想要设法逮捕你。……他说他相信是你把有关加斯普绑票案的情报提供给了法院，才导致他的名字在法庭上被提到过2次。”

“是谁告诉中野我给法庭提供情报的？”

“我不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请求您，请你告诉影·我并没有反对你，……你要留心中野那家伙，他怀疑你和游击

队有关系。”

我已经让孚托普洛说出了真话，可我对他的控制只是暂时的，对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果然，几个月后，他就伺机报复了我，几乎送了我的命。

绑架西蒙·加斯普一案在6月间终于宣布判决。中国法官不顾日本人将案件转嫁为政治问题甚至爱国主义，认定这是一起盗匪的绑票和谋杀。依照法律，有4名罪犯被判处死刑，另外2名终身监禁。

整个哈尔滨市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天喜地，但是2天之后，我的长官就逮捕了主审案件的中国法官们，宣告判决无效。6个月后，3个日本法官彻底推翻原判，以被告等所为出于爱国热忱为理由，将绑匪全部释放。

第十三章

1. 我的长官被免职

绑票不过是日本人榨取东北地区民脂民膏这一“伟大事业”的一个旁门左道而已。最重要的是“必须买卖日货！”

“满洲国”的每一个商店都被逼着经销日本的制造品。日本各大输入公司把大批日货分配给所有商店，换取金条。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代表人前来巡查销售情况，如果日货没有卖出去或者卖得不多，日本宪兵就会来干涉，甚至让你关闭店门。

“必须买卖日货”的口号不仅通行于中国的和俄国的商店，而且也推行于英、美、法等各国的公司。无论你是什么国籍，“必须买卖日货！”

“必须买卖日货”，当然就必须阻碍买卖别种货物啦。这是日本的政策——完全蔑视自由竞争的政策。

日本人完全统治了“满洲国”的关税之后，又竭尽全力阻止洋货的进口。即使你经过无数麻烦和刁难，闯过所有关卡得以进口，日本人也会设法将你的货物弄得又脏又破。如果是酒，就打碎瓶子；如果是布匹，就画它个一塌糊涂；如果是机械产品，就让它不中用；罐头上捅个洞，桶上揭开盖，包裹全撕开，……等等。当洋货终于从关税货仓中被搬运出来时，必定是已经残破不堪、无法出售的了。

秋林洋行是由俄国商人主持的一家商业机构，在东北各

大城市都设有商店。由于它欠有英国汇丰银行 500 万元，所以归汇丰银行管理，因此凡是秋林洋行的商店门口，全都挂着英国国旗。这就令日本人极为恼火。他们无法直接对汇丰下手，但是又总要做点儿事情来摧毁秋林这家强有力的大商行。

于是，日本人逮捕了洋行经理卡西亚诺夫和 3 个主要股东凯切耶夫、巴宾索夫、塞马诺夫以及他们的妻子。8 个人被抛入拘押着最恶劣的刑事犯的一座大土牢里。他们不断受刑挨打，直到他们认可日本人所提出的一系列条件为止。

哈尔滨有两家英文报纸，其中一个叫作《哈尔滨论坛》，主编是英国记者辛普森。辛普森常以笔名撰写抨击日本人高压手段的文章，他的报纸因此被日本人勒令停刊，所有印刷机件全被没收，他本人也被驱逐出“满洲国”境。辛普森到大连办理收回自己财产的事宜，他的遭遇被提到英国国会以及上议院。伦敦向东京提出抗议，但其结果正如狗吠月亮，日本人仍然拒绝偿还辛普森的财产。

哈尔滨的另一家英文报纸是《哈尔滨观察报》，主编弗里特竭尽一切力量维持这张报纸的正常出版，甚至避免任何有关日本的评论上报，然而仍然不行。他屡次被日军司令部传去，遭受各种恐吓和辱骂。但是，弗里特还是不顾一切，设法贴出和分送，直至日本人明令禁止报纸继续发行，他在走投无路之中只好离开“满洲国”，到上海主持另一家报纸。

日本人到处宣传他们并不关心国际联盟对“满洲国”的议决案，但是，当国联的最后议定书公布的时候，他们气得发狂。他们想不通整个文明世界怎么能够一致宣布他们是侵略者。这怎么可能呢？他们的国家是充满武士道精神的、至高无上的天皇的神圣国家，世界怎么竟敢斥责他们呢？！在日本人的意

识形态中，这是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但是更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穷思极想地设法愚弄李顿调查团，张开天罗地网，布景排戏，展示日本人的高贵精神，这得意佳作如何就被全部揭穿了呢？

李顿调查团毕竟看穿了日本人自作聪明的障眼法。他们不但能够接到 1500 件书面抗议，而且就在无数日本警察的眼皮底下接见了各界人士。这对于最看不起蠢笨的英国人的日本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

李顿调查团不但宣布日本人是侵略者，而且在全世界面前使他们骗子与强盗的原形毕露。哈，这些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在全世界的各种“劣等民族”面前，被宣布为侵略者、骗子和强盗，这足以引起他们普遍的剖腹自杀。我亲耳所听的日本人咒骂调查团、李顿爵士、英国人、犹太人和外国侨民团体共济会的词语，是足够编成一部混帐大百科全书的了。

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的第二天，我来到我的长官的办公室里。他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问道：

“你读过调查团的报告书了吗？”

我说我读过了。

“如果你真读过，”他大声叫道，“而且明白它对于我们的意义，那么你应该自杀！你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走了出来。我想自杀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是不能随随便便就来了，它必须有迫不得已的理由，而且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日本式是切腹，意大利式是在脑袋里放一粒子弹，中国式是吃毒药。我是意大利人，入了中国籍，替日本人工作，要离开这个世界，必须想出一种不但不伤害这 3 种人的感情而且又能得到他们的赞赏的方法才行。这事可就难办了。如果日本

人知道我对于他们的暴行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的话，也许他们早就急不可待地给我一枪，帮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我一连两天没去见我的长官，平心静气地默想自杀的事，长官也不叫我去。第3天一早，我接到紧急传唤。我的长官的传唤永远是十万火急的，所以我并未在意。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发现另有一个日本人和他呆在一起。我的长官亲热地和我握手，而且要我坐下，然后他说：

“维斯帕先生，我已经奉召回国，明天就走。从今天起，这位先生就是你的上司。我已经告诉了他你的工作和你的优点，而且我认为你完全能够继续做下去，也许，甚至比我在的时候做得更好。”

那个新长官和我交换了几个客气的鞠躬。他似乎50岁了，真正的蒙古脸型，有一撮毛茸茸的胡子，一副不算太难看的长相。他说的是不很准确的俄国话：

“维斯帕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从前曾经见过面。……1918年在西伯利亚和伊尔库次克。你那时是和英国的斯蒂芬少校、加拿大的韦伯大尉在一起。我是和日本的特务机关在一起。”

尽管他讲得确有其事，可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曾见过他。

“明天晚上10点钟你来见我，现在我要接见其他特务员。”

我的前任长官将我送到花园门口，表示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欣赏，说我前途光明：“我已经把你推荐给你的新长官了，我相信他会喜欢你的。……好，再见，希望你还会记得我。”

我说那是一定的，然后我们握手告别。

第二天，我的新长官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弄得许多官员都丢了职，你的前任长官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接任情报局长之后，已经辞退了不少特务长，我希望现在留任的这些能干出个样儿来。你是被留任的，希望你不辜负我对你的期望。现在留心听我说。

“为了那份国联议定书，东京的许多人责备满洲的日本当局没能阻止调查团接到几千封信和几百次会谈。我不信这个。即使李顿调查团没有接到过一封信或接见过一个人，那议定书也一定是照样反日的。国联是由犹太人、共济会之类组织起来并加以支持、推行的，还有英国、法国，都是一路货色。造成国联决议的是犹太人和共济会，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所以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我们也有我们的决议。我的纲领是这样的：

“从今往后，在满洲国内绝不让犹太人、共济会员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有片刻的安宁。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间接的办法迫害他们、侮辱他们，让他们痛苦。我们要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无法生活。我们要让他们尝尝我们日本人的厉害。我已经命令我们的两家俄文报纸从明天起开始无情的斗争，反犹太人、反共济会、反青年会。每天必须绑架犹太富人，勒索巨款，我的前任对他们要求太少了。共济会和青年会必须关闭。“满洲国”对这些肮脏的家伙简直太好了。即使他们不赞成共产主义，反正也是一样的货色。从现在起我们就向他们开战，绝不纵容，那个叫作影的中国人在哪儿？”

“他带着 500 人在呼兰附近。”

“他在那儿干什么？”

“他要在那儿肃清 4 个村子，准备给几天之内就到的 650 个日本移民去住。”

“他要在那儿呆多久？”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象这样的工作两天就足够了。打电报叫他暂时把队伍交给他的副手带着，让他带 50 个人立即赶回哈尔滨来。”

第二天，《哈尔滨时报》和《我们的路》就开始诽谤共济会、犹太人以及青年会。他们对青年会的那些臭不可闻的诋毁之词尤其令我难以复述。

青年会是在美国人海格先生精明卓越的领导下的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在海格先生 15 年的辛勤培育下，青年会除了组织各种正常活动及各项运动外，还设立了小学、中学，建起了高等专科以至工科、理科和文科学院，这在当时的哈尔滨实属首屈一指。海格先生及其夫人不仅在哈尔滨人人敬爱，在整个东北地区也处处受到欢迎。但是，日本人却对这对可敬的夫妇进行了最令人难以接受的辱骂。上述两家报纸竟然声称，青年会的男学生多半是流氓小偷、吸食麻醉品者，女学生则多为娼妓……

《我们的路》的主编大人拉佐伊夫斯基眼看着他的这些诽谤并未生效，便开始采用暴力——几个青年会的男学生遭到法西斯党徒的殴打，而几个女学生则当众受到侮辱。海格先生对这些有日本宪兵作后台的匪徒除了愤怒外简直是毫无对策。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 2 年之久，被吓坏了的年轻人逐渐不敢到青年会的学校里去了。1935 年，海格先生被逼得不得不离开了哈尔滨。青年会依然存在着，但已经彻底变成日本化的组织了。学生数目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

哈尔滨的共济会会员 80% 都是外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一些丹麦人以及五六个俄国人。值得尊敬的会长尼维尔先生是一位 70 多岁的英国绅士，他和他的儿子都遭到了日本报纸最为荒唐的攻击，而那几位俄国会员在受尽各式侮辱后又遭到恐吓，被强行退出。

对于青年会和共济会的迫害尽管是可鄙可憎的，但是日本式的侮辱在迫害犹太人团体时才算得上是登峰造极。

考夫曼博士，东北的希伯来人联合会会长，一位最有教养的学者，不但被日本人的所有报纸连续咒骂了好几个月，而且多次在街头被日本人所雇用的俄国匪徒所袭击。我的新长官指派 2 名俄国匪徒在夜间去打碎 2 个犹太人会堂的所有窗子。窗玻璃被重新装上多少次，匪徒们就毁坏多少次。最后犹太人只好放弃了修复计划，宗教仪式就在零下 30 度的严寒中、隔着一道破碎的窗子勉强举行。

影带着 50 个人赶回哈尔滨，他接到的任务是绑架中国富人以勒索巨款。他的其余人马被分成两股，一股在中东路东段袭击列车，妨害苏联运货到海参崴；另一股则活动于依兰北方地区，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农民将大片肥沃的田地拱手让给日本移民。

日本人以地契不合法为借口，从中国农民手中没收过来 20 多万亩良田。如果不抵抗，中国农民可以每亩 1 元的代价出售，而不接受这条件的，就由日本土匪加以驱逐。

但是，中国农民并不全都是那么任人宰割。1934 年 3 月，土匪奉命驱逐土龙山区的中国农民，农民们联合了一个营的游击队在暗中埋伏等待着他们。一场激战之后，土匪大败而逃，留下 100 多具尸首。

日军司令对此极为恼火。他命令负责依兰、佳木斯警卫的一名日本大佐率领一个中队的日本兵来到土龙山，联合当地守备队剿灭中国乱民。但是，土龙山的守备队全是由当地人组织而成的，队长是一个叫作李耀的中国人。当大佐带着日本兵来到的时候，忽然遭到守备队和农民的袭击。大佐和所有“皇军”全都被歼灭了。

一个月之后，10架日本飞机对3个村子进行了连续2天的狂轰滥炸，使其化为灰烬。然后，日本兵来了，跟着来的，是成群结队的日本移民。

这些移民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据日本参谋部的说法，他们是从品德端正、身体健康日本人中挑选出来的，而且都受过2年的单独训练，应该算是人见人爱的模范青年了。而事实上，就连他们在日本本土与他们为邻的人们，都无时无刻不盼望着他们远走他乡，不再露面，而且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对如何栽种大豆、高粱以及其它农作物全然不知，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中国农民正在收割呢。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下，中国农民收获的那些大豆高粱就很自然地搬到了这些日本移民的家中。

这些日本移民对拿去中国农民的劳动果实并不感到满足，他们还要架走那些年轻妇女。

有些日本移民好象生怕中国农民的农作物上有刺，绝不轻易自己动手，而是强迫中国农民的全家来替他收拾打劫来的东西。而他们所给予的唯一报酬，就是刚刚可以维持身体工作的一点点粮食。从此，中国农民就连人带物全都顺理成章地归属于日本地主了。

1935年10月26日，日本宪兵队的井上少佐和我，带着

20个士兵，到大东沟一个村子去调查7个日本移民被杀一事。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少佐依照惯例，说要轰炸这个村子。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在葡萄棚附近遇见8名日本宪兵和几个日本“农民”。他们押着50来个中国人，其中有些是小孩和妇女。少佐拦住日本人加以讯问。其中一个象是头领的日本人理直气壮地说：这些中国人都是这两天从他的田庄里逃出去的佃户，宪兵帮忙捕获了他们，现在正把他们押送回田庄去。这些逃亡的中国人的模样看上去极为凄惨，很明显曾遭到过毒打，他们的脸上和手上都沾着干了的血迹和尘土。井上少佐对此毫不惊异，也绝无同情，在他的眼里，中国人算什么呢，不就是该被神明之胄剥削的牲畜么。

但是，即使是拘捕、用刑、摧残、没收、绑票、清剿和大屠杀，日本人无论文官武将、穷人富人，对于征服满洲大都是彻底失望、有一种幻灭感的。满洲曾经是他们的梦中乐园，如今却变成了无穷的重负。他们驱逐或杀害广大中国农村中的中国人，却忘记了那些土地是因为有了中国人的汗水才得以繁荣，而并不是中国人依靠那些土地而繁荣。中国人为自己而劳作和在死刑的威胁下干活，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往年源源不断地闯关东、流入东北的农民如今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在日本人的各种迫害下，他们开始反过来向回迁移。所有工人、商人也处于同样的境地。总而言之，大家都有一种共识：“我们为什么做工呢？难道就是专门为了供日本人掠夺吗？”

而日本的军事费用更是所有负担中最为沉重的一块。日本人对这一点已经感到极度的痛苦。他们原以为，占领满洲1年之后，只要2个师团陆军加上宪兵就足够维持满洲的治安

了。他们满以为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肃清游击队和所有土匪。他们还以为苏联红军向他们示威几天后就会退出边境线。现在一切都出乎意料，没有一件事是顺遂他们心愿的。6年之后的今天，无论日本人驻扎了多少师团的军队和数十万的宪兵警察，东北的游击队和义勇军却照样比以前有增无减。他们顽强地摧毁着日本人的每一件东西，以至日本人视如珍宝的南满铁路。

苏联政府派遣了30万现代化精锐部队常驻在东北边境，日本不得不准备至少25万军队对付他们。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得日本喘不过气来，因此南次郎大将在海拉尔的一次演说中对军官们说：

“你们必须随时随地准备着，这种现状是不能让它延续下去的。日本无法仅仅只为了维持大量军队准备对付苏联而继续承受每年花费的巨额军费。我们必须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促使他们撤离红军，否则，我们就得用暴力将他们送回老家去。”

2. 制造谎言——日本侵略者的天才

我的新长官似乎是一个很安静、温和的人。他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甚至在骂人的时候他也是用一种牧师布道似的轻柔声调。但是，一说到钱，他就变得气势汹汹，毫无商量的余地。

“日本是贫穷的，很贫穷，”他常这么对我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减轻我们的庞大的军费负担。我们为占领满洲花了很多钱，我们的全部军费，必须由满洲人来负担！”

弄钱，多多弄钱，越多越好！更多地垄断，更多地绑票，更多地搜刮，不论用什么办法！钱钱钱，日本军队需要钱，宪兵需

要钱，警察需要钱！现在每个人都忙忙碌碌去弄钱！

多如牛毛的绑票案使东北地区的各大城市都处于恐怖的阴影之中。日本人散布谣言，把绑票的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土匪身上。但是，谁都知道，日本当局才是真正的绑匪。人们过去还只是在私下里悄悄议论一下，而现在却变得直言不讳起来。尤其在外国人中，他们毫不客气地把这一切暴行的罪责归到了日本人头上。那些日本宪兵和警察所雇用的绑匪的名字、那些藏匿被绑者的地方，也都被公开出来。哈尔滨领事团屡次举行会议，讨论由日本人在幕后操纵的各种绑票与垄断，有几位领事还拿出了能够证明日本当局就是一切阴谋的后台的文件。

一位中国太太正要到警察厅去报案、请求警察营救她的被绑的丈夫的时候，在路上一个巡官拦住了她，那巡官正是代表绑匪来找她交涉赎金的人。

1933年1月8日，在齐齐哈尔，几个强盗冲进一位中国富人的家里，把主人、主妇以及仆役都绑在了一个房间里。正在他们要开启皮箱的时候，守夜人从花园里放了几枪，打死了2名强盗，其余的也就逃跑了。那2名死者被认了出来，一个是日本宪兵雇用的俄国人，另一个则是日本人的“翻译官”。

我将外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有关日本人是各种罪恶的主谋的传闻向新长官做了汇报。他却沉静地告诉我，他对于公众的喧哗毫无兴趣。如果那些外国人在“满洲国”过得不快活或是不耐烦的话，那他们尽管走呀。

但是，随着日积月累，舆论的沸腾终于引起了新长官的注意。与此同时，东京方面也发来了训令，命令我们必须设法阻止这些汹涌奔腾的传闻。

新长官召集所有特务长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制订了各种对策。

第二天，刑事科长在所有报纸上发表了如下的公告：

“扰害哈尔滨一带的绑匪已经查出，即著名惯匪伐里斯基与曼得里克。警察厅现正努力破案，将他们捕获而绳之以法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又过了好几天，各大报纸又发表了刑事科提供的奇异新闻，描述那两个“惯匪”绑架多人、积案累累，说得有凭有据，而结束语又都一致是“据闻两匪不久即将陷身囹圄矣。”

公众是否真地相信了这些蠢透了的日本天才的创作？一点儿也没有。人人都能够看穿这层烟幕。因为他们都知道，伐里斯基绝不是什么“惯匪”，他因盗窃罪被判处3年徒刑，刚刚才从牢中被放了出来。一个在牢里住了整整3年、刚刚走出牢门的人，又怎么能够犯下这么多的绑票案呢？至于曼得里克，那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小偷而已。“他们打算跟我们开什么玩笑？”人们互相询问着。答案终于来了。

有一天午后，哈尔滨各报一致发出“号外”：那两个穷凶极恶、屡缉未获的罪犯——伐里斯基和曼得里克——在哈尔滨近郊的一所小房子里被警察团团围住，两匪顽固抵抗，发生激战，警方开枪150余响，卒将两匪击毙，云云。

紧接着，报纸上以每天连续刊载“激战”详情以及探警们的英雄故事，甚至在匪巢内还搜出大批军火呢……从此惯匪既除，余党星散，匪氛已靖，商民同庆，警察维护治安，忠勇奋发，诚当感谢。

我的新长官与东京之间、东京与长春之间，往来着一些贺电训词，各个警务头领之间也往来着一些贺电谦词，大开宴

席，庆祝警察的殊勋奇功，人人都升官拿奖，喜剧一出接着一出。

我不得不承认，日本侵略者的确是编造谎言的天才。

其实，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当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之前，伐里斯基和曼得里克就被刑事科督察长叫去，劝告他们离开哈尔滨市，住到近郊的那所小房子里去，用以考察他们是否“确已痛改前非”。他俩遵命住到了小房子里，却被忽然从窗孔外射进来的机关枪子弹打死。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武器，更想不到日本人会出此奇策。开枪的时候，他们正在吃着面包和香肠。伐里斯基胸部中了 31 弹，曼得里克背部中了 19 弹。

这一切都是我的亲见亲闻。

哈尔滨甚至整个东北地区都明白日本当局谋杀这两个可怜人的真实动机，人们仍然在议论着日本人操纵绑票的事实。我的新长官严令新闻检查处删去一切有关绑票的消息，并且命令警察逮捕敢于议论绑票事件的任何人。但是，绑票事件却更加频繁，许多被绑者往往交了赎金也永不能与亲人再见，因此，绑票事件越来越成为人们私下谈论的重要话题。

1933 年 4 月 8 日，徐邦基老将军，一位曾被我的前任长官绑过几次的百万富翁，现在又被我的新长官捉了进来。这回他的赎金是 50 万元。我被迫充当了这次交易的中间人。6 小时后，交易成功。

6 月初，犹太富人夏波夫斯基被绑达 3 个星期之久。无论怎样给他施用酷刑，他都拒绝给他的亲友写信缴付日本宪兵所要求的赎金。结果，日本宪兵由于难以从他身上捞到好处，就把他交给 2 名俄国籍的特务员，将他押到庙台子去杀死埋

掉了。

但是，日本宪兵并不放过夏波夫斯基那可怜的夫人。他们强迫她签了一张支票，由他们到银行去提取夏波夫斯基的全部存款。银行拒绝付款，理由是他们无法证明存款的主人已死，因为失踪的人有可能重新出现。宪兵们哪里肯善罢甘休。银行不是要夏波夫斯基已死的证据吗？那么好吧，这很容易办到。他们重新掘墓翻尸，把死者的头砍下来，放在江边预先布置好的地点，自然，第二天一早就被宪兵队特务员“偶然”发现了。证据确凿，银行只好付款，宪兵队分得一半。

1933年6月中旬，我的新长官要我命令影率领人马到蒙古去逮捕7个蒙古王公。7月9日，有15个蒙古酋长被影带了回来并被拘留了3个星期。在谈判赎款中做翻译的那个中国人告诉我，日军司令部因此得到了300万元。影得到了5万元特别奖金。

1936年6月16日，我得到了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消息。影带着他的全部人马拦住了一列火车，杀死了21个日本兵和2名军官，劫走了哈尔滨满洲国银行送到齐齐哈尔分行的30万元钱。影从此正式宣告彻底脱离日本人并与之战斗到底。

3. 日本的掠夺奇招

日军占领东北之初，所有“顾问”和“翻译”都是随便委任的，但到了发觉这帮恶棍一个个都暴富起来的时候，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日本军事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顾问”和“翻译”的委任则由一种投标的办法来决定，谁出钱最多就让谁来干。

尼古拉·尼古拉维奇·野吉是一个皈依了俄国正教的日本人，也是第一批被委任的中央警察厅“高等顾问”，为了维持已有的地位，他曾向日本司令部呈交过5万元。2年之内，吉野一跃成为拥有巨额财产的业主，银行存款超过30余万元。

最发财的职位是刑事警察厅的“高等顾问”，这职位由一个叫作卫下内的日本人占据了3年，他每年向日军司令部呈交10万元。

较小一些的警察机关的“翻译”之类角色，每年则要呈交三五千以维持他的地位。

日本人，具有无恶不作的天才。他们设立了一个侦探网，专门秘密侦察人家的喜庆聚会，比如做寿、订婚、结婚、宴会、茶会等等。聚会正在举行的时候，警察就到了：“这不是10人以上的集会吗？”“未经许可，非法集会，都抓起来。”人们在打纸牌或是麻将时也会被抓，因为扰乱了社会治安……一切都必须缴付巨额罚金后才得以释放。

日本人又想出了新花样，这就是在整个“满洲国”境内实行“改换门牌”。几乎每一个月，日本警务当局都要在各大报纸上登一则布告，说是因为这样或是那样的原因，各家各户必须改换门牌云云。警察挨家挨户取下旧门牌、换上新门牌，代价是一元大洋。门牌的样式是相同的，不过是一片价值几分钱的薄铁，但偏要你换来换去。

临近春天的时候，勤苦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到松花江里挖冰来卖。因为哈尔滨居民各家都有一个冰窖，要把冰贮藏起来以备夏季之用。年年如此，即使日本人来了也不例外。

但是，1933年2月，正当人们挖冰的时候，一个叫作高桥的日本人呈请日本特务机关，表示他愿意出价1万元包办“松

花江冰块专卖”。特务机关欣然批准，并且派兵把守江岸，凡是下河挖冰的人，每公斤必须交给高桥的垄断公司大洋 5 角。然而，还有比这更气人的呢。

矶田先生是一个精明的日本人，富有韬略。他原有一个玩具和漆器商店，但并不满足，所以决定把它出卖给另一个日本人。成交那天，他呈请日本特务机关，表示愿意缴纳 1 万元承办“哈尔滨烟囱扫除专营公司”。这就是说，凡是自行扫除烟囱者，无不侵害专营公司的“权利”。特务机关当即批准了他的要求，并且派 10 名宪兵由矶田指挥，以便维护公司利益。从那一天起，哈尔滨每家门前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一个日本宪兵、一个翻译和一个中国工人来到一家门前敲门或是按门铃。

“我们要见房主。”

“先生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扫烟囱。”

“扫烟囱？怎么？我们家的烟囱是干净的。如果要扫，我们自己会扫的。”

“你错了，先生。现在哈尔滨要扫烟囱就得由‘烟囱扫除专营公司’来扫，我们是公司派来的。你就让我们去扫吧，要不然我们也要硬扫。要是硬扫的话，你不但要出扫除费，还要处罚你的抵抗官府罪呢。瞧，宪兵就在这里，还会有错吗？”

“扫除费要多少？”

“2 块。”

“好，交给你 2 块钱，去吧，不要扫。”

3 个人拿着钱走了，接着又到第二家门前重复表演。

哈尔滨还有一个最著名的骗子叫山崎，他是个肆无忌惮

的流氓地痞。

有一天，山崎到特务机关本部去请求成立一种代客收债的公司，收卖各种支票、期票、借据以及债票。他要求特务机关与他合作，并表示愿意呈交利息的 25%。批准之后，山崎就在中国大街和蒙古街转角上开设了他的公司。

但是，山崎才不会耐烦去替别人收账。他按照票面价值的 2% 或 5% 收卖各种票据，真的或是假的，到期的或是不到期的，合法或是不合法的，一概不问。而一旦成为这些票据的合法所有人，他就开始毫不客气地进行收款，另外还要加上 3 分月息（即年利 36%）。由此，山崎以日本宪兵为后盾，强占了不少房屋、商店、地皮以及各种各样的财产。

在此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表明他的运作方式：

哈尔滨著名的高利贷者波金以 700 元的代价将票面价值 2500 元的一些票据卖给山崎，其中有些是假的，有的已经付过，有的早就过期好几年了。那里面有一张是寡妇汉尼尔克太太 3 年前向波金借款 200 元的借据。汉尼尔克太太早已连本带利把钱还清了，但是波金对她谎称借据丢了，不肯将它退给汉尼尔克太太，只是另外又给她写了一张字据，声明她已还清借款。

但是这张字据毫无用处。山崎逼着汉尼尔克太太偿还 200 元本钱，还硬要她付给每月 5 分利的 3 年利息，再加上手续费，总数是 845 元。这可怜的寡妇只有一所小房子，山崎提议将房子进行拍卖。

幸好汉尼尔克太太的女儿在我的办事处做事，她请求我帮助她的母亲。我趁着我的新长官高兴的时候，把这件事托付给了他，他一口答应下来。

两天之后，汉尼尔克太太接到山崎送还给她的旧借据，并附有一张还清欠款的收条。

这是以我的微薄之力主持公道的唯一一件事，还有千百件同样的事我却无能为力。

哈尔滨还有一个完全在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之下、由一个有声望的白俄将军为局长的侨民局。这位将军被迫担任局长职务，却没有任何权力。他所做的事不过是在日本人写好的书信上签字而已。侨民局共分6个部，职员全是白俄。人们都知道，日本人之所以雇用这班白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全是刑事犯、骗子以及最恶劣的冒险家。

侨民局不但有权管理全体白俄，也有权管理在“满洲国”的每一个欧洲人。所有银行、公司、合作社、工厂、商店、饭店等等，都必须到局里去登记。任何人如果没有登记，就不能雇用任何人，也不能被雇用。

侨民局里的一批巡查员经常去走访各种经营机构，随时让雇员们拿出登记证来看看，没有证件的人就勒令立即退职。无论是工人、书记员还是银行和商店的雇员，都必须向侨民局繳纳税费，于是，又有人批钱财滚滚流入日本特务机关的金库。

作为附属产业，侨民局还在全“满洲国”境内发行各种彩票和奖券。

侨民局的另一项重要事业是在中国人和俄国人中间进行对日本的宣传，同时组织一个完整的侦探网。因此，这个局在东北和中国的各大城市都设立了事务所。其实在当时的北平、天津、汉口和上海等地的侨民支局，都不过是日本侦探便于经常传递情报的巢穴而已。这个局的数千名职员，实际上全都是

日本宪兵的密探。

在我替日本情报局做事的4年半时间里，我经常接到这个局在中国内地所雇用的侦探发回来的情报。

在天津和上海，日本人所办的《孚士拉景尼》和《斯洛夫》这两家俄文报纸，其实就是由这个局的侦探所编辑的。

这个局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组织和训练能够使用武器的白俄青年，把他们分成几队，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到中俄边境去捣乱，从而挑起事端，袭击国境，然后日本就向苏联提出这样或是那样的抗议，把各种暴行的责任都归咎于苏联政府，以混淆全世界的视听。

为了训练这些白俄青年，这个局设立了一个军官学校和两个干部学校。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到苏联边境，全都遇见这班身穿日本制的苏联军服的白俄青年。他们常常劫掠满方边境的乡村，然后做出向苏联边境撤退的模样，使当地老百姓相信劫掠他们的的确是苏联红军。这种欺骗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在老百姓眼里，他们都穿着苏军制服，从苏联那边过来，又回到苏联那边去。结果，在苏联政府还来不及知道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已经向莫斯科提出强硬抗议了。于是，日本的同盟社开始喋喋不休地造谣，世界各国的报纸上也都不情愿地转载了这类“伪装”袭击。

日本人还时常制造空中发生的事件。他们把几架飞机漆成苏联飞机的样式，而后日本的驾驶员驾着这种飞机飞过满洲边境，撒下一些预先准备好的中俄文的共产党宣传品，间或还丢下几枚炸弹。自然，日本的调查员马上就赶到出事地点，于是搜集各种人证物证，以证明苏联飞机飞越了满洲边境，投

下炸弹和赤色传单。

东京又向莫斯科提出抗议，同盟社又忙着摇唇鼓舌，想让世人相信那些苏联人真是又蠢又毒。

侨民局下属的各种白俄团体曾经被派到东北铁路沿线以及热河、察哈尔、蒙古去帮助日本人推行日本化政策。日本人觉得中国人靠不住，常常会加入游击队，于是就雇用俄国人去做护路队。侨民局召集了大批俄国人，说是每月每人薪饷 60 元，外加制服、住所，而且供给西餐。俄国人被派到离开城市几百里以外后，才发现情况与日本人所允诺的完全不同。他们受着奴隶般虐待，住在牲口棚里，不但没有西餐，中餐也极其糟糕，别说是每月 60 元，就是连铜板也见不到一个。于是，他们也常常逃跑或造反。

在哈尔滨到龙门镇的铁道正在修建中的时候，一个白俄护路队造反了。1933 年 8 月 16 日，在东北车站上 21 个护路队员杀死了 2 个日本军官和 5 个日本士兵。他们带走了 5 架机关枪和步枪，并放火烧了车站。

侨民局在日军占领东北的最初两年时间里，把几百个白俄迁移离海拉尔 70 公里处、苏联边界附近的三河区内。侨民局曾答应供给这些移民资金、农具、牲畜以及住宅。但是，除了痛苦和失望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侨民局将那些移民委派给一个叫特巴斯的白俄下级军官进行管理，特巴斯自诩为将军，并以清除共产党为由杀害了十几个俄国移民。与此同时，日本人又逼迫这些可怜的男女移民做了日军守卫队的奴隶，供他们奸淫胡闹。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35 年 8 月，三河区的移民们终于忍无可忍，奋起暴动，将那里的所有日本官兵以及特巴

斯和他的爪牙杀得一干二净。

第十四章

1. 逃离东北

1936年春，加斯普事件宣判之后，我预感到，有一股狂风恶浪正向我袭来。对此我却毫无办法。要逃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我有一家5口。更何况，我的财政情况极为困难。日本人最初说好每月付给我1400元薪水，可他们并没有履行诺言。只有第一个月付的是全薪，而后就变成了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十分之几，6个月后，就一个铜板都不给了。我一提薪水的事，他们就总是重复这一句话：“等到局势一定，我们就会按期发清。”但是局势永远不定，我也就永远看不到他们给我的钱将是什么颜色的了。到现在，日本人还欠着我5万2千元。

我早已对日本人会给我一部分我应得的报酬这个念头失去信心了。“满洲国”的所有职员不是也都处于这种境地吗？谁也得不到薪金，就连警察、军人也一无所得。宪兵军官和少数陆军军官之所以发财，完全是由于经营私贩、赌博、淫业和毒品甚至是打劫、绑票之类罪恶的勾当。

我努力挣扎到1936年3月底，才得到法院批准，将我的一部份房产卖掉，得到12800元。当我去取这笔钱时，法院让我再等一个月，而且必须发表公告，看看是否有人提出诉讼。

公告发表了，一个月过去了。法院又提出要我交2500元

的所得税，而且还不能取款。又要发表一种公报，还要再等上一个月，据说是恐怕哈尔滨以外的债权人没有看见第一次公告。卖几千元的房产就要受这么多的阻碍和刁难，更可以想象其他人为其它事而吃尽的各种苦头了。

我多次告诉我的长官，我必须有钱才能生活。如果他们不给我钱，那他们应该让我有从其它方面得到钱的机会。但是，长官总是说：

“给我们一点时间，等到事情更妥当一些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你应得的一切了。”

有一次，我向他力争拿到薪水，他说：

“当欧洲人统治东方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给了东方人多少钱吗？最高的薪水也不过是 50 或 100 元罢了。现在我们是统治者，凭什么我们就要给你们更多的钱呢？”

我日日夜夜做着自己心中厌恶的工作，还要靠自己以往的积蓄生活，一想起这些来我就气得几乎发疯。

但是，我倒是也有足以自慰的事。尽管日本人把我牢牢地捏在他们的手心里，尽管他们以我的家人为人质，尽管他们不断地羞辱我、掠夺我，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我一直在暗中采用各种方法让他们为此付出各种代价。

凡是经过我手的所有情报，我都秘密传送给了日本人的敌人——中国的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他们常常能预先知道日本人派去攻伐他们的军事列车所开行的时间以及日军向他们进攻的方向。

当日本人准备搜查或是逮捕（其实是没收或是绑票）的时候，我就赶快使被害者有逃亡的机会。

有无数中国人都象我一样，过去曾做过中国的官吏，如今

却迫不得已继续工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市地下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杀戮日本的文武官员和背叛祖国的汉奸。许多日本人都是这样被除掉的，许多汉奸也因为出卖人格而受到惩罚。

傀儡皇帝溥仪就受到过 3 次死亡的威胁。他的宫廷曾被他的侍臣放火烧去一半。长春的日军飞机场被焚毁了，齐齐哈尔的日军机场被烧过 2 次，哈尔滨的机场也被烧过 1 次，绥芬河车站被烧过 2 次，日军的军用列车更是被颠覆过十几次。在这些奇袭中，日本的特务机关根本无法找到那些抵抗者的踪迹。

就在最凶狠残暴的日本特务机关官员的眼皮底下，就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地下组织在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1936 年 8 月初，我看到形势越来越恶劣，我已彻底陷入危险之中。我必须准备逃跑了。又努力向法庭收取我的钱款。这次我请了一个日本律师，讲好给他 1000 元报酬。

我的妻子的身体被动荡不定而又困苦的生活摧垮了。医生的诊断书上明确写着：她必须迁地疗养。但是我的长官不肯放她走：“哈尔滨的天气是很不错的，”他坚持说，“你的妻子不必到别处去疗养。”

8 月 10 日，我的长官叫我去见他。他问我在 1934 年中，我是否认识一个叫作李善恒的中国人。我告诉他，在日军未到沈阳之前我知道这个人，那时他在沈阳军官学校作历史教员，但自从日军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面了。

长官牢牢地盯住我，然后说：

“你知道你在沈阳认识的李善恒就是那个在宪兵追捕他的时候闯入三原公司、从 5 层楼上跳下去的李善恒吗？”

“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无论是在自杀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哈尔滨的李善恒。”

长官死死盯住我，又说：

“我要看看你怎么写你的中文名字。现在就写给我吧。”

我把我的名字写成三个中国字给他。长官看了看那纸片上的字迹，然后把那张纸塞进他的衣服口袋里，并不作任何评论。而后他问：

“在 1934 年中，你是不是和被迫降落在满洲境内的两个苏联飞行员说过话？”

“你是说那两个逃亡的飞行员吗？”我问，“谁也不能和他们说话，那是绝对禁止的。”

“不要开玩笑！”长官锐声警告我，“你很清楚他们并不是什么逃亡者。我们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要侮辱那些苏联狗。我听长春方面有人说，你和那两个飞行员谈了长达半个小时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他，“我从没有想到过要跟苏联飞行员去说话。不管这话是谁告诉你的，他都是一个说谎的人。我很清楚我一直处于嫌疑之列，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干什么还要留我做事？我那么长时间拿不到我的薪饷，现在得到的却是侮辱和诽谤。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不知是什么时候得罪了中野和拉佐伊夫斯基那两个败类。”

长官默默地听完我这些毫无疑问的事实之后，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说道：

“这就对了，并没什么大不了的，维斯帕先生。我知道那两个人在想方设法打倒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知道，我可以相信别人的话，我同样也可以相信你的话。”

几天之后，长官和我讨论一个被宪兵绑票勒索 3 万元的 19 岁青年阿伯里罕维奇的事。他问我阿伯里罕维奇的父亲能否出得起 3 万元钱。

“我估计他出不起。”我回答，“即使他有这么多钱，他又凭什么会交出来呢？因为我听说那孩子已经被宪兵的特务员杀掉了。”

“有人这么说吗？”

“当然，人人都这样说。”

“他们都说些什么？”

“他们说所谓绑匪都是日本宪兵和日本其他警察机关雇用的人，他们说赎金都是交给日本军事当局的。要阻止这些议论是不可能的，总不能把大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抓起来吧？”

那天晚上，我去访问我请的那位日本律师，请他设法收回我的钱。他说困难很多，最好是疏通办理这个案子的日本法官，或许给他一点好处，我就能拿到我的钱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去忍受这另一个竹杠。日本律师带我到那个法官在炮队街的家里。当我被引到这位傲慢至极的日本法官大人面前的时候，他把我从头到脚好一阵打量，就象我是什么珍奇的虫类似的。我们开始讨价还价，在我的声音因气愤而高了起来的时候，那个索要贿赂的日本法官就大声提醒我：你是在和一位代表法律的日本人谈话。谈话结果可想而知，我必须先付给这位日本法官 3000 元，才能拿回我自己的钱。我不得不认可了这无耻的掠夺，并将 3 张 1000 元的期票卖给山崎。当我将 3000 元钱交到日本法官手里的时候，这位法律的化身毫无羞耻地将钱收下，而后答应在一星期之内发还我的房钱。

将近 8 月底，那个日本律师通知可以到法院去领我的钱了。法院给了我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我的房产卖价是 12800 元，扣除所得税 2500 元，法定手续费 750 元，实付 9550 元。我把这张单子交给法庭的会计，希望他能给我一张支票。那个日本会计告诉我说，这单子上有些不合规范的地方，要我等等。我等呀等，等了又等，终于等到了让我明天再来的回答。

我在回家的路上简直要气疯了，脚下似有千斤沉重。我的勇气全丧失殆尽，我失掉了再和这些伪善的畜牲们斗争的力量。

我的妻子在病中，我根本不敢和她谈我的心事。我的 14 岁的女儿詹妮弗看出我的脸色灰暗，尽力安慰着我：“爸爸，高兴起来，你看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你肯定能赢。我们将来肯定会离开满洲，离开这些野猴子。眼前的困难没什么要紧的，你是那么刚强能干，很快你就会争得日本人让你所受的损失。”

当天晚上，山崎请我去谈话，说是有要紧事商量。在绝望的境地中，我不得不努力克制住自己对这个人的厌恶之情，前去赴约。

山崎用数不清的鞠躬和客套话迎接了我，充分体现出以欺骗和伪善为生活基调的日本性格。他郑重其事地询问我的健康，献茶敬烟后，他告诉我，法院的日本会计可以通融我的那张单子上的“不合规范”之处，如果我愿意付 500 元给他，他就给我一张支票。老实说，我对此倒是喜出望外了。我原以为他也要敲我 3000 元的呢，这法院会计显然还不敢代表日本“法律”，倒是颇为克己的！于是我答应从我身上再割一磅肉给他，当下签了一张 500 元的期票给山崎。

第二天，我去见那个日本会计，他微笑着迎接了我，说是那单子上的不合之处并不要紧，已经更正了，然后很客气地将一张支票交给我。在法院的客厅里我遇见了山崎，他正在那里等我，随身还带着另一个日本人以及他的保镖拉普肖夫——一个俄国彪形大汉。我们一同到银行去兑取我的支票。事到如今，如果那日本银行的会计又在那张支票上发现了什么不合之处，而且又要我给他 1000 元，我也毫不惊奇。感谢上帝，这支票并无不合之处，我取了钱，付给山崎 3500 元，取还了我签给法官和会计的期票。

当天傍晚，《我们的路》和《哈尔滨时报》派代表到我的家里，要我各捐 500 元给他们。我告诉他们各自滚蛋。后来，《我们的路》的一个职员打电话来警告我，限我 3 天之内交出他们所要的 500 元来，如果不交，他们就在报上宣布我是第三国际的、国民党间谍，而且和贼匪有密切关系。《哈尔滨时报》也同样警告了我。我回答他们爱怎么宣布就怎么宣布去吧。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的长官。他只是冷冷地说，他并不关心那些闲话。

我意识到，戏就要收场了。

我必须行动，而且迅速行动。按照以前的布置，我去见和 C 上校的联络的一个人，请他将一封十分紧要的信转交给 C。

当天夜里，孚托普洛通知我，中野要我给他 1000 元。我说，我的钱已经用完了。两天之后他又打电话来说，中野对我拒绝给他 1000 元钱极为愤怒，现在，他要 2500 元，否则，他要让我知道，我的生命只是一文不值的一撮灰尘。

9月3日，在日军司令部作事的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我，日本特务机关长、宪兵司令和我的长官今晚要讨论别人控告我

的案件。这位朋友答应我，他会将讨论结果尽快通知我。

第二天一早 7 点钟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日本宪兵司令得到各种证据以及俄籍特务员的报告，证明我与游击队有间接关系；孚托普洛曾经说过，他屡次看见我半夜里从极乐寺里出来；令特务机关长最疑心的是，在李善恒的衣袋里的笔记本上竟写有我的中文名字。我的长官曾竭力替我辩护，但是毫无成效。他们最后决定，3 天以后，把我送到齐齐哈尔……就说是失踪……毫无痕迹。

“你必须立即逃走，别再迟疑！”我的朋友劝告我。

“我的家人怎么办？”

“你活着离开满洲比死在这儿更有用！你不走对你的家人并无益处，但是离开了日本人，你就有营救他们的机会。走吧，我求你了，趁你还有军事护照的时候赶快走。现在还没有下令通缉你，就直接到飞机场去坐飞机吧。”

这是明智的忠告，我决定遵从。我去见了 C 上校，向他说明我的情形和决心。他很赞成我的决定，并向我保证设法明天一早用车将我的家属安全送到大连。然后，我去向我的中国老朋友告别，他们的临别赠言我至今仍然珍视着。最后，我回家告别。我不敢携带任何行李。我的妻子让我的秘书陪我到飞机场去，这样她就能够得到我是否安全离开的确实消息了。

半个小时以后，我向长春、大连飞去，在大连上船，第二天到了青岛。

1936 年 9 月 8 日早晨，我在青岛码头上迎接刚到的日本客船青岛丸，盼望着能在甲板上见到我的家人。船一靠岸，我就跑到甲板上到处寻找，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们。我真担心出了意外。我走进头等舱里，看见一个房间的门敞开着，我的妻子

就坐在里面的床上哭泣，我的女儿伤心地低着头，我的儿子正在设法抚慰他的母亲。这时，我忽然发现两个日本警察就守在船舱门口，不由吃了一惊，知道事情已经糟了。我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只好马上装出一付没事的样子，但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我的儿子抬头看见了我。他立刻转而用意大利语对着他的母亲说：“快快走开，我们全被捉住了，他们也要捉你！”

一分钟之内，我转回码头，即刻报告中国当局，请他们向日本领事交涉，准许我的家人登岸。他们的努力并未见到成效。

我的妻儿被提到日本领事馆，审问过后又被送回船上。那艘船当天晚上向上海开去，3天以后又开了回来。青岛的中国当局再次提出抗议，仍然无效。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又被带回满洲去了。当天晚上，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两个特务员来到我住的旅馆，说是来请我去和日本领事谈话，想把我绑走。我立即通知中国警察当局，请求保护。中国警察局长立即派了4个警察来归我指挥，他们一直看着我坐上飞往上海的中国飞机。

2. 上海——不安宁的避难所

1936年9月12日，我到达上海，立刻就开始了营救我的家人的工作。最初，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长官，说明我出走的理由，让他相信我并没有要做什么反日宣传的意图，我的唯一愿望只是要和我的家人同在一起。然后我又写了一封大致相同的信给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安藤将军。我把这两封信抄好，送呈给日本驻华大使。我没有接到任何回答。

19日，我接到一位意大利商人卢拉奇发自大连的一个电报，说我的妻儿现被拘于大连警署，如果10天之内我不来投案，他们就将被押赴哈尔滨。

9月20日，日本同盟社发交上海各报一个大连电讯稿，说我的家属被拘是因为我拐款潜逃出哈尔滨，而那些钱是属于意大利人巴达维尼和狄尔米苏的，这两个人是我所开的一个电影院的股东。同日，同盟社发送给哈尔滨各报的新闻稿却说我的妻儿被拘是因为我拖欠希腊人孚托普洛25000元，分文未还就离开哈尔滨云云。

几天后，巴达维尼先生在回答我的上海律师普利美先生的信中说：“我并未控告维斯帕先生，因为我绝无控告他的理由。至于另一位同事，狄尔米苏，更不可能控告维斯帕先生，因为他早在5个月以前就死去了。”

9月28日，我又写信给哈尔滨的安藤将军，警告他说，如果同盟社再造我的谣言，为自卫起见，我就要发表日本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声明了。从此以后，虽然英文的和俄文的报纸上屡次抗议日本军事当局不应该扣留我的妻儿作人质，同盟社却再也不吭一声了。

10月中旬，我的哈尔滨的朋友们通知我，著名的杀手中村和曾经谋杀过沙波维斯基的两个俄国杀手已经秘密潜入上海来了。几天以后，我就看见那2个俄国流氓鬼鬼祟祟地在法租界莫利埃路我的住宅附近转悠。我的几个朋友叫住他们，警告说如果再看见他们在这附近露面，就让他们吃沙波维斯基曾吃过的苦头。

中村住在黄浦路25号日本总领事馆里面。我已经知道了他的踪迹，有一天，在他走出外滩日本银行的时候，我就吓了

他一下。

我站在中村面前拦住他的去路，他的黄脸立刻变成了土色。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来上海是为了别的事情，并没有要扰害我的企图。我把我的朋友们给那两个俄国坏蛋的警告也告诉了他。

两天之后，一个日本人请求见我，他说他是奉了上司的命令来和我谈判妥办法的。他说，只要我开出在“满洲国”内抗日组织中的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名单，我的家属可以马上得到释放。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但我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而且，据我所知，这种组织只不过是日本当局想象出来的罢了。我进一步警告他说，如果不赶快释放我的家属，我就要宣布我所知道的日本人在满洲的种种暴行。

“那一点儿也不会妨碍我们，”他说，“我们会否认你所说的一切，而且也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

我们的会谈不欢而散。

11月初，有一位领事先生劝我给身为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二课长的本野子爵写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与此同时，我的律师普利美先生屡次访问日本驻沪总领事，但是并无成效，他们总是说自己与满洲国简直是毫无关系。本野子爵给我回了一封信，他对我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但是又声明他在东京毫无切实可行的办法。

我每时每刻无不担心着我的妻子儿女的境遇。我知道那些拘捕者对子我妻子的健康必然是大为损害了。现在，我为营救她所采取的一切合法与和平的办法全都失败了，我必须改换一种方式。

我写信给哈尔滨的一位朋友，请他找一个可靠的信使立

刻到上海来。这位可靠的信使于 11 月 10 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就带着我给游击队 C 上校的信赶回哈尔滨去了。在那封信中，我请求 C 上校设法营救我的家人，或者至少让我的妻子能离开监狱，否则，她会死在里面的。

这位信使一到哈尔滨就立刻找到了 C 的密探，后者告诉他说，C 的行踪不定，是很难找到的。他让我的信使到穆陵去找和 C 联络更为频繁的另一个密探。信使去了，几天之后，终于找到了 C 上校，把我的信交到了他的手里。

两天之后，也就是 11 月 23 日，C 上校率领一支精兵袭击了距穆陵 60 公里处的一个小城市海林，抓获了 31 名日本人，其中有 9 个是妇女。25 日，他通知哈尔滨的日本军事当局，只要许可维斯帕的家属安全离开满洲，他就释放他们。对此，日本特务机关长回答说，必须请示东京。

12 月 3 日，C 上校要求日本特务机关在等待东京训令期间，先准许维斯帕夫人出来和她的母亲及两个孩子同住，如果他们拒绝这个要求，那他将枪毙扣留着的半数人质。

第二天，我的妻子离开监狱，住进西伯利亚饭店。

谈判迟延不决，日本人提出各种方案，但就是不愿放我的家人离开满洲。他们愿意用所俘虏的两个游击队员换回一个日本人。但是 C 上校不肯迁就，最后终于得到胜利。后来的难题是如何释放那些日本人以及我的家人怎样离开满洲。日方主张先释放日本人，C 上校却坚持相反的意见。后来双方同意，当我的家人到大连的时候释放一半日本人，当我的家属到达上海时，再释放另一半。

我的亲人们在遭受了 6 个月的磨难后，终于在 1937 年 2 月 25 日来到上海。

他们抵达上海一个月之后，有一个叫作后藤的日本人来访问我。他自称是代表日本当局的，说他们听说我要写一本关于满洲的书，让我不必如此，因为东京已经查明我的案件，觉得满洲国的日本当局对待我和我的家属确实很不公道，所以准备赔偿我的产业的损失，退还已经没收了的我的财物，并且补发给我积欠 4 年的薪金，现在，就只等东京方面调查手续完毕了。

1937 年 6 月初，上海快讯社社长弗里特通知我说，有一位从满洲来的钦勒先生想见我。钦勒的父亲是丹麦血统的美国人，而母亲则是夏威夷人，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他自己现任南满铁路宣传部职员。我知道他住在上海最大的一家饭店百老汇大厦，有许多日本官员和某些俄国人常去拜访他。

我在百老汇大厦的接待室里打电话给他。他要我到他的房间去，我要他下来。

当我们一起坐在饭店会客室里时，他很殷勤地说了许多对我所遭受的侮辱表示遗憾的话。而后他告诉我，许多日本官员，其中包括板濑和小新义，由于虐待我的家属，都已经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日本当局已经进行了调查，打算偿还我的损失。

然后他突然说：“我听说你正在写一本书，叙述你在满洲和日本人相处的 4 年半的情形。我不相信会有这事，你这么聪明，不会做出这种蠢事。虽然你入了中国籍，但你毕竟是生在意大利的，而意大利和日本是好朋友。如果你写书反对日本，那就是反对意大利呀。”

“钦勒先生，”我说，“日本人强迫我替他们做了 4 年半的工作，几乎是没给我一文钱，他们反倒没收了我的价值 5 万元

的财产，把我的家属扣留了 6 个月，让我的妻子坐了 3 个月的土牢。你见过扒心扒肝任人劫掠、侮辱、摧残还毫无反应的人吗？日本人对我的许诺从今以后已经毫无意义了，他们的恐吓也丝毫不能影响我。我必须履行我的义务，没什么东西能改变我的计划。在日本人的强迫下，我已经承担了太多的罪责，这令我的良心不安。至少我要赎罪，虽然那是在那些日本人强迫下所犯的罪过，至少我还能替那些仍在日本人最野蛮的压迫下的人们说几句话，把真实情形告诉世界，这就是我的答复。”

3. 我的妻子讲述的故事

下面是我的妻子在上海与我重逢后一次给一位朋友讲述的故事：

在我的丈夫坐飞机到大连的几个小时之内，我已经做好了第二天搭火车去与他会合的准备工作。得知他已经脱离险境，我欣喜若狂，对自己的处境反倒没什么可担心害怕的。在 24 小时内，他的出走是不会被发觉的。第二天一早，我和 14 岁的女儿詹妮弗、8 岁的儿子伊达洛同乘火车到大连去。在大连焦急地等了一天，我们坐上了开往上海去的青岛丸。

午后 2 点钟的时候，一个日本人来到我们的舱房里，自称是日本警官，名叫小新义。他要看我们的护照，看过之后，就给我看了一份从哈尔滨发来的电报。它是一道命令：逮捕我，并解送回满洲国，一直拘押到我丈夫回来自首为止。然后他开始检查我的行李，将那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拿走：1000 日元，665 个旧俄金卢布，345 个美元，2 只钻石戒指，2 块金表和其它金饰。我拒绝交给他我的结婚戒指，他毫不客气地猛击了两

下我的肩头，并用俄语骂我母猪。

我的孩子们对小新义的野蛮极其愤怒，哭喊着扑上去与他撕打。

他毫不掩饰地把他的赃物记录在一本手册上，走出舱房。

就在他正忙着搜查的时候，我的女儿趁他弯腰低头翻捡我的皮箱的机会，把她所有的390元钱藏在了她的胸衣里面。不久，开船以后，我把这些钱交托给一位同船的上海律师巴良斯普朗先生，没想到被一个日本侦探看见了，小新义就从律师手里把钱夺走了。

我们的船到达青岛时，我的丈夫来到船上。在日本警察还没有发现他之前，我的儿子伊达洛就机警地暗示他我们全都被捕了，要他赶快离开。

当天上午10点，我们被押到青岛日本总领事馆里，一个日本大佐告诉我说，如果我的丈夫不回满洲，我们就要被递解回哈尔滨去。

我对扣留我和孩子向他们提出抗议，说这是违法的，因为青岛是中国的地方。那个大佐说：“你并不是被捕，太太，你是我们的宾客。”

我斥责小新义动手打我的蛮横，大佐就转向他身边的小新义，用日语说：“你犯了严重错误，这妇人并不是俄国人，而且，据哈尔滨的来电称，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能够说好几种语言，还是一家报馆的通信员，这就麻烦了。你最好向她道歉。”

小新义马上对我深深地鞠躬，用英语说道：“很对不起，我动手打了太太，我请你原谅，我以为你是俄国人呢。”

我们又被押回到船上，放在三等舱里。夜里，船向上海开

去，旅客名单上却没有我们的名字。青岛丸停在上海的两天时间里，我们都是被锁在舱里面的。船又回到青岛，中国当局派人到船上来看我们，但是日本警察不许我们见面。

到了大连，我们被关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里，24小时内没有任何食物。经过多次请求，我才打电话给一个意大利商人卢拉奇先生。他给我们送来一些吃的，我请他打电报告诉我的丈夫：我们已经被扣，身无分文了。那时，日本宪兵告诉卢拉奇先生，我的丈夫是拖欠孚托普洛巨款，逃匿无踪了。

我的丈夫在上海接到这份电报，就汇来400元钱托卢拉奇先生转交给我。日本人强迫他把钱交给他们，我始终没有得到一分钱。

我被押在牢里8天以后，政治警察局长板瀨和特务员赛伐洛夫才从哈尔滨来把我们带回去，放在刑事科的一间肮脏的土牢里。两天之后，我的女儿詹妮弗和儿子伊达洛被提出去交给了留在哈尔滨市内的我的母亲。

过了一个星期，板瀨提审了我。

“你知道你的丈夫和中国国民党有关系吗？……你是一个犹太人吗？……他是共济会会员吗？……他和贼匪有联络吗？……关于加斯普案件他告诉过你什么？……”

我回答说，我的丈夫从来不和我谈论有关他工作上的事，他也从来不把文件或书信带回家去。

又过了9天，我又被提到板瀨的办公室里。这回除了板瀨外，还有一个我忘记了姓名的日军少佐。少佐用流利的英语问我：

“你的丈夫为什么那样乐意看见绑架加斯普的人们被判重刑？……是谁在背后主使他？是犹太人还是共济会？……”

我们得到报告，说你丈夫在过去的18个月之中从一家外国银行里收到过20万元钱，而且说这些钱是付给贼匪炸毁日本列车的经费。你的丈夫夜间常去极乐寺里会晤的那些前任中国官员究竟是谁？……他常常化装成妇人外出吗？……我们知道他是属于英国共济会的，他曾经参加过哈尔滨的共济会吗？”

我回答说，我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

“你的丈夫现在在上海写书反对我们日本和满洲国，”少佐继续说，“你写信告诉他，如果他还想再看到你的话，他就必须停止写那些他所知道的事情。”

“你们要想让他不写，最好是放我到上海去。我不愿把你们的恐吓写在信里。”

“你是一个固执的女人，”板濑说，“我们日本人知道怎样使固执的人开口……”

几分钟后，他们牵进来一个俄国女人。真是太可怕了，那女人的头上没有一丝头发，她的指甲也全都被拔掉了。这可怜的年轻妇人恐惧得发昏了。

“瞧，”板濑说，“她死不开口，我们就拔掉了她的头发，一撮一撮地……看她的指甲。”

我竭力振作起来，说：“你也尽可以让我受刑，但是你知道我的丈夫是自由的，你说你知道他要干什么，那么当心你自己吧。”

我被带回那间肮脏的土牢里。

在我被押在土牢里的恐怖日子里，我看见过许多中国人、俄国人从牢里提出去的时候还是完全无损的，可带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成人形了。我设法和几个可怜的人谈话，并记下她

们的名字。

一个叫韩玉英的 16 岁的中国姑娘,已经被关了有 6 个月了。她受过许多苦刑,脚被电熨斗烫过两次,眼睫毛全被火柴烧光了。当我出狱的时候,这孩子还被关在里面。

另一个中国女人叫曹玉梅,27 岁,因为逼供被枪弹打穿了脚板,她还是不肯说出日本人要她说的事,日本人就用枪对准她的前额,打碎了她的头颅。

一个苏联妇人,叫克拉狄亚马·科夫娜·萨卡尔兼科,睫毛都被火柴烧掉了,一连 40 天受着各种苦刑,双手的每根指头都被打烂了,头发全被连根拔掉。她曾被倒吊着几个小时后又正吊几个小时。最后,他们相信她是无罪的,才把她放出去。她到一个苏联医院里治疗,据说已经成了终身残废了。

我屡次被酷刑所威胁,要我给我的丈夫写信让他回满洲来。为什么他们终究没有对我实施苦刑呢,我至今也不明白原因何在。

我被监禁了 1 个月后,我的体重由于饥饿和没有被褥就睡在潮湿的地上而减轻了 25 磅,而且我时常昏厥。监狱医官亚辛斯基先生警告警察局长,如果再不改善待遇,我就会死在里面。他们这才准许我接受我家里送来的几条毯子和一个枕头和一星期两次的一点食物。

在我被监禁的第 88 个早晨,他们告诉我,我可以出去和我的家人一同住在西伯利亚饭店里,但是不能离开哈尔滨。

在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板濑告诉我:

“你写信给你的丈夫,叫他不要在上海的报纸上散布谣言。如果说他在满洲国的贼匪中有朋友的话,那么我们在上海和他能去的任何地方也都是有特务员的。”

我在西伯利亚饭店里住了3个月，板濑时常来看看我们。他现在变得非常客气，而且异常关心我的健康，常常劝我写信给我的丈夫说我很平安，日本人待我很好，并叫他千万不要写什么反满反日的东西。

1937年2月18日，我被传到警察总监的办公室里。我的身体极其衰弱，以至不能单独行动，只能由女儿詹妮弗陪着我去。据说总监的名字叫荒井，只会讲日本语，所以牧野男爵的小姐来替我们翻译。

让坐下后，总监说：

“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你和你的孩子随时可以离开满洲。你到上海的时候，告诉你的丈夫，他被迫替日本人作事并不能解释他联络贼匪背叛我们的行为。”

我要求赔还我被日本警官在青岛丸上劫去的财物，但是他说，他们哈尔滨方面并不知道此事。

2月21日，我们终于离开哈尔滨到大连去。对此我们的朋友们全都感到非常高兴，但却不敢到车站来与我们告别，以防自己被牵到无尽的麻烦中去。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花束送到列车里我们的座位上，日本宪兵将花全部摔掉，马狄尔饭店的一个年轻侍役还因此吃了两个耳光。

2月23日，我们从大连坐大连丸到达上海。我又遇见了6个月前打劫我的那日本警官小新义，我让他归还我的财物，他却充满嘲讽地笑起来：

“你的丈夫干了那种事之后你还能活着离开满洲，你就该感谢上帝了。别忘记告诉他不要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日本总有办法抓住他的。”

结束语

“上帝保佑你。他要帮助你平安地逃出满洲。他不许灾难降临你的家人。”

这是我的一个最要好的中国朋友对我说的话。他是一个老派绅士，象橡树一样坚定，有着一颗高尚的灵魂。

在1个小时前，我得到秘密通知，日本军事当局已经决定逮捕我，所以我来和这位老朋友告别。当我站在他的面前时，他的双手抚着我的肩头，他的眼睛注视着我的眼睛，他说：

“我的朋友，现在我是一个老人，不能再替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什么事了。但是你还年轻，你要明白，在这5年来，你是唯一一个亲眼目睹日本人蹂躏东北人民的种种暴行的白种人。

“要控诉这群全副武装的野人对和平勤劳的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如果事情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你平安地逃离满洲，你必须竭尽全力让世人知道满洲的惨状和实情——不被各事其主的通讯社所歪曲的实情、不被日本人重金支配的报纸所混淆的实情，赤裸裸的实情。……你答应吗？”

“我答应——全部实情。”

“记住呀！”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6个月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将我的亲人从日本军事当局的魔爪中营救出来。

还有许多事情阻止着我，使我不能履行我对我的中国老

朋友的庄严诺言。他的面容时时显现在我的眼前，我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目光正照射着我，他的温和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回响：“记住呀！”

.....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

这本书是为了履行我的诺言而写的，要表明真实，要道出真相，要把魔鬼的标记烙在日本军阀的前额上；要在全世界的良心之前暴露贪婪、残暴的日本军官；要指出这些穿制服的畜生的行径是怎样的无耻之极；而且以人道、文化和正义的名义，说出满洲人民在他们的压榨之下所遭受的劫难。

我在这里叙述的只不过是我曾经亲眼看见的事实，我几乎是这些故事的一个角色。对于许多人，我所记述的事实仿佛是可怕的、难以置信的噩梦。然而，对于和日本军国主义有过接触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在他们看来，只要有权有势，欺骗、胡说、造谣、阴谋、卖友、伪善，全是值得称赞的。试想把千万个年轻的本国女子出卖给外国的妓院，这种民族败类有什么道德可言！

此时此刻，他们已有 100 万兵力和巨量军火输入中国；数百万无辜的人民正在被屠杀，价值数十亿的财产正在被摧毁。但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如果日本人真地象征服东北一样征服了中国，那么所谓“王道”——劫掠、烧杀、谋害、绑票、讹诈、强奸、毒害的整个制度——就要加紧推行了，甚至比本书所叙述的、比前几年我所亲眼看见的还要更为凶残恐怖。

无情地暴露他们的丑恶是必要的。

我所叙述的人名全是真的，我所略去的名字是还在满

洲的日本势力范围内的人们的名字。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只想着两件事：遵从于人类文明，依照我的中国老朋友的愿望尽忠于东北人民。我的良心终于能够安宁了。再会吧，远东！新的世界已经在我的面前展开，我还要满怀希望地生活下去呢。

1938年